

北京文博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 从总体规划修编看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发展与实践
- 浅析古建筑保护措施合理性
- 关于秦君神道石柱及秦君石墓阙残件考释浅析
- 乾隆御制《帝都篇》、《皇都篇》碑文注释

2

2005

北京市文物局 主办



《支那事变画报》书影



《支那事变—北支特辑刊号》书影



长谷川部队进入广州市政府
 《写真》第十七卷第12号第13页)

(封二)

历史的见证

——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日版侵华史料

黄利人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为牢记历史，不忘国耻，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选择几种当年日本出版的图书和杂志介绍给读者。这些杂志是上世纪60年代由文物工作者从造纸厂、废品站拣选入藏的，它们客观地反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以他们自己的文字和图片有力地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进而激发国人奋起自强的爱国热情。

第一种：登记号为外03078，《满洲事变——关东军纪念写真帖》。出版年代为昭和九年(1934)3月，由日本陆军恤兵部编辑，大正写真工艺所出版印行，非卖品，大8开版。这部画册，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日本关东军的结构、军事力量、军需状况、后方抚恤等，从昭和六年(1931)至九年(1934)间，如何在我北方地区横行侵略，涉及长城内外、北平的怀柔、河北的承德、天津的周边、山西的柳条沟、内蒙的赤峰，还有日本天皇如何抚恤、赏赐日本伤兵等内容。

第二种：登记号为外02077，《圣战美术》。昭和十五年(1940)再版，标有“非卖品”字样，陆军省情报部校阅。8开活页装订，开篇正中书写“圣战美术”四字，在入藏前，有读者在这四个字两边写“自画罪行，足资证据”八个字，接着前几页有日本陆军大将畑俊六等人题词并钤印，分别为“忠魂护皇”、“兴亚雄心彩云间”、“文武并进兴亚之大业”等。该书辑油画、速写画帖为一册，极力宣扬如何报效国家，如何效忠天皇等等。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战线》，132幅画组成，内容涉及行军打仗，第二部分题为《白衣的勇士》，18幅画组成，内容涉及军事医疗机构、伤兵。第三部分：标题《占据地》，83幅画组成，内容以各地锦绣山河为题材，如“卢沟晓色”、“庐山五老峰”、“江湾镇风景”等。第四部分：标题为《战后》，42幅画，以战后农业、工业生产、生活为题材，描述安逸的战后美好生活。第五部分题为《集》，46幅画，以战地速写为主，有从军画帖、水彩画，内容多为战争经过的地方景色，如：“天津风景”、“江南早春”、“苏州河”等。

第三种：登记号外02062—02074，《国际写真情报》月刊画报，大8开本。各存14册，另有支那大事变画报第十六辑，主要内容为武汉大会战，日军占领武汉，“武汉前卫要地”照片，日军陆战队武汉阅兵，继而又攻占我南方各城市，如：“皇军湖南省进攻”、“庐山群峰征服”、“长江快速进攻”、“海军虎门陆战队占领”。另外还有“扫荡山西共匪”、“五台山进攻”、日军据“显通寺兵队”。

第四种：登记号为外02053，《北支画刊·现地编辑》第12期，出版年代：昭和十四年(1939)，东京平凡出版社，编辑者：城所英一，8开本，此画刊34页，内容涉及北京、山西的民俗、物产、名胜等。

第五种：登记号为外02076,《写真周报》，此刊亦为零散存本，昭和十三年(1938)六月出版，内阁情报部编辑，东京大日本株式会社印行，8开本。此画刊共10页，前部分主要内容为1938年5月徐州会战，用15幅写真照片，一段文字，介绍日军攻打徐州的情形。

第六种：登记号为外02054-1、2、3；外02055-1、2、3；外02056-1、2、3、4、5；外02057-1、2、3、4,《北支·现地编辑》月刊，共存15册散本，1册合订本。出版年代为昭和十四年(1939)至昭和十七年(1942)，编辑者为加腾新吉，东京第一书房出版，8开本。日本派出很多记者，对中国的矿藏、森林、铁路、公路、交通运输、风土人情进行了详尽了解。

第七种：登记号为外02052,《吴梦春秋·春光号》季刊，昭和十六年(1941)二月出版，东京写真协会出版，北原信男编辑，8开本，内容标题：“东亚历史的展开”、“现地将兵的日日——陆军”、“现地将兵的日日——海军”、“名园名塔”、苏州、杭州、扬州”、“淮南线复兴的成功”等。

第八种：登记号为外02075-1、2,《支那事变画报》第41辑、第101辑，共两本。昭和十三年(1938)十一月出版，东京、大阪特派员摄影，大8开本。此刊为战局旬报，刊物详实地记载了日军战况，如：江南战线“长江沿岸码头占领”，江北战线“河南占领”、“武汉攻略”，等。

第九种《北支特辑号——支那事变》第39期，入藏号外02077，昭和十二年(1937)十月桥本丰三编辑，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印行，8开本，此刊正是“七·七”事变二个多月后，反映了当时事变的各个方面，介绍了事变的起因和过程，封面为一张中国东北地图。

(图片翻拍：张岩)



卢沟桥警备《支那事变—北支特刊号》



国际写真情报



《北支》杂志书影

病傷戰るあ輝光



1939年出版的《关东军纪念写真帖》上一幅日本皇家抚恤伤兵的内容图



刊载于《写真周报》中的日军攻陷徐州

(彩一)

门头沟下苇甸龙王庙的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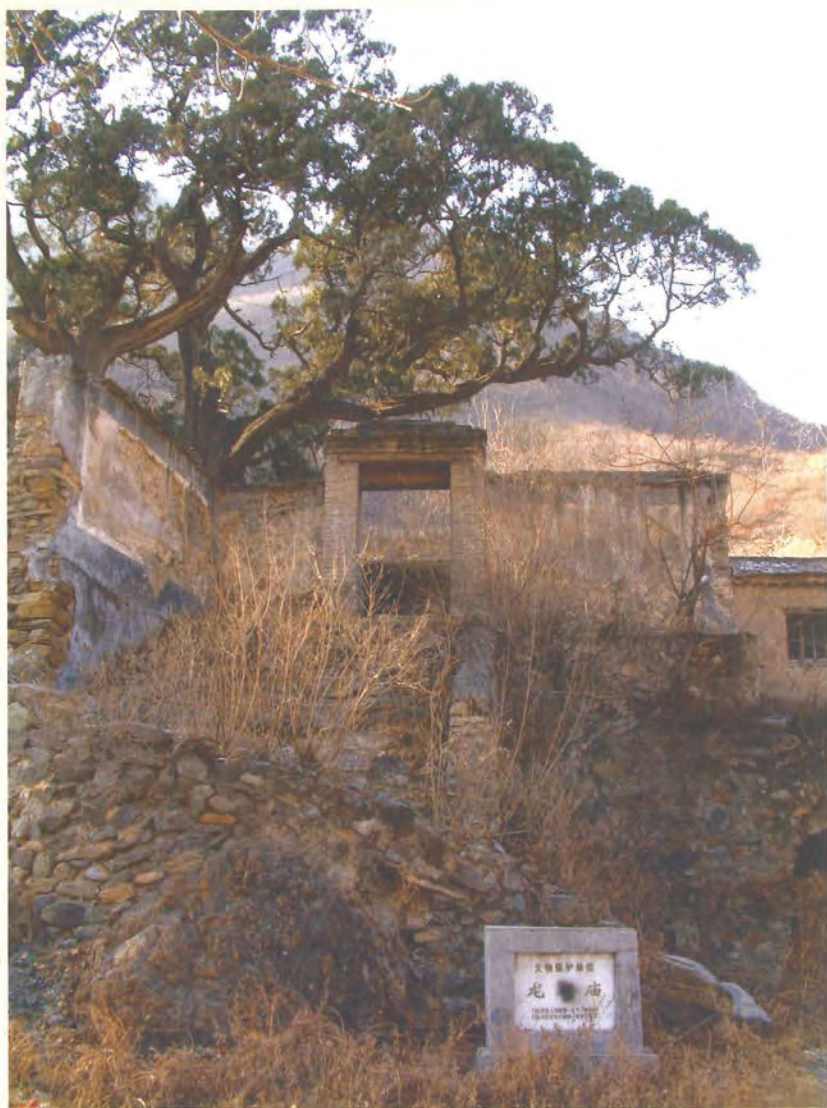


图1 龙王庙山门



图2 龙王庙正殿



图3 正殿云头



图5 左侧水母娘娘



图4 香客画的供品



图6 右侧水母娘娘



图7 出巡图局部



图8 出巡图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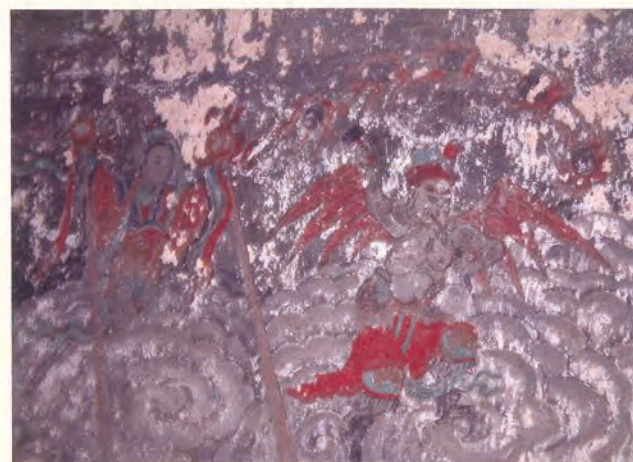


图9 雷公电母施雨



图11 回宫图局部

北京文博



目 录

(2005年第2期)(总第四十期)

文物工作

- 从总体规划修编看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发展与实践 孔繁峙(5)
- 浅析古建筑保护措施合理性 王玉伟(12)

博物馆学

- 从不恰当的商业化中挽救大观园的重要文化财产并发展
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和旅游潜能 杜大卫(著) 赵忠林(译)(18)
- 北京地区馆藏文物腐蚀调查报告 王丹 郝黎(22)
- “四有”工作在我馆业务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臧瑞平(32)
- 《中学历史》实践课呼唤讲解员角色更新 苏 艳(34)

文物研究

- 昌平白浮所出西周甲骨刻辞考释 连劭名(38)
- 关于秦君神道石柱及秦君石墓阙残件考释浅析 滕艳玲(40)
- 磁州窑与民间文化 赵光林(47)
- 辽大安山延福寺李山主实行录丛考 任 昉(51)

翠峰禅师、十方诸佛宝塔及延寿寺	韩建识(56)
乾隆御制《帝都篇》、《皇都篇》碑文注释	高凯军(61)

北京史地

试论北京唐代墓志的地方特色	陈 康(66)
唐幽州诸坊考	鲁晓帆(72)
万寿寺明朝史事考略	胡桂梅(80)
门头沟下苇甸龙王庙壁画	张 凌(86)
北京大栅栏地区寺庙的信仰功能、社会实用功能 及其地理分布述略	何岩巍(89)
今昔什刹海	张永和 张 田(93)

资料信息

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古籍修复阶段成果	宋 婷(96)
北京市文物局 2005 年一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杨康明(98)

封面:乾隆御制《帝都篇》、《皇都篇》碑

封底:燕墩

封二、彩插一:历史的见证——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日版侵华史料

彩插二、三、四:门头沟下苇甸龙王庙的壁画

封三:北京市第七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介绍(续二)

《北京文博》编辑委员会

顾 问:侯仁之 李学勤 吕济民

主 任:宿 白 副 任:梅宁华 廖静文 王世仁 曹子西 齐心 马希桂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 平 马法柱 王丹江 孔繁峙 刘建业 刘超英 张 展 张增光 宋大川

陈 平 陈 旭 赵其昌 侯 明 晋宏述 徐 伟 徐 明 高凯军 舒小峰

韩 永 韩 扬 温桂华 葛英会 傅公铤

主 编:张 展 编辑部主任:陈晓苏

本期责编:陈晓苏 韩建识 陈 倩 美术编辑:宋世华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辑出版: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北京文博》编辑部

北京文博网网址:<http://www.bjmuseumnet.org>

《北京文博》电子邮箱:bjwb1995@yahoo.com.cn

BEIJING WENBO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2, 2005

Contents

CULTURAL RELICS WORK

-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Protection Work for Famous Historical Cultural City Beijing Reflected from Compilation of Collectivity Programming by Kong Fanzhi(5)
- On Reasonability of Protection Measures for Ancient Architecture by Wang Yuwei(12)

MUSEOLOGY

- Da Guan Yuan—A Case Study; Suggestions to Rescue an Important Cultural Asset from Inappropriate Commercialization and Develop It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Society and Enhance Its Tourism Potential by David N. Tool. Ph. D. , Translated by Zhao Zhonglin(18)
-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Erosion of Cultural Relics Collected in Museums in Beijing by Wang Dan and Hao Li(22)
- Station and Function of *Si You* Work in the Operation Work of the Sculptural Art Museum of Beijing by Zang Ruiping(32)
- Middle School History* Practical Classes Ask for Role of Interpreter in the Museum to Update by Su Yan(34)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 Identific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n Western Zhou Dynasty Unearthed in Baifu of Changping by Lian Shaoming(38)
- Research on the Shendao Stele and Remnant Parts of Stone Tomb Gate of Qinjun by Teng Yanling(40)

- Cizhou Kiln and Folk Culture by Zhao Guanglin(47)
- Study on Shixinglu of Abbot Li of Yanfu Temple Da'an Mountain in Liao Dynasty by Ren Fang(51)
- Monk Cuifeng, Ten Buddhas Pagoda and Yanshou Temple by Han Jianshi(56)
- Notes on Epitaph of Didu and Huangdu Poem by Emperor Qianlong by Gao Kaijun(61)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BEIJING

- About the Local Color of Epitaphs of Tang Dynasty in Beijing ... by Chen Kang(66)
- Research on the Lanes of Youzhou in Tang Dynasty by Lu Xiaofan(72)
- A Brief Study of Historical Incidents of Wanshou Temple in Ming Dynasty by Hu Guimei(80)
- Fresco in the Dragon King Temple in Xiaweidian of Mentougou ... by Zhang Ling(86)
- Religion Function, Social Practicality Function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emples in Dashilanr District of Beijing by He Yanwei(89)
- Yesterday and Today of the Shichahai by Zhang Yonghe and Zhang Tian(93)

DATA AND INFORMATION

- Preliminary Achievements of Repair for Ancient Books Collected in the Books and Data Center of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by Song Ting(96)
- Chronicle of Events Concern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1st Quarter of 2005) by Yang Kangming(98)

EDITORIAL BOARD OF BEIJING WEN BO

Advisors: *Hou Renzhi, Li Xueqin, Lü Junin*

Chairman: *Su Bai*

Vice-chairmen: *Mei Ninghua, Liao Jingwen, Wang Shiren, Cao Zixi, Qixin, Ma Xigui*

Members: *Yu Ping, Ma Fazhu, Wang Danjiang, Kong Fanzhi, Liu Jianye, Liu Chaoying, Zhang Zhan, Zhang Zengguang, Song Dachuan, Chen Ping, Chen Xu, Zhao Qichang, Hou ming, Ju Hongkui, Xu Wei, Xu Ming, Gao Kaijun, Shu Xiaofeng, Han Yong, Han Yang, Wen Guohua, Ge Yinghui, Fu Gongyue*

Editor-in-chief: *Zhang zhan*

Director of Editorial Department: *Chen Xiaosu*

Managing Editors of this issue: *Chen Xiaosu, Han Jianshi, Chen Qian*

Art Editor: *Song Shihua*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Wen Bo*, Information and DataCentr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URL: <http://www.bjmuseumnet.org>

BEIJING WENBO E-mail: bjwb1995@yahoo.com.cn

从总体规划修编 看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 的发展与实践

孔繁峙

为在新形势下适应首都城市的建设发展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需要,新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在认真回顾和总结建国以来北京城市建设与历史名城保护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站在历史传承与未来发展的时代高度,提出了在市域范围内构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北京未来空间发展的战略构想,从而展示了北京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对今后在世界上确立和发展首都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地位,特别是对北京历史名城的整体保护都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在首都城市的建设中北京历史名城保护工作的形成与发展

在世界古代都市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北京古城,是我国历史上几千年封建社会都城建设发展的最后结晶,特别是经元、明、清数百年建设发展而形成的北京旧城,保留有完整的古都格局、完美的历史建筑、雄伟绚丽的皇家建筑群和井然有序的都市空间及遍布全市并特色鲜明的四合院、胡同等古都传

统建筑,集中反映和代表了我国古代都城营造艺术的最高成就。1949年新中国成立并将古都北京确定为国家首都,这是中国历史发展及世界为之瞩目的重大事件。而作为首都城市建设发展与北京古城的保护关系问题,则始终受到国内外的关注。经过半个世纪以来的建设与发展,作为国家首都的新北京已被世界所认同;作为古代都城的北京旧城也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首而得到相应的保护。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的历程,不难发现,北京古都城市保护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与首都城市的建设始终是处在矛盾的不断产生和调整的过程之中,并伴随着国家首都城市的建设发展而一同发展的:

1. 全国“行政中心”的确立,引发了原状保留北京古城的呼声

建国初期,确立北京为全国首都之时,首先面临的的就是开展首都城市的选址与建设工作,是否将全国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首都建立在北京旧城中心区的问题,曾引起专家层面上的高度关注。在建国之初所面

对的北京城,是世界著名、规模宏大而格局完整的古代都城,是一座占地 62.5 平方公里,人口已达 165 万人的特大型历史城市。在这种情况下,是在城外择址另建首都新的行政中心区,还是在现有旧城的基础上建设发展新的首都城市?这既关系到当时新中国的首都城市怎样建设发展,也关系到著名的北京古都城市以什么方式延续和存在的历史与时代的选择。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及时提出了在京郊规划建设新中国的首都行政中心以使北京古都得以完整保留和延续的呼吁,并在当时的专家和决策层面展开了一场后人熟知的“新北京”建设位置的选择和怎样对待古都北京的争论。梁思成先生在高度评价北京古都建设规划之完美和建筑成就之高时,曾说:“北平的整个形制既是世界上可贵的孤例,而同时又是艺术的杰作。城内外许多建筑物都是在历史上、建筑史上、艺术史上的至宝,……它们综合起来是一个庞大的历史艺术陈列馆……。”现在看来,在当时展开这场“争论”的最后结果,尽管由于多种因素导致中央没能采用于京郊另建“新城”的建议,而最终选定在旧城内建设首都行政中心的发展道路;也尽管当时还没有提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和提升到整体保护名城的高度,但梁先生早在建国初期即对传统文化及历史城市保护方面所做的理论探索,不但形成足以让今人铭记、借鉴并深刻影响后人的保护历史城市及传统文化的学术观点,而且,还以此为标志,拉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并对以后产生重大影响的首都城市建设与北京历史城市保护之间矛盾发展的历史序幕。

2. 在首都城市的建设中,诞生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

对历史传统文化的保护,在建国初期最早引起政府部门重视的是对著名的历史文物建筑的保护。如早在建国初始,政府部门就对故宫、天坛、颐和园、十三陵等一批著名建筑群采取了保护措施,但当时对北京旧城

的保护意识还没有形成,而对北京旧城的历史文化价值的认知及保护则是在以后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认识发展过程。因此,从名城保护的角度而言,对北京旧城的保护是一项起步较晚的工作。所以,北京市政府在 1957 年公布全市第一批 36 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以故宫、天坛等为代表的皇家建筑占了 16 项。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对北京城著名的钟楼、鼓楼,特别是元土城遗迹作为北京城市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也被列入保护单位的名单之中,而遗憾的是,在当时还大多完整的环城 40 余公里的具有老北京标志性建筑及规模宏大的城墙和城门建筑,却未能列入保护的名单之内。由此可见,当时对北京旧城保护的认识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所以,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就曾出现,文化部门在旧城内公布历史建筑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同时,市政部门为修城市道路而正在拆除有数百年历史的老北京城墙和城门等令后人不可理解的现象。其中最令人不可接受的是,北京市在 1957 年公布天坛、先农坛等历史建筑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加以保护之时,而在其另一侧却出现了正在拆除永定门城楼、城墙这种极不和谐的局面。也就在此时,我们永远丧失了保存北京城墙的时代机遇,永久地铸成了北京历史名城保护延续的历史遗憾,并由此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话题和思索。

首都城市的建设触动了历史传统城市的保护,促使我们在建设中必须认真对待历史城市的保护问题。所以,北京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规划及思路,是最先产生于首都城市的建设规划之中。自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后,首都的城市建设步入了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时期,各项建设工程掀起了高潮。据这一时期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统计:1977 年至 1983 年间,北京地区住宅建设、开发项目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都达到空前规模,其中 1980 年至 1983 年的四年中,全市共竣工住宅 1838 万平方米,相当于“文革”十年间建成全部住宅(690 万平方米)的 2.7 倍,超

过历史最高水平,连同 1977 年至 1979 年,七年住宅 2352 万平方米,相当于北京解放时拥有住宅总量(1300 多万平方米)的 1.8 倍,占解放后新建住宅总量的 46%,城市人口平均每人居住面积从 1976 年的 4.57 平方米提高到 5.68 平方米。住宅连同服务设施,在七年内共竣工 2758 万平方米,占全市同期建筑竣工量的 66%。

从全国范围看,随着各地区城市建筑的兴起而对历史城市的冲击,已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为此,国务院于 1982 年首次分批公布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名单,以使在建设发展中的历史城市得到保护。就在这一时期,北京旧城有幸被确定为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首,从而使北京首次从以往对单体文物建筑的保护上升到历史名城保护的范畴。同时,首都城市的建设发展与历史名城的保护工作得到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在 1983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原则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首次将保护文物古迹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北京总体规划,并在批复中明确提出:在城市建设中要妥善保护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古建筑和具有重要意义的古建筑遗址。同时,还强调了保护文物古迹,不仅要保护其自身,而且要保护其周围环境,要保护北京历史名城的独特风貌。在这一保护思路的指导下,北京市在首都城市的建设中,对北京历史名城的保护开始了一系列的探索工作。在文物保护工作已有的基础上,首先开展了在城市建设中保护文物建筑周边景观风貌的工作,自 1984 年起,分批开展了对北京地区的国家级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工作;对旧城内传统空间的保护采取了建设高度限定措施;公布了全市第一批 25 片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名单,以及对现存的明北京城墙的全部遗迹采取了保护措施等各项工作,从而使北京旧城在首都城市的建设发展中开始步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轨道。

3. 在首都城市全面建设发展中,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内容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首都城市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全市范围内的城市建设与旧城内危房改造工程的兴起。北京历史名城保护再次面临着大规模城市建设的威胁,1993 年在国务院批准的修订后的《北京市总体规划(1991 年—2010 年)》的方案中,全面地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结合北京旧城的实际情况,对北京历史名城的保护做出了较为系统的要求,再次强调旧城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历史名城保护的重要内容;历史文化保护区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妥善处理历史名城保护与首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提出了要从旧城格局和宏观环境上保护北京历史名城的十个方面的具体内容:(1)保护和发展传统城市中轴线。必须保护好从永定门至钟鼓楼这条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的传统风貌特点;(2)注意保持明、清北京城“凸”字型城廓平面。沿城墙旧址保留一定宽度的绿化带,形成象征城墙旧址的绿化环,原城门口的建筑应体现“城门旧址”的标志特点;(3)保护与北京城市沿革密切相关的河湖水系,如长河、护城河、六海等;(4)旧城改造要基本保持原有的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5)注意吸取传统民居和城市色彩的特点,保持旧城内青灰色民居烘托红墙、黄瓦的宫殿建筑群的传统色调;(6)以故宫、皇城为中心,分层次控制建筑高度,旧城要保持平缓开阔的空间格局,由内向外逐步提高建筑层次……;(7)保护城市重要景观线。保护“银锭观山”和从市中心区往西的几条干道遥观西山的重要景观线,以及景山万春亭、北海白塔、妙应寺白塔、钟鼓楼、德胜门箭楼、天坛祈年殿、正阳门城楼、箭楼各景点之间几条主要的传统景观线,景观线保护范围内新建筑的高度,应按测试高度控制,严禁插建高层建筑;(8)保护街道对景,对历史形成的对景建筑及其环境要加以保护,控制其前景和背景的建筑高度;(9)增辟城市广

场;(10)保护古树名木等。使北京名城保护工作更为系统化。为在首都城市的建筑发展中协调与历史名城保护的关系,国务院在批复中还提出,首都的城市建筑要逐步实现两个转移,即:城市建设的重点要逐步从市区向远郊区做战略性转移,市区建设要从外延扩展向调整改造转移。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对《北京市总体规划》的批复,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北京市开展并实现了旧城内产业结构调整 and 工业、生产企业的外迁,改善了旧城的环境质量;还在全市范围内普遍开展了一场关于保护古都风貌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名城保护意识,北京历史名城保护工作也开始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4. 将首都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的确立,促成了北京历史名城的整体保护

进入21世纪,北京迎来了首都城市建设的空前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首都城市规划发展的目标定位是:从本世纪初至2008年,北京将率先在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构建国际大都市的基本框架;2009年至2020年,将全面实现现代化,确立具有鲜明特色的国际大都市的地位;2021年至2050年,将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从而进入世界城市行列。

为实现首都城市在新时期发展的宏伟目标,尤其是在2008年能成功举办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京奥运会,北京市将开展一场空前规模的“新北京、新奥运”的建设工程以及完成道路交通、市政环境和危房改造等多项工作目标,从而使北京名城的保护再次面临着建设与发展的巨大挑战。怎样处理和解决新形势下首都城市建设与历史名城保护的关系;以何种方式兼顾并实现首都现代化发展与历史名城的保护,是当今国内外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2004年开展并完成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工作,就是在这一新的形势下,以一种全新的规划发展思路,制定的以历史名城整体保护为核心的“两轴、两带、多中心”的首都城市发展构想。

二、总体规划修编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几点重要意义

新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首次解决了首都现代建设发展与传统城市保护的协调发展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在历史名城保护方面,无论是工作的指导思想、保护内容、方式还是实施措施等方面,都能体现出历史名城保护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同时,也使我们在一个新的领域内丰富和提高了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工作的认识。

一是,新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是我市规划建设中第一次以历史名城保护为目的,以首都城市综合发展为目标而制定的首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规划,为今后的北京历史名城保护和首都建设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自20世纪末期以来,随着北京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大,城市传统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传统城市交通模式的重大变化,加之奥运工程的建设以及城市结构在人口、建筑的不断聚集、膨胀、扩张的冲击下,旧城内不断出现的新建筑与名城的传统建筑争地面、抢空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导致了北京古都风貌的不断丧失,城市交通和环境压力与名城保护的矛盾日趋严峻。新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是在认真分析和研究了北京城市建设发展面临的问题、文化名城保护的历史责任、首都城市发展的时代机遇和北京今后的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确定了北京作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的发展目标。其中最重要的规划成果是,在首都城市空间发展战略格局上,提出了保护北京历史城市,将北京旧城的东、西方向作为首都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的规划布局,制定了“两轴、两带、多中心”的首都城市发展构想和“旧城有机疏散、市域战略转移……”等实施措施,从而在首都城市发展规划战略上,第一次确定了保护古都格局与历史风貌及保证目标实现的重大举措。

二是,在规划中强化了北京城市的性

质,进一步突出和完善了首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功能。北京市作为国家的首都,既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历史文化名城,新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根据北京的城市性质和首都的特点,针对当前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和制定了首都经济发展、产生结构调整以及全市范围内的“村镇重新组合,区域协调发展”的首都城市建设发展的战略构想,将会从根本上逐步改变北京市当前的发展状况,以及旧城内多种功能叠加,致使城市中的历史文化保护、交通、环境状况日益恶化的趋势,促使首都城市的建设发展能够实现历史与现实相融合、当前与长远相结合,充分展示首都城市的现代文明和北京古都的历史风貌。

三是,提出和制定了北京历史名城整体保护的规划原则及保护内容,将历史名城保护的观念、措施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新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从历史名城整体保护的宏观视角,提出了深化和局部调整历史名城各项保护内容及规划,协调保护与发展的相互关系;补充和完善了历史名城各项保护规划的实施政策,特别是提出从整体上保护旧城、文物和其他历史文化资源的规划内容,制定了深化北京旧城整体保护与改造规划及其实施的指导原则与全面落实文物建筑、历史文化保护区、旧城整体保护等各项措施,为今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四是,完善和丰富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具体内容。新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首次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遗产”项目列入到名城保护的规划之中。要求从历史名城保护的角度做好“人类遗产”的保护工作,各遗产项目都要制定和完善遗产外围建设缓冲区等有效的保护措施,以保持遗产地传统区域的完整性与环境风貌的和谐。新的总体规划还着重将旧城内承载着大量有形和无形历史信息的四合院、胡同等民俗建筑,列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宝贵资源,强调对具有历史价值的四合院、胡同

等传统建筑开展修缮等保护措施;此外,还将反映城市发展历史和城市文化载体的优秀的近现代建筑,列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内容,并明确要求对全市近现代建筑进行全面普查,依据有关分级、分类标准,公布为保护单位并设置标牌及划定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和制定保护规划等措施。

三、在首都城市建设中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发展的历史启示

从上世纪50年代将北京确定为全国的首都城市开始,北京的古都城市就一直面临着首都城市的利用与发展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古老的旧城要承载着国家首都城市的现实生活、工作和国内外交往的巨大压力,使刚刚从封建社会中获得解放的古都城市,开始经受现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考验;另一方面,是来自于首都城市所特有的、不间断的现代建设发展的挑战,特别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比如,当年我们文物保护事业在还没有完全清除和摆脱“文革”运动对历史文化造成的破坏,以及刚刚开始痛苦反思时,便又开始迎接和承受日益强劲的市场经济风暴对历史传统建筑乃至整座历史名城的考验。尽管在几十年的城市建设中历史名城的保护工作也在不断发展和有所提高,但是,从总体上看,首都城市现代化建设日益发展的整体趋势对历史名城所带来的影响及其严峻性是不言而喻的。北京城市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建设发展后又重新回归整体保护的今天,更值得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认真回顾和总结历史名城保护的经验和教训:

一是,在建国初期的特定时期和特定范围内,首都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建设与形成,可以同历史名城同时存在,但不能在一个地域内同时发展。建国初期将国家的首都建立在旧城中心区,就预示着现代城市的功能要求与历史城市保护之间矛盾的产生,但由于建国之初成功地实现了象征国家政治、文

化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及周围的人民大会堂、纪念碑、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等工程建设,并较好地解决了城市建筑上的现代与传统、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保持了新中国首都现代建筑与旧城传统建筑的协调统一,使以故宫、天安门为代表的历史建筑能和谐地支持代表首都政治、文化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及周边现代建筑,并为世人所接受。在这一时期与地域内,首都城市与历史城市可以同时存在,而当时的现代建筑与旧城保护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首都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原有的“和谐”局面逐渐被打破。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首都城市现代化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从而造成了旧城内历史建筑与传统风貌的不断丧失。另一方面,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保护历史城市的呼声日益高涨并逐渐形成时代潮流。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首都的现代化建设与北京历史名城保护,已成为同等重要的历史任务。新的世纪要求:北京的首都城市要步入国际大都市行列,北京旧城要成为具有世界地位的历史文化名城。这使得已延续半个世纪的首都现代化建设与历史名城保护之间矛盾发展的最终结果,是酿成了首都城市功能外调的“两轴、两带、多中心”新的城市发展战略布局的产生和北京历史名城整体保护的兴起。

二是,从历史与时代发展的角度处理好现代建设与名城保护的关系,这是北京城市的历史与性质决定的。历经半个世纪的城市建设发展给北京古都带来了巨大变化,在城市的功能、道路、交通、市政措施、居住环境和原有城市空间等方面,都很大程度地改变了旧城的固有面貌,对此,社会各界及国际社会都从不同的角度有着不同的评说。但是,北京的历史名城保护长期以来滞后于首都城市的建设发展的这种被动的局面,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反思建国以来在首都城市的改造、建设与历史城市的保护工作,需要特别记取的教训:

其一是,在建国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对北京旧城的历史价值认识不深,对旧城采取的是一种“抛弃性”的改造,而没有从首都城市的建设发展中采取更多的保护措施,使旧城中原有的很多具有特色的重要传统建筑,如主要街道中的牌楼等标志性建筑物,都在城市改造的工程中被拆除。其中最突出的是,在60年代开展的市政建设中拆除了有重要价值的老北京城墙和大部分城门,造成了北京历史名城保护中的最大损失与遗憾。

其二是,以拆除和牺牲区域性的传统建筑为代价,实现了旧城道路的拓展。按照50年代确定的旧城道路“红线”规划,旧城内四合院区域中的大部分街道、胡同,基本上都采取大面积拆除两侧原有建筑进行拓宽路面的做法,以实现旧城内现代化交通道路网络。如已实施的平安大街、菜市口大街及南扩路、两广大街等等,都使道路两侧大部分地段的传统建筑在展览的道路中消失了,代之而起的多是现代化的高厦、办公楼,变成了一条条现代化街市,从而破坏了历史城市的原有格局和民俗风情积淀丰富的街区传统风貌。

其三是,旧城内新的建筑一再突破规划控制的高度,对历史城市的传统空间造成严重的破坏。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房地产开发席卷古都城市,由于旧城具有诱人的区位优势,近些年来现代化的商厦由远及近直逼皇城,古都的传统空间景观再次受到现代建筑的冲击。从历史名城保护的严格意义上讲,早在1985年北京市确定的旧城内允许建设的高度规定,已经对旧城的传统空间景观构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即使这样的高度,仍不断被后来出现的更高的建筑所一再突破,严重破坏了历史名城的传统空间特色。如王府井大街陆续建设的商厦、办公楼,就把原规定的30米建筑高度,突破到45米左右;东方广场建筑群也把原规定的30米突破到50米左右;东、西二环路内侧的建筑群,则把原规定的30米至45米的高度突破到60米以上;旧城内绝大部分的危改建

筑小区,也都突破了当地原规定的建筑高度。旧城内超高建筑群的大量出现,致使旧城整体格局和传统风貌的保护处于十分严峻的境地。

其四是,以房地产开发的方式实施危房改造工程,造成了旧城内大量的传统四合院、胡同的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现代化楼房居住区。据市危房改造办公室统计,截止到2004年底,北京城区累计开展的危房改造项目共计279项,其中旧城内137项,已动迁居民40余万户,其中旧城内20余万户。另据初步统计,在旧城内开工的137项危房改造工程内,已有60余片在旧城原传统建筑的基础上,建成都市现代化的楼房小区,这无疑将对旧城的原有格局及传统风貌特色造成不良后果。

三是,以往开展的总体规划的调整与修编,目的多是满足和适应首都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而忽视了对旧城的保护,致使北京历史名城的保护形势,在首都现代化建设的冲击下而日趋严峻。在1985年和1987年,北京市曾分别制定“市区建筑高度控制方案”和《北京旧城区土地使用和高度控制规划方案》规定,北京旧城区内除皇城及三海周围等特定地区,仍保持了原有四合院、胡同风貌。皇城以外地区的建筑高度已分别确定为9米、12米、18米、30米,个别地段可达45米,特别是在1987年实施的旧城区建筑高度控制方案,还进一步扩大了12米以上的建设区……。如若站在历史名城保护的角度,用现在的保护标准反思上述规定,不能不说,当初我们对北京名城保护的认识有着很大的时代局限性。旧城内楼群的产生,传统空间形态的破坏,这绝不单纯是历史城市传统景观的损失,可以设想,北京旧城内如只保留皇城、什刹海等街区的四合院平房,而其它地区全部建成9米、12米、18米乃至30米、45米高的片片楼区,那就意味着北京旧城内大量传统四合院的消失,这不但影响到古都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还将导

致北京历史城市的原有格局及传统风貌的彻底破坏,其严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在历史名城保护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方面,法国巴黎等城市的做法及历史经验,就很值得我们借鉴:当年的历史城市保护规划一经确定,不管以后时代怎样发展,政局怎样变化,巴黎城市几百年来的发展变迁,都始终依照规划、尊重历史、保护传统,朝着尽善尽美的方向发展,从而使一个历史的城市完美地保持至今,并成为国际瞩目的历史文化名城。相比之下,北京古都原有的严整格局及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却在半个世纪以来的城市建设与规划调整中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历史名城保护与首都现代化发展,是时代赋予首都北京的两大历史任务,在首都城市加快实现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进程中,北京历史名城的重要价值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日俱增,新修订的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为我们明确了新时期首都城市进一步调整发展的区域定位,确定了历史名城保护的整体目标和重点,从而为首都的建设与名城的保护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今后总体规划的全面实施,我们期盼着,一个科学的尊重历史名城自身保护规律和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北京历史名城整体保护局面的尽快到来。

参考书目及资料

1. 一九八五年出版《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
2. 一九五七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
3. 一九八三年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
4. 一九九三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
5. 建国以来北京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及相关文物法规等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

浅

析

古建筑保护措施 的合理性

王
玉
伟

古建筑修缮不同于建设工程,它是对古建筑实施保护的实践活动,是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体现。古建筑保护措施合理与否,对古建筑的安全与价值至关重要。文物不能再生,在保护措施上的任何一点疏忽,其造成的后果往往是不可挽回的。

因此,古建筑保护措施合理性决定着修缮保护项目的质量和水平,而衡量修缮的质量和水平,关键是要看修缮后古建筑自身价值得到了多少保护,安全隐患是否得到消

除,是否最有助于其社会价值的体现,三者密不可分。并非仅仅是修旧如旧或焕然一新、金碧辉煌。

如何才能做到保护措施的合理性呢?首先,要求从事文物保护的工作者要有一种积极负责的敬业精神,具有对传承民族文化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做到文物保护措施合理性的前提条件。其次,做好各个环节上的调查研究,力求古建筑保护措施更加合理。最后是有针对性的选择科学的保护措施。下面谈些我在工作中的体会:

一、踏勘调查

古建筑价值的取向源于古建筑价值的判断信息,“因为很多的人类过去的记录缺乏历史文献,所以各个时期的文化资源就是主要的信息源”。^①而这些信息真实性,往往是由勘察设计单位,对保护对象的历史现状,所做的勘查是否全面和准确所决定的。那么,如何做好这项工作呢?

首先要史料考证。不仅包括查找史料档案(包括“四有”资料),还应注意搜寻未曾发现的历史照片、碑刻以及相关蛛丝马迹等。因为,许多古建筑毁于近现代,力争尽一切努力去发掘与之相关的历史信息,有利于全面地了解古建筑的时代特征、结构法式特征、历史沿革及历次修缮印记,为文物的修复提供更加有利的佐证。

其次进行必要的社会调查。对于近年修复过的古建筑,在可能的情况下,不要忽略向曾经参与或与保护有关联的修缮、施工设计方面的专家、技术人员请教,包括深入现场向当地文物工作者、管理使用单位的知情者以及周边对古建筑历史的发展变迁有所了解的人员探访,必要时也可以通过媒体向社会广泛征集史料等信息。在颐和园长廊修复设计以及川底下村、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等文物建筑保护方案的制定时,都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

最后是现场勘探。通过实测和必要的科学探测,掌握第一手实物资料,特别涉及

有些地面建筑已经无存的重建工程,必须对遗址进行清理和必要的勘探。这项工作应由建筑考古人员来做,至少是在文物考古人员指导下来完成,并及时做出清理勘察报告,逐步改变目前仍主要由建设方组织建筑设计或施工人员来完成基础勘查的“惯性”做法,以保证基础勘查更加科学,为判断文物建筑始建或重建年代,准确掌握建筑和现存建筑构件时代特征提供可靠依据。这一点在以往修复工程中常常容易忽视,如:圆明园正觉寺天王殿修复方案就是根据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文物考古人员对建筑基址进行的清理报告,清理报告为修复方案设计提供了充分的依据;永定门城楼复建工程开始前,考古人员对原建筑地基进行清理,为永定门重建确定了准确的位置。在实际工作中,有时在设计阶段由于条件所限,难以对基础进行清理勘查时,要尽早创造条件对基址进行考古勘查并及时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勘查内容主要包括:地基基础、大木结构以及油饰彩画等,记录现状残破状况、安全情况,并说明损坏程度等。通过测绘拍摄照片,了解建筑的法式特征,考证建筑的年代。最后绘制油画小样,编制修缮方案并组织专家论证。对于无充分依据的,应避免主观判断。

二、病因分析

(一)病害类型

由于古建筑建造年代久远,受当时条件所限,除结构设计可能与现代建筑相比存在着不合理外,还普遍存在着因年久失修而形成的大量隐患。包括木质结构老化、糟朽、劈裂从而使承载力降低;由于屋顶瓦件松动出现的渗漏使椽子望板糟朽、屋面变形、木架歪闪;后期人工挖掘的菜窖、地道、防空洞、管道沟、山体滑坡等,使建筑基础产生的不均匀沉降,墙体的支撑力下降;院落排水不畅,造成墙体开裂甚至坍塌;空气污染造成的砖、石严重风化等。

(二)“健康”分析

要在勘查中摸清底细,进行科学的分析计算,在论证的基础上,做出古建筑当前安全状况的判断。这里应注意易造成误判的一些假象,如判断是稳定性损伤还是发展型损伤时,要弄清问题部位险情是建筑原设计的缺陷,还是后人在修缮改造时所为,还是自然外力所致,这对于使文物保护措施合理性尤为重要。

在检查大木架时,要分析大木裂是建造时不堪重负,还是后期在外力的作用下而出现的损坏,是初期木料湿造成的早期开裂呢,还是地震或外力造成的后期结构损伤呢,房屋修缮中还要弄清屋面渗漏痕迹是早期的还是新近形成的,这方面较容易忽视。

有时因为看有水印就轻易做出“渗漏严重,挑顶大修”的结论,在这方面如果设计时不加分析,在方案审定中又略有疏忽,容易出现一些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勘查中要详细认真,尽量防止以“条件不具备”、“时间紧”等理由而轻下结论的现象发生。

另外,对于常出现的屋面瓦件松动,或者有一些脱落现象,就认为屋面渗漏严重,要求挑顶修缮,这种做法也是错误的。对有些传统的屋面虽旧灰背已历经几百年,但仍保护的很好并具有很好防护性,可以通过重新或局部揭瓦来解决渗漏的问题。

对于地基下沉和墙体开裂现象更要分析是早期还是后期形成的,是初期设计问题,还是因地震或是周边排水不畅、或是施工造成的,只有确定“病因”,才有可能“对症下药”。

三、病情判断及应对措施

尽可能的利用各种先进的科学手段分析存在的问题、原因,俟不同的情况分类研究。

(一)屋面渗漏及瓦件残损

屋面已经出现大面积下陷甚至局部坍塌

塌。遇这种情况应先考虑是否可以局部或全部重新揭瓦,再进一步考虑挑顶问题。如果发现大木结构损坏严重,应先考虑局部加固或构件的更换,否则再考虑必要的打穿拨正等。一般情况不得轻易落架,有些情况是可以通过“偷梁换柱”解决的。除非遇基础出现严重问题或大木已无法加固,以及大木更换量过大等特殊情况。

补漏主要是指大木及屋面结构没有大的问题,因屋面瓦件破碎,树草丛生造成的险情。在修缮中一般只做局部揭瓦处理,如面积较大也可考虑重新揭瓦,灰背较好的可局部修补青灰背。这类情况轻者勾抹瓦脸更换瓦件,重则局部挑顶。但现在情况并非都是如此,全部揭瓦或挑顶在各类修缮中十分普遍,有些并非经过了仔细分析论证,不必要扩大翻修范围,使得文物原件保存数量比例大大降低,使文物价值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一些建筑屋面轻微渗漏,通常出现在连阴天的雨季,勘察和施工时都应注意检查一下望板是否有糟朽现象,如发现可考虑采取勾抹、更换瓦件或局部揭瓦处理,如糟朽望板之上灰背较好,仍有一定强度,从屋内对望板进行修补,室外做好瓦脸勾抹,或对屋面重新裹垄,这样也可以维持多年,并非现在就采取全部挑顶重做屋面,因为我们应该坦率的承认,目前我们的修缮综合质量已远远达不到古建筑原物的历史水平。因此,带病延年的理论在古建筑的保护中是科学的。

(二) 砖、石件风化及残损

1. 石件风化

目前古建筑中砖、石风化现象较为普遍,在汉白玉、砂岩类石件中较为突出。在国内,石件的化学保护虽已实施多年,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连业内人士仍有不同意见。因此,长期以来石件保护研究工作难以取得大的突破。

近年来,随着文物保护经费投入加大,许多单位的科技部门和专业设计单位都在加强化学保护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北京在

化学保护方面十几年来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实践说明化学保护在文物保护的措施中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当前石件保护行之有效的的方法之一。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文物建筑科学保护将是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方向。鉴于各方面条件所限,目前大面积实施还应十分慎重,对于已不可能带病延年非实施不可的项目,实施前应进行可行性研究,要对实施效果的利弊进行充分的分析,经专家论证后再做出决定。

对于化学保护要客观的认识其实际效果。从本人所了解的情况看,目前化学保护所有材料仍以有机硅类为主,其中包括改性后的,其特点是有较好的憎水性和良好的透气性。在保护液中加入适量的添加剂,可增加风化部分的强度,以防止在外力作用下脱落,也可加入一定的消光剂,防止因操作不当而产生的少量炫光,理论上这种化学材料无色透明而且老化期都在十年以上,进口材料时间还可更长一些。材料在老化后分解为粉状石英体而自然脱落,对文物不会造成损坏,对于再次实施保护不会产生不良影响,即保护后具有可逆性。

当然,对于保护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人们也十分关注,如保护后的色调加深,老化期短、成本相对较高,操作难度大等。要解决这些问题,特别在石质风化程度不同的情况下,需要因地制宜,不同部位需要对配比做相应的调整,对于不同部位的不同情况,及时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确保操作流程。否则,涂、喷遍数多了会出现流坠和炫光,少了未充分渗透会形成表面硬壳的两张皮现象,以至于日后在外力作用下易造成成片脱落,风化严重或操作难度较大的部位尤其如此。在曾进行的化学保护项目中,这类问题比较突出,但通过施工管理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对于化学保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对策,如果弃之不用,那么面对包括故宫在内的古建筑普遍存在着石件风化日趋严重的问题,就等闲视之,任其发展?我想这毕竟不是上策,加强业内人士的合作,共同研究,总结经验,采取积极对策,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对于决定实施化学保护项目,是否可以以下四个方面把握:

第一,对于古建筑不能有无风化都做。目前应限于对风化严重建筑的抢险,对于石材粉化严重且已开始产生大面积脱落的现象,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应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构件文物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保护面积及周边环境等不同情况,量力而行。

第二,实行专家项目负责制,对技术、施工全权负责,不能像建筑设计那样由设计单位出个方案,施工单位直接采购成品,或找设计配好方,由几个民工照方抓药就开始实施了。化学保护对材料、工艺要求很高,专家可以根据多年经验,根据实施对象的实际情况,在施工中不断调整配方对症下药。如果由设计主持人指导专业技术人员直接负责操作,效果会更好。

第三,施工方案,设计要具有可操作性,不同石件、不同部位其不同的残损程度,做法和使用材料配比都会有所不同。要根据不同情况,对不同部位制定详细做法说明及材料配比,必要时应随时校对调整,以防止产生由施工单位看着办的失控现象。

第四,大面积施工应有试验阶段并经专家论证。在有把握情况下才可全面实施,还要充分考虑实施对象所处的环境条件因素,以及实施时的天气状况,这些往往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保护效果。

2. 砖体的风化

目前,砖体风化较之石构件风化更严重,只不过由于其更换成本较低,很多较严重的,都采取重新拆砌等办法解决了,随着修缮规模不断扩大,加强砖体酥碱保护更加迫切,特别是对于价值较高的文物的保护,有些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故宫在这方面做了多年的试验;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如果条件具备应该尽快予以推广。

砖砌体保护,目前采取的方法主要还是传统的抹面或剔补等物理保护措施,这种做法使文物外观在修缮后可得到一定改善,但对文物本身也会产生一定损坏,对于酥碱面

积较大,一般只能按原状重新拆砌,这种做法往往对原文物价值损害很大,其最终效果更是值得研究,如质量保证、安全问题等方面。

另外,建设单位在安排修缮时往往对于酥碱墙面的保护,许多情况下是由经费多少来决定,钱少就用灰抹后画缝,有钱剔凿挖补,钱多也有提出重新按原状建。前者简单,省钱外观得到改善,但不延年;“剔凿挖补”则可使“外观改善”且较前者延年,但对风化深度仅几公分的墙体来说,全部剔掉、整治修补,一是费工费料,文物价值本身损失也大。二是因补砌严实难度很大,易在结构安全上形成一些新的隐患,大面积实施也会使墙体的文物价值大打折扣。重砌的做法应该严格控制,这是对文物价值损坏最大的一种做法。虽然外观新了,但与文物价值的减少相比有些得不偿失,这种做法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近些年,北京从故宫围墙修缮开始对酥碱严重的墙体保护措施做了一些探索,逐步改变过去一概采用传统意义上的“剔凿挖补”,只要求去除酥碱等病害部分,然后根据缺失部分尺寸,用同材质材料进行局部镶嵌补齐,减少因剔凿给古建筑带来新的扰动。修复后墙体外观同样可以得到改善,如使用色调相似的旧砖修补效果会更好,这种做法消除了整块剔补,给墙体可能带来的新的隐患,使墙体的安全性大大提高。这方面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施工难度较大,费工费时,酥墙深度不大的部位补条较薄,补配损耗较大;二是技术要求高,施工技术人员要严格按设计意图去操作,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其特点是,较原“传统”做法施工量会有较大减少。从故宫围墙的三期修复看,效果比较明显。修复给文物本身的伤害减到了最小程度,结构安全上更加可靠,一定程度上还节省了资金。

对砖体保护除以上所说,还有化学保护措施,这只是针对酥碱程度轻、对外观影响要求不大的一类砖砌体。所用材料仍主要为硅类,但目前处在实验阶段,尚未听说有大面积的实施。几年前在香山团城演武厅

城池、大钟寺、故宫做过一些这方面的试验。砖体化学保护是在物理保护基础上的一种补救措施。主要针对砖体酥碱不太严重情况,当然对这类砖体实施时要求墙体湿度小,这种措施对于不宜抹灰,又不宜补条的砖体保护效果较好。目前,从做过试验的情况看,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在满足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护古建筑价值的要求。

总之,无论是砖还是石的保护,关键是要对造成病害的原因进行科学的分析,先找出病因,再寻找解决的办法,既要慎重,又要本着一种积极负责的精神。同时也要考虑对文物建筑周边环境的整治,对城市污染源进行改造,恢复室外地坪,解决排水问题,以最大可能减少砖体湿度等。

(三)大木结构糟朽变形

大木结构为古建筑的主要结构材料,其损坏程度往往决定了维修工程的性质。抢险加固工程,是针对古建筑险情所采取的、临时性的、加支撑等附加构筑物应急的安全措施;维护保养工程,主要是指以日常保养性的工作为主的维护工程。如屋面除草、零星的小修小补、室内油饰、粉刷以及零星的补配等;维修工程,又可分为一般性维修和重点维修工程。一般性维修包括:少量的大木修补和墩接、屋面局部揭瓦、墙体修补、局部择砌、地面修补局部挖补、油饰彩画以及化学保护等;重点修缮工程包括挑顶打伞拨正,局部及全部大木落架及墙体大面积重新拆砌等。

目前,大木维修主要是柱子墩接、加附加梁、柱或其它附加支撑等。在保护措施的选择上应该十分慎重,特别是在大木更换等问题上,应严格遵守木结构加固规范的要求,通过修缮不仅要保证文物建筑的结构安全,也要保证其加固后外观与建筑的协调,同时要最大限度的保护文物原结构的完整性和文物建筑原有的结构、工艺和做法。做到这一点,对现状损坏程度分析判断的准确性来说至关重要。

文物应以修为主,大木加固是修缮中需

要考虑的第一要素。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忽视技术规范中强调的损坏程度超过规范应优先考虑加固的这一环节,只注意强调“超过规范必须更换”,使文物建筑在维修中木件更换量过大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知道,年久失修的古建筑经过大修甚至一般维修,文物原构件及价值损失量就已很大,如果再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更换量,就有可能使修缮后的古建筑的文物价值降低很多。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其理由不外乎就是“安全要求”、“发挥文物使用价值”、“外形美观”等三点。

我认为,修复后的古建筑外观效果固然重要,但也不能仅仅是金碧辉煌,干净、整洁、和谐,能够使人们从外观充分感觉到文物的价值之所在这是最根本的。古建筑修缮应该坚持在文物保护原则的基础上,更注重保护它的原真性。修缮质量也应该是以文物修复后文物结构安全程度和文物建筑原状保护程度为基础进行综合评估。当前,在古建筑修缮究竟是修旧如旧还是金壁辉煌这个问题上仍是各有说辞,归结为一点,还是文物保护观念上的认识问题,我想修缮古建筑的目的应该首先是通过保护使文物能够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状况,消除安全隐患。其次就是要医治和减缓病害,抑制险情扩大的趋势,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的历史信息。三是有利于发挥文物的社会价值作用。为此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 柱子勘察。现在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扒柱门,检查柱子是否糟朽,工程涉及范围的柱子,凡有包砌,都要拆开检查,这种比较盲目且常见的检查方式,会使许多古建筑中没有问题柱子两侧的墙体也同样被“开膛”,会给文物造成不必要的损害。在这方面,可否不要千篇一律,可否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如采取钻探等一些更科学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尽量减少因对古建筑的修缮而给文物带来的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2. 对于糟朽程度进行科学的分析。现在古建筑修缮方案中,惯用的一句通俗话就是“糟朽严重”,好一点的,描述一下糟朽高度

和深度,未做勘查的则在说明中注明“待施工中进一步勘查后再定”,在实际修缮中这类方案操作起来比较困难,给修缮工作带来一定难度。因此,加强勘查工作十分必要。建设单位要为设计勘查创造必要的条件。鉴于一种病害在建筑的不同部位,采取的保护措施也不尽相同,不同年代的构件,价值不同,采取的保护方法也会不同,需要仔细研究、具体分析。要查清糟朽原因、深度、高度和具体位置,同时要说明结构的安全状况,以上这些最好不用形容词,如严重、比较严重、十分危险等,要尽可能用数字量化。

3. 维修木材的选用。这也是文物保护工程百年大计和质量好坏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当前,木材含水率普遍较高,如果使用这些含水率较高的构件,日后木材极易变形糟朽,从而给古建筑埋下新的隐患。这个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顺便想说一下,虽然修缮时木料含水率符合要求,但修复中由于施工和天气的原因,还会出现二次含水率超标的问题,需要我们掌握合理的工期,不要只看木材表面干了就进行油饰封护,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恢复隔年开春油饰这种好的传统,以确保古建筑百年大计。

(四)地基基础沉降问题

地基基础沉降是目前古建筑出现险情的重要方面,表现有墙体开裂、大木架走闪、局部柱顶石下沉等,其形成原因不外乎地震、大木糟朽、院落积水或地下工程等造成的。

修缮首先要查明确切病因,同时也要查明病害的出现时间,近期的发展趋势。要从现象上注意去分析,修缮中发现不少裂缝是地震瞬间造成的,地震过后长期处于较稳定的状态,这种情况从外观看多集中在内侧有柱的外侧墙面上,裂缝上下缝宽度差距不大,除个别山区外,沉降不明显,如仅此而已,这种情况应继续观察,不必大动,修补即可;由大木糟朽造成的下沉,轻者可以维持现状继续观察,一般情况可适当卸载、支顶

加固和墩接柱子等处理即可,对于比较严重的,可在论证的基础上,采取更换等措施解决。

对于地基基础的下沉,要认真分析原因,如果是早期就已形成的,现状结构似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可以考虑现状保护,定期观察。但对于具有发展趋势的问题,应针对起因采取必要的措施,根据不同的情况可分别采取疏通排水,保证上下水、暖气管道等不出现渗漏,对地基基础进行打桩、锚杆等方法进行加固,防止险情进一步扩大,对于危及结构安全的,可在专家论证的基础上考虑落架,重新修复基础,特殊情况也可适当考虑打桩,运用增加地梁等新技术,处理地基基础。当然这些需要有勘察报告、计算等比较科学的数据分析的支持。总之,还是以最小干预为原则,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力争把因加固对文物造成的损坏降低到最小限度。

威尼斯宪章第九条中规定:“修复过程是一个高度专业性的工作,其目的旨在保存和展示古迹的美学与历史价值,并以尊重原始材料和确凿文献为依据。一旦出现臆测,必然立即予以停止。”^①勘察不到位、工作不细、凭经验生搬硬套、照猫画虎、随意改变原建筑做法、提高建筑做法等级,改变了文物原状,这些都谈不上古建筑合理性保护措施。

综上所述,要做好古建筑的保护工作,做到古建筑保护措施合理,要有很强的文物保护意识,认真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能使文物建筑的保护措施更加合理、有效,这是我体会最深的一点。

①《中国石窟遗址管理培训班国际文化遗址管理参考资料》,国家文物局教材,1992年10月,223页。

②国家文物局教育处编译《国际文化遗址管理参考资料》,1992年,第154页,《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简称威尼斯宪章)。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副处长)

从不恰当的商业化中

挽救大观园的重要文化财产

并发展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和旅游潜能

杜大卫(著) 赵忠林(译)

本文旨在对作者此前所写的题为“关于中国博物馆和文化景点如何增强自给能力并使其教育价值最大化的思考”一文中的点子和建议提供一项实例研究。前文已发表在本杂志 2004 年第 2 期,它讲述了中国博物馆和文化景点必须进入市场和对资源进行创造性的开发以适应市场经济的挑战,扩大其自我筹资能力和减少对政府投资的依赖。不过在本文中作者仍主张对于某些具体的项目,如果争取政府的投资有可能性,仍然要尽一切努力增强自己获得日益有限的政府资助的竞争力和合理性。

因为需要资金,所以大观园向着“非红楼梦”商业化方向发展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发展趋势危害到了该文化景点存在的最根本的理由。应当努力发挥该园与著名小说《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的独特的联系、提高该园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运用其资源教育城市中的年轻一代、宣传该小说的文学艺术价值、促进其艺术表现力、争取更多的公众和私人资金。那么该怎样做呢?大观园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市场或者说广告基地——“红楼梦学会”和“红楼书

画社”,红学会每月在这儿活动一次。既然他们与大观园有着天生的联系,至少他们受益于大观园为他们每月一次的活动提供最为合适的场地,他们理所当然的是如何保持大观园的独特性的建议者,使其更加符合作为小说《红楼梦》中最著名的一处所在的条件和情景。向该学会请教并获取建议会给他们形成一种心理影响,使他们对争取提出能被采用的建议更有兴趣。

以下是笔者的一些建议,可能有益于大观园的发展和建设:

1. 极大地提高“红楼梦礼品商店”的商业潜力

用正确的方法,从商业性的角度提高大观园与“红楼梦”的独特联系,将它做成一个最著名的、全面的、大范围的、专门出售有关“红楼梦”的书籍、CD、DVD、录音带、卡片、信笺、图片、剪纸、扇子、珠宝、手饰盒、手绢、围巾、镜子和其它种类的具有独到的“红楼梦”的主题或与“红楼梦”有联系的礼品的专卖中心。很多类似的东西已经在市场上可以见到,但是将所有的这些东西集中在一个

中心,会极大地提高大观园的商业地位。有很多“红楼梦”的爱好者愿意购买这些东西用于收藏或馈赠朋友。大观园接近市中心的地理位置,使它在这方面具有其竞争者所不能比的巨大优势,例如曹雪芹纪念馆就远远地处在城市西北角的植物园中一处偏僻地方。

由于如此一个商业行动与一个“真实的”大观园不相协调,因此该商店应坐落在一个合适的、不惹眼的、但却方便到达的地方。主商店应当由大观园的管理机构直接管理,因为其供销渠道必须被严格控制并且需给不同层次的会员和捐助者(下面要进一步说明)提供优惠。

2. 建设一个优秀的红楼梦书店并逐步将其发展成一个红楼梦图书馆和研究中心

把大观园现有的手工艺品和纪念品中心建成一个研究性图书馆,在大范围内有关“红楼梦”的汉语、英语和其它语言的书籍,包括儿童版本都应列入收藏之列。儿童版本有助于开拓新一代的“红楼梦”读者,例如,如果这些儿童版本做得好,可以成为红学会成员送给孙子的绝好的礼物。假以时日,如果大观园在收藏书籍和材料方面获得好的声誉,则可能买到或获得一些已绝版的老版本和手稿及捐赠。发展过程中,该图书馆应当获取一些有关“红楼梦”的注解和其它资料,逐渐地它就发展成为一个“红楼梦”教材和学习材料的主要基地。“红学会”则可能会很高兴地向外推荐这个商店,而且就商店中应当收藏什么样的资料提出建议。为了鼓励“红学会”成员们热情支持该商店,应当在礼品和书籍上给他们提供至少 10% 的优惠。

在礼品店、书店和研究中心发展以后,大观园应将“红学会”每月一次活动中的讲授内容制作成高质量的录音资料,使人们能从上述礼品店、书店和研究中心得到这些演讲或讲授的内容。再给这些磁带提供一个抄本作为可供选择的或配套的材料则更好(当然制作上述录音或抄本时应得到演讲者

即著作权人的同意)。给演讲者制作录音资料也是向演讲者表示尊敬的一种方式,这会使出席“红学会”活动成为一种荣耀,进一步提高被邀请出席会议者的声誉。在一些特别的研讨会中,所发表的演讲还应当被收录并仔细地编入目录以备研究之用。

大观园应当邀请著名的“红楼梦”学者制作一些特别的演讲录音,以提高该研究中心的声誉和作用。当设立“大观园红楼梦”书店和研究中心的主意被付诸实施,从而被认真的学生、学者作为一个适当的学习和研究的地方,并因此而享有声誉后,大观园便更容易从北京政府、教育、文化、旅游等部门获得资金。

当“红楼梦”书店、研究中心发展起来后,会员卡的年费也应得以提高,会员卡的作用是持卡人可得到减、免门票的优惠,还可在礼品店和书店购物时得到优惠。

在建设研究中心时,大观园可以从“红楼梦”爱好者中吸引私人捐助。这些慷慨的捐助者愿意以捐助换取特别的优待和荣誉:免门票、在礼品店购物时享受优惠、在红楼梦系列讲座或其他活动中保留前排座位、与著名的来访学者拍照的机会,等等。

3. 建设一个更有趣、更有吸引力的大观园

目前园中的院落和房间内看起来干巴巴的,布满灰尘,毫无生趣,更象一个没有生命的博物馆。这个地方应该更活泼、更“真实”。每个院落中应该有一个“导游”,着下等丫鬟的服饰,假装女主人和上等丫鬟不在,可以让游客看一下“小姐”的房间,告诉游客有关的故事并回答有关问题。因此房中的蜡像应当移去,把“她们”安置到别的适当的地方展览。每一项工作都应围绕“使房间有一个生动的外表”的中心主题展开。房间中应当燃特别的香料,到了冬天,火盆中应当用真实的木头或木炭生火,或者用某种电子的仿真手段使它们看起来象是炉火很旺的样子。房中应有来自花园中的应时花卉,主人的物件应摆放在适当的位置,几上要有茶杯和书,桌子上要有“零乱的”画稿或

书稿,看起来就象是刚刚用过似的,应当有在那个时代被普遍运用的房主的应手物件。房外的院落内同样应该是“真实的”,院中应能看到住家所用的水缸、扫帚等。甚至园中的花工也应当穿上当时的服饰以显得更具有真实性,并且,如有可能,尽量用当时的养花工具来工作。所有的这些全都可以做得象美国的“威廉斯堡”历史文化遗址那样展现美国17世纪上半叶美国人的生活,或者象朝鲜汉城外的“文化村”那样展现老朝鲜的历史文化生活。这样做可以极大地增加游客的兴趣面,使人感觉看到了红楼梦人物的真实的私人生活。

4. 利用“红楼梦”中的细节提高公众的兴趣和大观园的吸引力

夏季每月的第一个周末——“红楼梦活动”

“大观园”应按其在书中已经存在的舞台形象开展大众活动,如:中秋月夜、红楼会、贵妃省亲服装表演来吸引客人参加具体活动,以提高自己和社会中的形象。这样的活动应当被极广泛地大众化,且在固定日期举办,如在夏季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六。“红楼梦”中发生的特殊的活动应当在大观园中得到定期的再现,例如:元春省亲,贾母八十寿诞等,采用适当的演员、活动、音乐、焰火进行表现。确保在固定月份的固定周末举办活动会减少做广告的必要,仅通过大众口头宣传就会使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些“夏月的第一个周末活动”系列既会成为北京人自己来此进行娱乐的活动,也可成为他们邀请城外的客人来参加的活动。他们还会成为受旅行社欢迎的节目,旅行社可以组织那些读过《红楼梦》的游客和希望有一次文化体验的游客来参加这种活动。

京剧表演

为了吸引对中国文化有特殊兴趣的人群,每年的某月的一些具体的日子可以用来上演《红楼梦》中提到的京剧。起初这种表演可以做为“夏月第一个周末活动”的一部分,但当它变得相当受欢迎后,就可以将其

分开为一个单独的有固定日期的活动。由于全本戏表演在北京非常少,因此举办年度或定期的全本戏表演以使其众所周知,并为演出配备适当的餐饮和预留座席等,或许会成为一项非常受欢迎的活动,因为它是如此的少见。在夏月的露天环境中演出全本或折子戏将比在长安剧院和梨园剧院中演出更独特、更真实。

“红楼梦”风格的野餐和宴会

“红楼梦”中有趣的事情之一是它所细致描述的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生活。其中描述得相当细致的方面是为野餐准备的食篮子(食盒)。大观园的饭馆已经享有很好的声誉,因此它可以研究一下书中所述,然后应来园中野餐的人们的预订,为他们准备食盒,甚至还可以送到园子外面的地方去。由于饭馆内的餐桌上已经有了那些真实、恰当的菜肴,因此准备一些食盒当非难事。

“红楼十二钗”模仿比赛

“红楼十二钗”模仿比赛最初可以作为夏月第一个周末活动的一部分,以后当它变得很受欢迎时,就可以拿出来单独作为一项活动。不必要求比赛优胜者的长相与电影或电视剧中的演员的长相相似,而是要求参赛者符合书中对她所参赛的人物的面貌、衣着、举止动态的描写。做为参赛内容的一部分,可以要求她们背诵一些与其所扮演的人物相关的句子或段落。

红楼梦年度绘画比赛

为了激发对“红楼梦”的兴趣和提高大观园在文化圈中的形象,大观园可以主办“红楼梦”主题的年度绘画比赛。在宣布优胜者之前,可以将入围作品展示几个星期。对颁奖仪式和获奖作品要进行适当的新闻报道,获奖作品应作为大观园的一项财产,在园内适当的地方常年展出。

高中学生“红楼梦”主题小说比赛

为了进一步激发年轻一代中《红楼梦》爱好者的兴趣,也为了继续在公众面前树立大观园的形象,红学会和大观园可以主办年度“红楼梦”主题小说比赛,对优胜者给予适当的奖励并为优胜者和他的一定数量的朋

友提供免费游园的机会,同时也应进行适当的新闻报导,特别是好的作品要在红学会的活动会议上由年轻的作者进行朗读。

仿古着装参观

为了增强园内的真实性、节日性和为园中的活动增加有趣的形象,那些身着符合“红楼梦”时代的服装来参加任意一次活动的人可以被允许免费入园。这是一项在美国南加里福尼亚州的文艺复兴节上运用得非常成功的技术。

持续播放电视剧

为进—步增加游客(不论其对“红楼梦”或其电视剧熟悉或不熟悉)的感受,园中专门有一个地方连续不断地播放《红楼梦》电视剧中的主要、精彩的片段。这样做可以提高“红楼梦”DVD的销售量,唤起那些曾读过《红楼梦》的游客的记忆,给那些从未读过《红楼梦》的人作一个简短的介绍,促进礼品商店中的销售。

5. 保持大观园中的历史真实感

很显然——如目前所做——在大观园中开小吃店和在房舍中开礼品店都与其历史不相适应。在园中的一侧应当用某种形式的墙隔出单独的一块地方,使其看起来象是在“真实的大观园”的外面,仿老北京的小吃店等可以设在这里,这里的服务人员都着古装,甚至食品都要尽可能地做得象那个时代—样,这样的—个地方会独具吸引力。

一旦条件允许,所有其它的与“红楼梦”主题不相符的商业行为都应当搬出大观园。它的独特之处是:它是小说“红楼梦”塑造出来的著名的大观园,而不是供小孩子周末娱乐的场所。

6. 潜在的资金源泉

政府支持:如果大观园的真实—性得以提高,它的书店、图书馆和研究中心得以发展,应当向市政府,文化、旅游或教育等部门提出申请和建议,以获取对这个有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和教育景点的资金支持。

中国和国际红学会:应当向国际红学会或其成员直接发出请求。如果有十分详细的计划,能够为每个捐助者提供如何运用捐资的严格的、透明的帐目,并且每年公布总帐目,就会鼓励那些潜在的西方的捐助者们提供捐助而不必担心他们的钱被“腐败”掉或被不正确地使用。

公司捐赠:也要争取来自北京大企业的捐赠,这些大企业愿意用捐赠的方法向社会表达他们的感谢之情,也要号召公司主办前文提到的有关“红楼梦”的文化活动。

“大观园”或“红楼梦”俱乐部会员年费:在礼品店、书店、饭馆,各种级别会费的会员将被给予各种级别的优惠,而且会员还会在大观园活动中享受到邀请和预留座位的特别待遇,会费意味着具体时间内的具体数量的钱,它会—使已列入计划的管理预算更可靠。

7. 结 论

每项努力都必须围绕着保持大观园的独特之处和它的目的展开,虽然这里提出的很多建议仍然带有明显的商业主义色彩,但是眼下的与该园的存在理由不相关的、不正确的商业化必须扭转。必须投入极大的注意在正确的方法上开发其与世界著名小说《红楼梦》的联系,成为中国人享受自己文化的一个途径,成为向外国人介绍这一伟大文化的各个方面的—个独特的方法。然而大观园还具有发展成为—个最主要的“红楼梦”教育和研究中心的潜力,在这里,有兴趣的人们能够买到合适的素材和物品进行研究,普通市民和游客能够通过参观那些院落、或参与诸如“夏月每个周末”之类的活动,来匆匆领略—下书中所描写的中国文化的真实生活。这一目标确实值得为此付出极大努力并应受民众和政府的支持。

(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客座教授、博士,译者为北京大学法律系在职研究生)

北京地区馆藏文物

腐蚀调查报告

一、项目简介

我国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馆藏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馆藏文物损失及保存状况调查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也是国家制订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和规划的基本依据。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程度不断提高,馆藏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但仍存在缺乏大规模的保护资金投入、馆藏文物遭受损失情况不明、文物档案不健全等问题。为了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加强管理、合理利用”的文物工作方针,国家文物局于2002年向财政部申报开展《全国馆藏文物腐蚀损失调查》项目,旨在通过对全国范围博物馆等相关单位的调查分析,全面、深入了解我国馆藏文物

的损失现状、程度及其原因,为馆藏文物保护管理的决策、规划、计划提供科学依据。项目的目标是全面调查全国馆藏文物由于自然因素同时兼顾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失情况,并尽可能量化指标,科学推导和研究出对应策略和相关建议。此项目于2004年9月在全国全面展开。

北京市文物局作为北京地区馆藏文物腐蚀调查工作的承办单位,成立了北京地区馆藏文物腐蚀调查组,组织北京地区各博物馆、区县文委、研究所等共119家单位进行了网上数据填报,并就上报数据进行了汇总分析等大量工作,于4月初向国家文物局上交调查报告,这标志着这一工作已初步完成。

北京化工大学的许淳淳教授在对金属文物进行调查时,使用了腐蚀这一概念。本次调查也借用了这一概念,泛指各种材质的文物由于受到人为、自然因素影响而破坏,向着衰败——损坏——消失的方向转化,致使文物的保存使用寿命受到严重威胁的过程。

二、调查统计情况评估与分析

(一) 调查单位的级别

本次调查统计仅限于北京市级和区县级馆藏单位。其中博物馆 61 家,文管所 20 家,合计 81 家单位。市属单位 37 家,占 45%,区县级单位 44 家,占 55%。

(二) 文物库房环境和设施

从调查情况看,在北京市级 37 家文物馆藏单位中,有 13 家文物库房有温湿度控制,有污染物控制的相对较少,为 7 家,多数文物收藏单位库房条件需要改善或者扩建、重建。

区县级库房的条件和情况比市级单位更差一些。在区县 44 家文物馆藏单位中,仅 5 家有温湿度控制,2 家有污染物控制。这些单位基本上以文物安全防范为主,确保文物安全是第一要务。有些区县如延庆县及大兴区文物管理所尚未建立综合性博物馆,出土文物及征集的传世文物均收藏在文物管理所库房内。西城区文物管理所收存的文物始终保管在临时库房中。尽管条件相对较差,有些馆藏单位的文物价值却极高,如云居寺库房缺少恒温恒湿设备,但石刻佛教大藏经、明代纸帛经书、清代龙藏木版经同属国家一级珍贵文物,每年因腐蚀所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没有温湿度控制、面积狭小、文物保存环境恶劣是大部分库房存在的问题,这是导致文物腐蚀的一个重要因素。

没有温湿度控制使得容易受到温、湿度影响的文物发生腐蚀,如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标本对湿度很敏感,在雨季湿度大的季节,陶器变得酥松,石膏硬度降低,更易破碎、霉变;北京民俗博物馆部分纸制品、木器出现开裂;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的象牙出现开裂;明十三陵博物馆的纺织品逐渐脆化、褪色;中国体育博物馆的部分字画被虫蛀或者发霉。

库房面积狭小,使得文物存放密度过高而导致损坏。如明十三陵库房服饰柜架狭小,出土的衣服不能完全展开,造成文物的损坏;门头沟区文物管理所藏乾隆年间的纸制品因叠压在一起,稍一移动就剥脱脱落;中国体育博物馆的部分字画只能重叠摆放,有的因被压挤而破损。此外,库房面积狭小,藏品集中于一处,无法满足不同类别藏品所需要的不同的保管条件。

库房及展厅的密封不严密,尘土也是影响藏品管理的一大问题。明十三陵博物馆和北京自然博物馆都存在这一问题。

不采取措施防范光等对文物有害的物质,使一些对光线特别敏感的文物展品如纺织品等发生退色、脆裂。

有的博物馆甚至没有专用库房。如梅兰芳纪念馆藏文物资料数万件,馆内没有专用库房,文物存放密度大,加之各种保管设施不健全,给文物保管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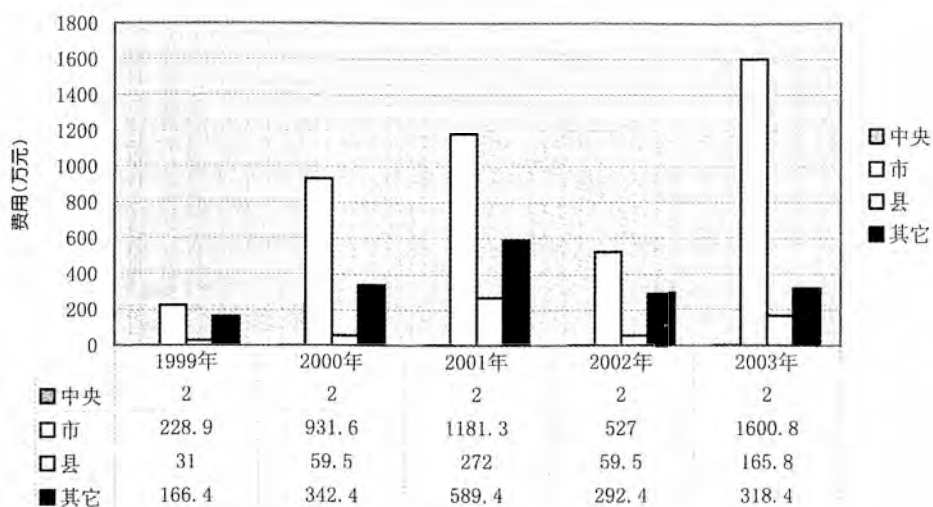
有些文物因为库房无法解决只好露天存放。如中国航空馆、北京航空馆的飞机、雷达等军事设备,老化严重,每年因腐蚀造成的损失分别约 300 万、3 万元;中国第四纪冰川博物馆的冰川受到自然环境的腐蚀,原有的擦痕已模糊不清;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在露天陈列的大部分石刻都有不同程度的风化,每年经济损失约 10 万元;密云县博物馆征集的石刻,散落在院内,风化严重;正阳门、智化寺等博物馆露天存放的石狮有风化和人为刻画现象;大觉寺因自然风化、腐蚀等原因造成的碑刻、佛像等文物残损的现象较为严重;北京钟鼓楼文物保管所的乾隆御制碑碑身多处风化。

调查表明,库房、展厅的保管、保存状况亟待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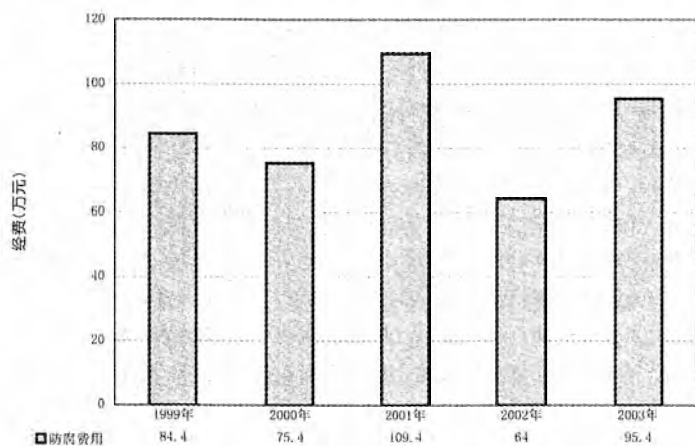
(三) 从事文物保护的人员状况^①

1. 职称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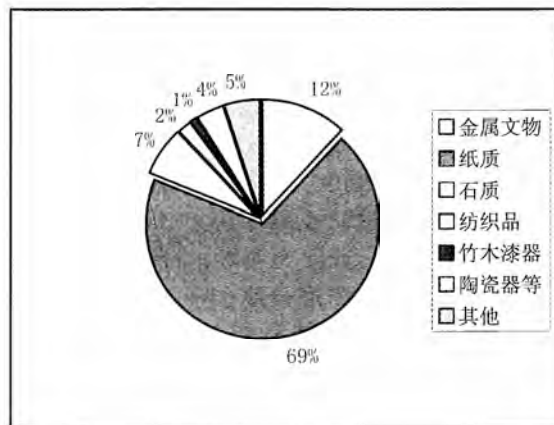
从事文物科技保护的人员,正高级职称市级文物馆藏单位 1 人,区县级 0,副高级职称市级和区县级单位分别为 9 人和 3 人,中



北京地区各级财政年度专项经费投入(1999~2003年)



北京地区部分馆藏单位年度专项经费用于防腐费用(1999~2003年)



各类文物分类比例表

级职称市级、区县级分别为 20 人、19 人；初级职称市级 32 人，区县 82 人^②。市级及区县级各级人员比例情况为，市级单位：高级 16.1%，中级 32.3%，初级 51.6%。区县级单位：高级 2.9%，中级 18.3%，初级 78.8%。

可见，职称情况同文物库房情况相类似，市级单位要优于区县级单位。

2. 专业结构

从事文物科技保护及修复的理工类人员所占比例普遍偏低，市级单位所占比例为 40%，不到全部文物保护人员的一半。区县级单位所占比例更小，为 32%，如平西抗日纪念馆一人身兼多职，缺乏专业人员。

有些专题类或行业性质的博物馆，在文物保护、修复方面的人员匮乏，如中国体育博物馆、中国印刷博物馆、北京工艺美术馆等单位，至今没有这方面的人员。

(四) 经费情况

1. 专项经费^③投入情况

从 1999 年至 2003 年统计情况看，中央财政专项经费保持不变，均为 2 万元；北京市的投入基本上是逐年递增的，近几年的平均投入约在 821 万元左右。相比较而言，区县级财政投入较少，但基本上也呈逐年增加之趋势。表格显示，在 1999 年以后的 5 年之中，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普遍提高，尤以 2001 年度的投入偏高。

2. 文物防腐蚀经费情况

用于防腐蚀的专项经费呈波动状变动。从整个专项经费投入的情况看，防腐蚀经费分别约占每年专项经费的 19.7%，5.6%，5.3%，7.3%，4.6% 左右。近几年防腐蚀经费仅占整个馆藏单位专项经费的 6.3% 左右。

北京航空馆在此次调查中指出：“我馆作为一个大学博物馆，各种人才、技术资源是极为丰富的，缺的就是经费”。这句话发人深思，可见经费是制约开展文物保护和修复科研项目的首要因素。

3. 文物保护和修复项目情况

根据统计，文物保护收藏单位的文物保

护和修复科研项目寥寥无几。市、区县开展相关研究项目的经费来源大部分是市文物局和单位自筹资金。

(五) 文物类别分析

从文物类别情况分析，北京市除中央级博物馆外，现有馆藏文物 62 万件，其中珍贵文物 444 万件，一般文物近 18 万件。珍贵文物占有所有文物的 71%。从文物材质属性考虑，受环境影响而最易遭受腐蚀文物为纸质文物、纺织类文物、青铜器、铁器、漆、木器、壁画等。从文物质地分类情况看，纸质文物占 69%，金属文物占 12%，石质、其他、陶瓷器、纺织品、竹木分别为 7%、5%、4%、2%、1%。可以看出，北京地区馆藏文物绝大多数为最易遭受腐蚀文物，其比例约占 81%。

三、文物腐蚀案例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项目组共收到了 46 篇文字资料，对本单位文物腐蚀状况做出文字和图片的补充。因篇幅有限，本报告只选取了代表性较强的 4 家单位（其中市级、区县级馆藏单位各一家，提供处置不当案例和研究型案例各一家），来进行文物腐蚀案例的说明，借以增进大家对文物腐蚀工作严峻性的感性及理性认识。

(一) 案例 1

被调查单位：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级别：市属单位

1. 库房环境状况

大葆台汉墓发掘于 1974 年，1983 年建成西汉墓博物馆。建馆后，文物库房设在潮湿的地下室近十年，湿度大，且不通风，对文物保存极为不利。后来库房迁至三间小平房内，但室内仍然没有通风设备和温湿度监控设施，保持自然温度环境，相对湿度偏高，夏季有霉变的味道。

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文物库房基本情况调查表（见下表）

序号	库房(展厅)名称	文物总数(件)	库房(展厅)面积(m ²)	温湿度控制	污染物控制	备注
1	文物库房	806	170.00	否	否	早年建平房,无温湿控制设施
2	出土文物陈列室	341	130.00	是	否	无
3	临时展厅	74	280.00	是	否	无

2. 因自然环境腐蚀导致该馆收藏的文物消失或不可修复的典型实例:

例 1: 编号为 3XH30039 铁块, 1989 年登记数量为“3 件”, 完残情况为“完整”; 2003 年清库时发现锈蚀严重, 只余铁芯。(图 1)

例 2: 编号为 3XH40032 弯杆盖弓帽, 1989 年登记数量为“16 件”, 完残情况为“残”; 2003 年清理时发现锈蚀严重, 大多已不成形, 改记为“1 包”, 减少量达 15 件之多。(图 2)

例 3: 编号为 3XH60034 零星铜饰件, 1989 年登记数量为“2 包”, 1999 年登记时因锈蚀“合为 1 包”。(图 3)

例 4: 铁斧

出土于一号墓北面外回廊隔板外侧内。斧面光洁呈暗红色, 一面铸有凸起的“渔”字, 是首次发现西汉渔阳郡铁官作坊制品。高 10.6, 刃部宽 7.4, 釜长 6.4, 厚 2.8 厘米。这件“渔”字铁斧可能是我国最早有商标的实物, 现存于“出土文物陈列室”, 由于出土后一直未做过处理, 出土时清晰可见的“渔”字现已无法辨认, 文物价值削减。(图 4)

注: 以上 4 例文物早年没有拍摄照片, 目前提供为现状照片。

3. 分析

该馆库房面积狭小, 文物存放密度过高, 无法反映一些文物的真实状况, 如一号墓出土的黄肠木、棺板、椁板等大量木质文物只是简单地堆放在一起, 既无法准确计数, 也无法观察其保存情况, 压在下面的文物是否霉变腐朽, 情况不明。

由于无温湿度和污染物控制, 易受环境影响的金属、丝织品等文物腐蚀严重; 约占该馆文物总数 2/3 的金属器(铁器、铜器),

锈蚀最为严重, 如前面图片所示, 出现断裂、酥粉等严重病害, 有的已无法辨认其原有的形状; 存于展柜中的丝织品文物由于长期受紫外线照射, 保存的温湿度又不恒定, 已出现老化现象。

根据该馆《1982 - 2003 年藏品动态统计》显示, 1983 年应有藏品数量 1318 件, 2003 年实有藏品数量 1221 件。20 年间, 藏品减少 97 件, 其中因锈蚀导致数量直接减少的共计 23 件, 金属器存在不同程度的锈蚀, 并有加重的趋势。鉴于缺乏相应的衡量标准, 经济损失暂时无法估算。

该馆馆藏铁器锈蚀现象已十分严重, 如不加以处理将面临文物消失的危险。2004 年下半年在市文物局资金(4.5 万元)支持下, 已完成对部分铁器的化学保护处理工作。馆藏铜器保存状况比铁器稍好, 但出土以来一直未进行过任何处理, 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锈蚀现象, 应及早采取保护措施。近期需抢救性保护修复文物的数量较多, 经费来源紧张。

(二) 案例 2

被调查单位: 云居寺文物管理处; 级别: 区县级单位

1. 库房环境状况

珍藏明代大藏经、龙藏木经版的文物库房内缺少控制恒温恒湿的设备。长期以来, 库房内的温湿度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很难达到标准的湿度指标。

2. 因自然环境腐蚀导致该馆收藏的文物受损的典型实例:

例 1: 石经

隋唐石经是房山石经重要的组成部分, 属国家一级文物。把手伸进石经山藏经洞



图 1



图 2



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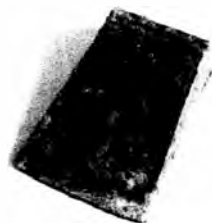


图 4

中触摸石经板,可以感觉到板上有沙尘脱落。每逢雨季能清晰地听到洞中滴水的声音。长期的山石渗水、溶岩侵蚀、大气污染等因素,已经危及了洞藏石经板。有些经板风化严重,表层开始成片脱落,还有的石经板表层隆起呈空臃状态,刻上去的字迹随时有可能剥落,隋唐石经的保护条件急需改善。

例 2:经书

云居寺珍藏的明代大藏经包括明南藏、北藏、手写经卷、藏文经卷、藏汉合璧经卷等种类。这些明代大藏经分属一级和二级文物,对温湿度的控制要求很高。多年以来,库房内的温湿度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尤其在雨季,库内湿度很高,虽采取了开窗通风的办法,但很难达到标准的湿度指标,经书已有不同程度的破损现象。少量经书有生虫、霉烂、粘连等现象发生。不仅在库房设施上需要改善,而且文物自身也需要采取脱酸、

清洗、加固、修复、防霉防虫等措施进行文物本体的保护处理。

例 3:经板

龙藏木版经是清代皇室下令刊刻的一部佛教典籍丛书,属一级文物。由于库房内的温湿度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这些龙藏木版经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腐烂霉变,经版上的字迹部分脱落。需要进行杀虫灭菌等文物本体的保护处理。

3. 分析

属国家一级文物的 4196 块石经现仍藏于石经山上九个藏经洞中,由于山水渗漏,石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风化现象,雷音洞西壁的石经字迹已是漫漶不清,急需抢救。此外,石经山缺少防盗报警装置,存在安全隐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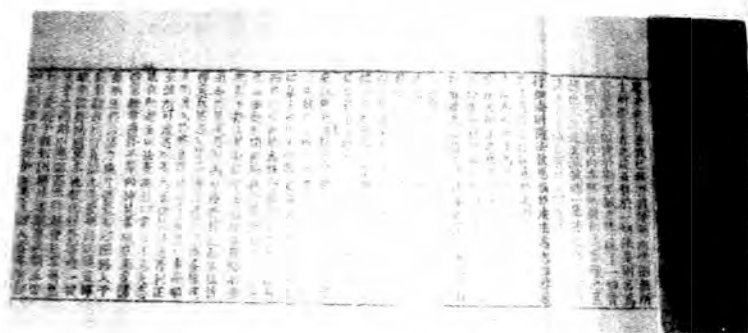
存放明代大藏经和龙藏木经版的库房内缺少控制恒温、恒湿的设备,这些纸质文物和木质文物容易随温湿度的变化而受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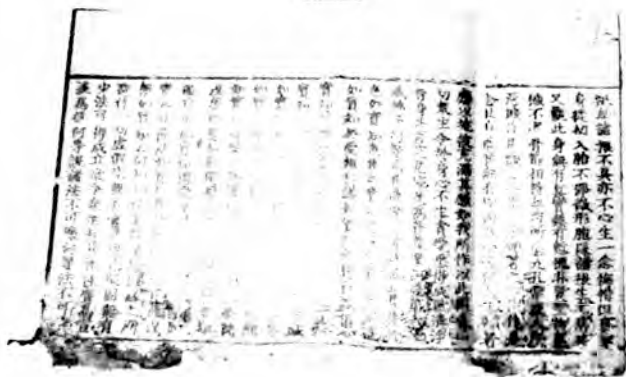
1957年出土时保存完整的石经板



目前的石经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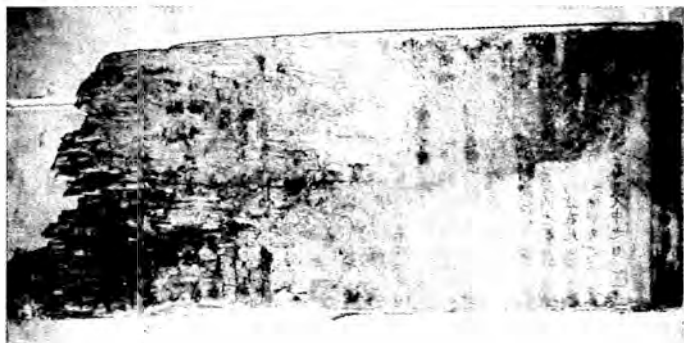
60年代保存完好的明代纸帛经书



目前的经书



60年代保存完好的木经板



目前的木经板

一到雨季,两个库房内湿度极高,不利于文物的保护。而且这两类文物都没有经过特殊的防腐防霉等文物本体的保护处理,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

文物保护修复人员的匮乏也是云居寺的困扰。

云居寺石刻隋唐大藏经、明代纸帛经书、清代龙藏木版经同属国家一级珍贵文物,而该单位文物保护经费不足、库房环境恶劣、缺乏相应的技术人员,每年因腐蚀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用数据来估算的。馆藏文物如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修复保护,将引起腐蚀程度加剧,最终导致文物腐蚀消失。

(三)案例 3

被调查单位:明十三陵博物馆;级别:区县级单位

1. 因文物保护技术不当导致该馆收藏的文物价值削减的典型实例

例 1:刚出土时,为了对丝织品进行保

护,对个别丝织品涂上一层有机玻璃,结果证明这种做法不妥,现在这些丝织品基本上粘连在一起,发硬,这是一大损失。

例 2:定陵出土了五件龙幢,由于打开时处理的方法不同,5 件龙幢的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两件出土时不太好定为参考品,采取的方法是用玻璃夹住龙幢,把它固定住,结果目前颜色还没有太大变化,保存得比较好,经专家鉴定升为二级;另三件出土时较好,定为一级,由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颜色严重褪色、脆化,结果降为参考品。

2. 分析

由于缺乏经费和专业人员的现象相对普遍,因而,在馆藏文物的保管处置中,由于方法不当而导致文物受损的现象应该不乏其例。尽管我局项目组工作人员一直向各单位强调,此次“馆藏文物腐蚀调查”工作旨在了解情况,与追究责任无涉,很多单位还是存有顾忌。象明十三陵博物馆这样不讳病忌医,切实地分析本单位工作曾经存在的

失误,以为后人之鉴的做法是很难得的。

我们从以上两例中可以吸收的经验和教训是:其一,如果没有成例在先,采取任何一种文物保护方案,需要慎之又慎。对文物采取保护措施之前,若能够选取样本进行实验,根据实验结果再决定是否可行,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对文物的伤害;其二,对馆藏文物采取的保护措施,应是在一个相对时期内,既可以克服文物“病害”,又是可逆的保护手段;其三,馆藏文物的质量,固然与出土时或者传世的“先天”情况密不可分,后天保管是否得当也影响文物价值的高低。

(四)案例4

被调查单位:北京警察博物馆;级别:市级单位

1. 因自然环境腐蚀导致该馆收藏的文物价值削减的典型实例

部分纸质展品褪色严重,如一张40年代的法院传票,已无法辨认出原有的表格和印模。

尽量减少照明时间。

2. 分析

作为新建行业博物馆的一个共性,北京警察博物馆人员均为本系统人员调入,以前未从事过此项工作。尽管条件并不优越——缺少专业人员、经费紧张,但该馆针对文物出现的问题,力所能及的进行专题调研,分析问题,并进一步为解决问题提出了可行性、操作性很强的解决方案。这种工作态度和方式是很值得提倡和推广的。

四、结 论

1. 库房文物保存环境

从根本上改善馆藏文物的保存环境以进行馆藏文物的保护已成为当务之急。维护文物藏品的质量,既取决于其材料质地,更取决于它所经历的环境,环境因素影响藏品的寿命。文物保护技术有治和防两个方面,我们不但要对已损文物进行抢救

针对上展纸质文物褪色严重的情况,该馆进行了专题调研,购置了专用照度表对展线照明状况进行了测试,发现指标普遍超过了国家的规定,光照度介于超标3—22倍之间。长此下去,会对上展文物造成严重伤害。

该馆已采取的对策有:一是对展出的三级以上纸质文物进行了复制更换;二是对其他较稀少纸质展品复制替换了一批。但该馆的特点是大量使用文件、证件、图片、服装布展,即使是这些展品的复制件,仍然害怕强光照射,并且如批量复制也需要很多经费。

因此,从上展文物安全的角度考虑,必须尽快对展线照明用光进行彻底改造。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该馆写出了《博物馆展线照明与文物保护》调研报告,提出了一个比较经济实用的方案,建议将展线照明全部改造为冷光型射灯。具体方案:a. 现有射灯的灯杯全部由安全型换为冷光型;b. 现有荧光灯均换为外置冷光型射灯;c. 以展线照明够用为准重新布灯,尽量减少超标的光照度;d. 重新启用原有的感应照明系统,性修复,更长期的任务是预防,即创造良好的保存环境,尽可能使藏品不再发生毁坏。为此,博物馆的环境应有利于藏品的保存,不论在库房收藏、陈列展览等各个环节里,都要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条件,使文物处于适宜的环境中,阻止或延缓其自然损坏过程。^⑤

从文物收藏单位的文物保管基本条件看,馆藏文物条件在国家文物管理部门的严格要求和监督下,基本上满足文物库房最基本的防火、防盗要求,达到安防和技防的基本标准。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文物保存环境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文物在库房因环境因素造成损失的现象普遍存在,价值损失难以估量。我市各级文物收藏单位大部分文物库房环境恶劣,需大量资金投入,方能改变目前的现状。

2. 人员情况

文物科技保护人员匮乏,基层文物保护人员专业技能不足,远远不能满足文物

保护事业发展的要求,现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北京相对全国而言是文物大市,也是文物从业人员的大市。但从人员统计分析情况可以看出,科技人员占从事专职工作人员的比例约 35%,明显偏低。从人员组成结构看,中青年占大多数,基本合理。从从业人员文化程度分布看,本科以上学历者,市级单位为占全体人员的 50%,区县级单位则为 34%。基层单位从事文物保护修复的绝大多数人员为本科以下学历,其专业知识和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因此,加大引进和培训专业人才的力度,提高从业人员专业技能迫在眉睫。

3. 专项经费投入和投向

从经费投入的情况看,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博物馆等文物收藏单位的投入逐年增加。但从投向来,重建设,轻管理、保养、维护等现象普遍存在。对防腐蚀的投入仅占专项投入的 6.3%左右,而且这 6.3%的经费主要用以库房的改造和改建,对文物日常维护经费几乎没有。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经费投资渠道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们对文物环境控制问题重视程度明显不够。

4. 文物材质及种类

从北京的情况看,绝大多数文物质地属于易受环境影响而遭受腐蚀的文物,如纸张、青铜器、铁器、纺织品、壁画等,约占整个文物数量的 80%以上。这表明,北京市的大多数文物极易受环境影响而遭受损害。同时,文物库房状况调查和文物保存现状调查数据也反映出馆藏文物受腐蚀而损坏的问题较为严重。

综上所述,北京地区腐蚀调查情况分析表明,目前我市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和状况是极为严峻的,多数文物保存环境恶劣,一些文物受到的腐蚀比较严重,已经失去文物的价值。很多单位在提交的文字资料中,强烈呼吁国家要切实关注并解决这一问题,对文物的珍爱之心溢于言表。要解

决这一问题,我局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各级领导、各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馆藏文物的保护及日常维护工作。制定出台文物保护工作的宏观管理工作计划和方案,并逐年落实。

(2)加大文物保护经费的投入。这是改善库房、展厅条件,进行文物的日常维护、保养及提高文物从业人员素质的根本所在。

(3)制定、完善文物行业各类标准及行为规范,使文物保护工作的管理规范化。

(4)从治理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入手,改善文物的保存环境和条件,如扩建或改建、新建库房,适当加大库房面积;设置温湿度、污染物控制设备;分级、分类存放文物;增设保护文物的囊匣等。

(5)加强文物保护人员专业技能的培养和提高,重视高科技人才和跨行业、跨领域相关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吸收。

(6)重视各类文物保护和修复的科学研究,因地制宜,解决和改善文物保护和修复的技术问题。

①此处人员,仅指从事文物保护的人员,并非馆藏单位所有工作人员。

②因无初级人员以下职称科目,故初级职称统计情况含初级以下职称人员。

③专项经费是指用于馆藏单位库房改造、保护修复等项目的费用。

④珍贵文物指一、二、三级文物。

⑤此段转引自明十三陵博物馆提供的文字资料。

北京地区馆藏文物腐蚀调查组成员

组长:主管副局长舒小峰

副组长:博物馆处处长刘超英

北京文博交流馆馆长王丹

项目组成员:李学军、郝黎、阎玉良

杨志国、孙素华、赵端

王娅蕊

撰稿:王丹、郝黎

“四有”工作在我馆业务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臧瑞平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不可移动文物中的精华,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研价值和举足轻重的科学地位。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就开始要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档案。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是在明代真觉寺旧址上建立的,金刚宝座是明代真觉寺的唯一建筑遗存,所谓金刚宝座,是佛教传说中佛祖释迦牟尼“成道”时所坐的石座。这个石座位于今天印度比哈尔邦的佛陀伽耶地方。公元 2 世纪中叶,人们在此地建起一座巨大的佛塔,其形制就是在高大的方形基座上,建起一大四小共五座佛塔,它们的位置是大塔在中央,四座小塔在大塔的四角,这就是金刚宝座塔。在建塔过程中,明代的设计、施工人员和技术高超的工匠们,把传统的华夏建筑艺术充分融入了这一格局。无论是五座宝塔的造型和结构,还是宝座的众多细部,乃至各种人物、动物、植物、器物等形象的造型和雕刻艺术风格,处处都洋溢着中国艺术的特色。从而使这座宝塔成为一件融中印文化于一炉的艺术杰作。因此,早在 1961 年 3 月,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的“四有”工作从 1980 年真觉寺文物保管所建立时开始,1987 年在文物保管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四有”工作继续进行。2004 年 6 月为加强对金刚宝座塔的重点保护,根据 2003 年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标志说明、记录档案和保护机构工作规范》的要求,在本馆原“四有”工作的基础上,经调整、充实,制定了新的工作规范

和工作制度,使“四有”工作在我馆的业务工作中更加受到重视。

“四有”是针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言:即有保护范围、有保护标志、有记录档案和有保管机构。怎样才能按照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新标准做好“四有”工作呢?我认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深刻认识“四有”工作的重要性

(1)建立文物档案是文物工作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要重视原始资料的收集,而且还应该把对工作中原始记录、工作方案的积累、收集、整理、归档视为文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视为文物事业发展的基础。让文物档案同文物一样得到有效管理、妥善保护,才能使文物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得到保存和体现。

(2)建立文物档案是弥补文物损失的重要依据。

我们知道,对文物的有效保护是文物保护单位的头等大事,但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如常年的风吹、日晒、雨打等都有可能造成对文物的损坏,有些损坏还可能是毁灭性的。一旦出现这种毁灭性的重大损失,文物档案将是唯一能够准确反映文物保护单位全面情况的详细记录。它们不仅会在文物的修复方面成为重要的依据,而且还会对文物的学术研究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3)建立文物档案是现代科学管理的需要。

21 世纪是信息化的时代,数据化管理已经成为现代管理的必要手段。我馆在有关专家的帮助下,已经编制出一套文物档案

数据化管理的计算机软件程序并运用到文物资料及图书资料的管理中,今后我们将逐步把“四有”档案由标准化纸质档案管理转化为数据化管理。

但是由于文物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其中有一些档案,如拓片等原件,很难采用数据化形式来保存,因此,即使未来的文物档案实现了数据化管理,标准化的纸质档案也依然是必备的文本。

(4)建立文物档案是依法开展文物工作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记录档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备案。”从而使我馆的“四有”工作的开展有了法律依据和保障。

2. 要根据相关标准来进行记录档案的制作

建立和制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必须按照国家文物局 2003 年公布的新标准进行。为了减少对新标准的误解,我们组织大家进行了学习。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工作规范》规定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分为 3 大卷:即主卷、副卷、备考卷。主卷是“以保护管理工作记录和科学资料为主”的案卷,包括文字卷、图纸卷等 10 个分类卷;副卷是“收录有关行政管理文件及日常工作情况”的案卷,包括行政管理文件卷等 4 个分类卷;备考卷是“收录与真觉寺金刚宝座塔有关、可供参考的论著及资料”的案卷,包括参考资料卷、论文卷等 4 个分类卷。在这 18 个案卷中,按照其属性可分为 3 类:记录性案卷、收录性案卷和综合性案卷。属于记录性质的案卷只有一个,就是“主卷·文字卷”。所谓“记录”,就是档案记录员在充分掌握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基本情况的前提下,通过文字记录的方式,完成案卷的制作。所谓收录,就是档案记录员要将已有的原始

记录资料,如图纸、照片、拓片、调查和发掘记录等收集、归类完成案卷的制作。在开展“四有”工作之前,要分清“记录”案卷和“收录”案卷,其目的在于档案制作过程中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案卷,要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著录。前者需要用文字来直接表述,后者则必须完成资料的收集才能形成案卷。

3. 按“分散制作、集中归档”的原则建档

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及其相关文物记录档案,涉及的范围广、内容多,几乎涵盖了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及其相关文物的所有情况和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及其相关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构保护、管理、维护、展览、研究等全部业务工作。要完成这样一套具有科学、系统、全面、翔实的完整档案,单靠几个人是难以胜任的。所以我馆成立了由各个业务部室和行政部室组成的“四有”小组,将档案中要记录的内容分配给对其中某个课题研究最深、某项工作最熟悉的人协助来做,最后将记录交给档案人员,由他们把全部资料集中起来,整理、制作、编目、归档。

4. 记录档案的制作要实行责任制

“四有”档案的制作,是一项科学性很强的研究工作,它不仅仅是一种手工劳动和电脑操作的过程,实际上它是深入挖掘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及其相关文物文化内涵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把原始记录、原始资料归档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了解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及其相关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研价值的过程,所以这就要求档案记录人员和档案保管人员具有一定的文物知识和业务水平,要有责任心,分工协作,责任到人。鉴于此,我们按照国家文物局发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工作规范》制定了我馆的“四有”工作规范,确定了工作机构及岗位职责,制定了“四有”工作制度,力争按照规范的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四有”工作。

(作者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助理馆员)

《中学历史》实践课

· 呼 唤 ·

讲解员角色更新

苏 艳

根据初中历史新课程中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利用并整合本馆丰富的历史及科普教学资源,结合初中历史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合作,积极进行《中学历史》社会实践课程开发的研究和实践。在双方的共同努力和精心筹备下,于2004年4月和10月成功地举办了二期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中学历史》社会实践课活动。来自丰台地区20所中学的近5000名初一学生,先后分53批参与了历史实践教学课。作为博物馆社教部一名讲解员,我有幸参加了此项实践课接待的全过程,现结合工作中的实践和认识,谈谈自己的感想和体会。

《中学历史》社会实践活动打破了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传统灌输为基本特征的教学模式,将中学历史教学课堂搬入博物馆,安排学生来博物馆直接体验历史活动课程,对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协调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中学历史》社会实践课的实施,有力地使博物馆的讲解人员推到新课程教学开发的第一线。在历史实践教学课中,讲解人员与学生的角色都表现出新特点:讲解人员的讲解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讲解内容的呈现方式以及活动中师生

互动的形式等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接待中我们深刻地感悟到,新课程教学形式的推出对博物馆讲解员的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作为学校的“第二教学实践课堂”,我们力争把握机遇,为适应新教学形式的要求适时地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在《中学历史》实践课中不断提高教学的科研能力、教学方式的创新能力,在实践中逐步提升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

一、更新教学观念,与教改同行

推进教学改革,对博物馆开展历史实践课活动非常重要。首先,我们应明确教育教学改革的精神和宗旨:一是打破传统教育教学束缚学生手脚的做法;二是遵循现代教育“以人为本”的观念给学生的发展创造最大的空间;三是根据教材所提供的基本知识结合实践教学把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教学的重点。因此,我们在实施《中学历史》实践活动前,馆领导及时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教学改革的指导精神,要求讲解人员在接待中应紧紧围绕教学改革的宗旨去组织实践教学,尽快更新那些不适应新课程开发的旧思想和旧观念。比如已往我们在接待学生团队时,参观及活动现场常常

表现出以讲解员为“中心”；讲解内容以固定的解说词为教学版本，参观及活动现场过分强调讲解人员的“权威性”，讲解员充当了整体参观活动的控制者，现场的学生只是消极被动地接受历史知识和历史结论，不敢发表见解，提出质疑。如有现场测试问答，也是统一举手来回答，答案又多以既定的内容作为最终和唯一的结论。实际上，这种传统的讲解教学观念及做法压抑了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必须首先从讲解人员观念深处得到根本性矫正。为此，我们在安排历史实践课教学前强调讲解人员尽可能“少讲精讲”，最大限度地缩减讲解的授课时间。我馆推出的《中学历史》实践课内容共分四个参观及活动环节，时间总计90分钟，除参观西汉墓室复原陈列及出土文物展览，其余3项我们均安排了深受同学们喜爱的模拟考古、书写竹简及历史短剧表演活动项目，最大限度地减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负担，为学生们争取了充分的参与和体验活动的时间和空间。

在《中学历史》实践课教学中，我们每一位讲解人员都在始终遵循“一切为了学生，一切服务于学生”的教学理念，积极鼓励学生以独立的角色从不同的角度向讲解人员提问、假设和陈述，同学们在活动现场回答测试题时，应敢持歧见，标新立异。测试问题没有设定统一答案，我们期待同学们能够将多样、有趣、富有探索性的结论展示给大家，从而最大限度地激活学生们的探索和创新的能力，唤起同学们研究性学习的浓厚兴趣。

我们感到这种教学理念的实际应用，极大地培养了学生思维的多向性和人格的独立性，对于发展讲解人员与学生间的师生情谊和创造积极健康的学习氛围将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突破传统模式，提高教学能力

新的教学形式的开展，不仅要求博物馆的讲解人员在教学观念、教学行为、教学角

色上与教学改革同行，而且在教学能力上也应与时俱进。不但要继承发展传统的讲解基本技能，而且还应具备对《中学历史》实践课这种新的教学形式所采用的教材的分解、提炼、整合能力和教学的研究能力。

做好新教材的分解、整合是顺利实施《中学历史》实践课教学的前提保障。其根本在于突破传统的讲解教材模式，从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入手，独具匠心地分解、提炼《中学历史》现行教材中与历史实践课活动密切相关的教学素材。当然，在设计、整合中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将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有机地渗透到整个历史实践课的教材中，最终获得实践课教学的新颖性和趣味性。在这种由传统讲解向创新教学的转变中，首先要求我们的讲解人员应准确地掌握与实践课活动内容密切相关的课本教材内容。例如，我们在指导学生们参加《书写竹简》这项活动课前，作为指导老师，讲解员需要考虑到有关“竹木简”及“中国书写材料”的发展历程在《中学历史》初一课本中曾有过简单的介绍，那么，同学们对于这部分知识掌握的又如何呢？于是，我们计划在授课中穿插几道相关内容的测试题：A. 远古时期的人们在动物的龟甲及兽骨上刻划的文字叫_____文。B. 在青铜器上铸刻的文字叫_____文。C. 竹木简这种书写材料是何时出现的？D. 纸张的出现是在西汉还是东汉时期等等，推出这些问题的目的是引发并唤起同学们对已往所学知识的思考及再记忆。因此，讲解人员对于这一环节的知识应该了如指掌，不仅要求我们在授课中所运用的教材要贯穿古今，而且还应联系中外。应该说，这堂教学课所涉及的内容已超出了我馆讲解员现有的知识储备。因而，当务之急，一方面我们要学习《中学历史》课本教材中相关的知识；另一方面我们还利用多媒体，最大限度地扩充“中国书写材料”发展素材的容量，精研细读，抓住重点和实质，最后再根据本节活动课的时间，组合成一套适用于《中学历史》中“书写竹简”教学课程的最佳教案。最终使我们的讲解及授课内容“源于

教材,又敢于超越教材”。

在上述的教学工作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设计教学方案;还时考虑在授课时采用哪种教学方法更为学生们乐于接受,实际上这些都已经涉及到在博物馆教学的研究工作。已往我们总认为教学及研究工作离讲解员很远,事实上,它每时每刻就伴随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关键是我们并没有去认真地思考和总结。

众所周知,讲解人员教学研究能力的培养更多地是来自教学实践。在《中学历史》实践课上,我们随时都可能遇到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如参观活动现场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活动结束的时间到了,而学生们参与的热情仍然很高涨怎么办?以及如何把传统的讲解与新的教学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等等。如果讲解人员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考不够严谨审慎,不善于做进一步的研究、总结和归纳,虽然有部分讲解人员已具备了较丰富的讲解经验及活动现场的组织应变能力,但却很少把它作为一项专门的问题加以分析、总结,而使自己宝贵的讲解及教学经验不能得到认可和推广,长此以往,我们讲解员就会感到每天重复的工作枯燥无味,自身的素质也不易得到提高。

的确如此,在新的教学形式的实践中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的讲解员难于解释和应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总是被动地等待别人把研究成果双手送上,我们应该逐步以研究型讲解员的心态置身于《中学历史》实践课教学之中,以研究者的眼光审视和分析《中学历史》实践课教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反思,对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探究,对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不断进行总结,从而概括出系统性和规律性的理论和方法。在教学研究中通过刻苦钻研,勤学苦练,不断地完善自我,提升自我。

三、积极参与实践,更新教学模式

“善教者,学逸而功倍,不善教者,学劳

而功半”。因此,在实施《中学历史》实践课教学前,我们根据四项活动课的内容及特点,设计了不同的教学方式,运用在教学中,力争成为名副其实的“善教者”。

问题引导式教学法:利用教师所给出的问题,引导学生发现,培养他们历史思维能力的一种教学模式。在《中学历史》社会实践课的《书写竹简》和《墓室复原陈列》两项活动课教学中我采用了问题引导式教学法。

2004年3月初,我们接待了第一期参加《中学历史》实践课活动的丰台二中和三中的初一学生。在《墓室复原陈列》现场讲解中,授课的内容是根据《中学历史》初一课本中规定的秦汉部分的知识点结合汉代墓葬的特点编写的解说词,时间为20分钟。另外,我们根据同学们所参与的4项活动的内容,请业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专门编写了10道测试题,待活动结束后,由学生们统一填写答案。接待了几批学生后,我发现同学们在参观现场的听课效果不是很好,精力不够集中,我意识到现场的授课内容中缺少了重要的能够激发学生们的内在的探究和思考动力的因素。带着这些疑惑,我及时请教了丰台二中历史教师毛劲辉,她向我建议:学生能力的培养关键是思维能力的培植。引导学生们在参观活动中发现问题的所在,鼓励他(她)们大胆质疑,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大有益处。那么引导学生发现问题的关键是要精心地设计问题,你们在现场授课中,应适时地提出一些问题,让同学们带着问题去学习、去寻找、去探究,再借助参观现场可供学生们思维活动的陈列情景,便可唤起他们探索意识和想象力的发挥,达到事半功倍的授课效果。在接下来的实践课上,我便将测试问卷一项内容取消,把其中的十道问答题揉在《墓室复原陈列》和《书写竹简》两项教学活动课中,形成了问题引导式教学法。问题与问题之间随着授课内容的推进而由浅入深,层层推进。在参观现场随着问题的提出,我们发现同学们的视觉、听觉和思维被时刻牵引着在快速运动着,积极踊跃地思考并回答问题,的确达到了预期的授课效果。

教学实践证明,在教学中通过运用浅问简答,穿插引渡的方法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可以积极有效地推动学生们思维的发展。

探究式教学法:是以探究为基本特征的一种教学活动形式,具体是指教学过程是在教师的启发诱导下,以学生独立学习和合作讨论为前提,让学生通过小组的形式,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教学形式。经过仔细地考虑和衡量,我们认为将探究式教学法运用于“模拟考古”活动课教学中较为适用。

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在《中学历史》实践课中开设的“模拟考古”活动课的宗旨,是让每个学生在参与活动中能够初步了解田野考古的发掘方法,在探索历史遗迹、遗物中认知历史并亲身感受考古工作者的艰辛和乐趣。每次活动前,我们都会利用七八分钟向学生们介绍田野考古的发掘方法及活动中应注意的相关问题,然后,在讲解员老师的指导下,每四位同学一组,分组进入探方开始发掘工作。这时你会发现,每个探方的“小考古队员”都在认真体验着实地考古发掘的过程,待“文物”出土后,同学们首先进行清土刷净,然后他(她)们会根据现场展板上的提示内容寻找“文物”的名称和时代,探究器物的用途,活动将要结束时,各探方小组成员再将学习结论汇报给现场的指导老师,大家在一起交流探究的内容,总结探究的结果。

确切地讲,上述模拟考古发掘活动及揭示“文物”神秘面纱的整体过程,完全是交给同学们自己进行的。讲解员作为探究式教学的指导老师,其任务就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进同学们自己去获取知识和发展能力,培养他们在发掘工作中自己能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探究式教学法,力图通过学生自我探究,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和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为终身学习和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与式教学法:在《中学历史》实践课中《东方朔晋见汉武帝》这一活动环节,我们采

用了参与式教学法,目的是让所有在场的学生都参与到整个剧情中,在接待中,丰台赵登禹学校初一同学们的表演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台上的学生身着汉代服装表演的人情入理,台下同学们都模仿汉代人的坐姿,跪坐在漆榻上全神贯注地观看着,随着剧情的推进,表演现场不时传来阵阵的掌声和笑声。同学们在参与活动中感觉到汉武帝开创统一大业的艰辛,同时,也看到我们今天信息时代社会的进步与优越。在现场观看表演的带队老师们无不感慨地表示:“同学们在亲身的参与体验中燃烧起学习的渴望,激发了他们探究历史、感悟历史的浓厚兴趣;同时也使他们在心目中确立了强大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通过亲身实践,使同学们进一步领悟到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具有光辉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这一切不就是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们最大的梦想吗!”

以上三种教学方法,是我们针对《中学历史》初一年级的学生们在参与实践课活动中采用的授课方式。随着我馆社会实践课活动在其它相邻区、县的进一步推广,我们也会根据学生的年级不同,实践课内容不同以及各课程活动时间的长短,在教学模式和方法上及时进行调整和更新,以便更加有效地保证社会实践课活动在博物馆顺利推广和实施。

总之,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开展的《中学历史》社会实践课活动,不仅实现了轻松学习宜于渗透的教育思想,激活了教育的新模式,为创新历史教学课堂开拓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同时,也使博物馆的讲解人员的综合素质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当然,《中学历史》实践活动在博物馆的开展毕竟是历史教学改革中的新生事物,在接待教学中还有诸多方面有待于讲解人员进一步去改进和完善。

(作者为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社教部主任)

昌平白浮所出

西周甲骨刻辞考释

连劭名

北京昌平白浮出土的西周甲骨刻辞仅一条但保存完整,是研究古代占卜及思想意识的重要资料,其文云:

其尚上下,韦馭。

“尚”,占卜术语。《周易·泰》九二云:“苞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象》云:“苞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国语·晋语》云:“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

“尚”,读为当,有如下意义:

1. 中

《吕氏春秋·知度》云:“而欲发之当也。”高诱注云:“当,中。”《管子·白心》云:“建当立有,以靖为宗。”所谓“有”即“大有”,亦即《老子·道经》第一章所说的“常有”。《周易·大有·象》云:“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象》云:“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2. 正

《吕氏春秋·义赏》云:“岂非用赏罚当邪。”高诱注:“当,正也。”《管子·法法》云:“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春秋繁露·竹林》云:“正也者,正於天之为人性命也。”

3. 主

《礼记·学记》云：“鼓无当于五声。”郑玄注：“当，犹主也。”《周易·坤》云：“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象》云：“先迷失道，后顺得常。”《礼记·礼器》云：“是故先王之制礼也，必有主也。”郑玄注：“主谓本与古也。”

“上下”的意义，参见《墨子·辞过》：

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牝牡。

“上下”如天地，是万物之宗，《周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又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礼记·中庸》云：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其生物不测。

《鹖冠子·度万》云：

所谓天者，非是苍苍之气之谓天也。所谓地者，非是膊膊之土之谓地也。所谓天者，言其然物而无胜者也，所谓地者，言其均物在则不可乱者也。

古人在占卜时要祈祷于“上下”，《史记·龟策列传》云：

祝曰：假之玉灵夫子。夫子玉灵，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于天，下行于渊，诸灵数策，莫如汝信。

“上下”亦处于运动之中，《吕氏春秋·大乐》云：

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

凡事若能合于“上下”，符合自然运行的规律，称为“有常”，如《礼记·曲礼》云：

凡卜筮，旬之外曰远某日，旬之内曰近某日，丧事先远日，吉事先近日。曰：为日，假尔泰龟有常，假尔泰筮有常。

殷墟卜辞中亦屡言“上下”。廩辛时代的何组卜辞中有：

癸亥卜，彭，贞其酒彤，王，上下亡左。

“左”，读为“差”。《广雅·释詁》二云：

“差，邪也。”《楚辞·哀时命》云：“称轻重而不差。”王逸注：“差，失也。”所以，“上下亡左”与“其尚上下”同义。

武丁时代的宾组卜辞中有：

丙寅卜，亘，贞王奚多屯，若于上下。《合》808

贞王奚[多]屯，不若，左于上下。

贞王奚多屯，不若，左于上下。《合》809
“左”与“若”相对，《周易·观》云：“盥而不荐，有孚颙若。”荀爽注：“若，顺也。”《周易·巽》九二云：“用史巫纷若。”荀爽注：“若，顺也。”

商代征伐的卜辞中大量出现“上下”，例如：

己卯卜，壳，贞工方出，王自征，上下若，受我[又]。《合》6089

辛未卜，壳，贞王勿逆伐工方，上下弗若，不我其受又。六月。《合》6204

《孟子·尽心》下云：“征之为言正也。”《礼记·月令》云：“以征不义。”郑玄注：“征之为言正也，伐也。”《说文》云：“征，正行也。”《白虎通·诛伐》云：“征，犹正也，欲言其正也。”顺于上下即是正。

“上下”与“帝”同义。武丁时代的宾组卜辞中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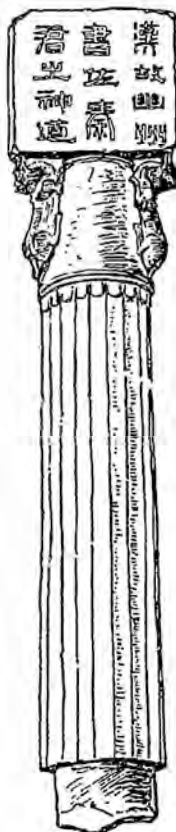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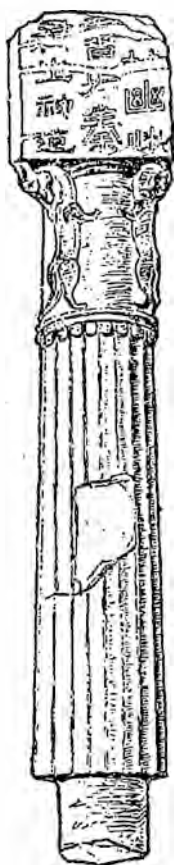
贞不唯上下肇王疾。(正)

贞唯帝肇王疾。(反)《合》14222

此版正反两面的卜辞卜问同一事项，可证“上下”即“帝”，《白虎通·号》云：“德合天地者称帝。”《逸周书·谥法》云：“德象天地曰帝。”西周初期的《邢侯簋》铭文中“上下帝”，应是帝的别称。

“韦馭”，馭同御。“韦”是卜人之名，“馭”者治事之义。《诗经·思齐》云：“以御于家邦”郑玄笺：“御，治也。”《诗经·崧高》云：“王命傅御。”毛传：“御，治事之官。”

(作者为北京教育学院教授、博士)



关于

秦君神道石柱及

秦君石墓阙残件

考释浅析

滕艳玲

1、2号

秦君神道石柱

秦君神道石柱及秦君石墓阙残件,是北京地区东汉时期墓上建筑的唯一遗存,秦君神道石柱是我国东汉墓表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套。此批文物发现于1964年6月,出土地为石景山区老山,共计17件,据发掘报告认为,其中4件为神道石柱构件,13件为石阙构件。在文献记载中,东汉时期有许多陵墓竖有石柱。如《水经注》卷二十四“太尉桥玄墓,……庙南列二柱”;卷二十九“文将军冢,墓隧前有石虎、石柱甚修丽”等。但是现在此类石刻文物发现极少,仅有秦君神道石柱还能够基本反映原貌,是研究东汉时期墓表建筑的唯一实证。

我国现存东汉时期陵墓建筑石构遗存

中,神道石柱存二套四件,其一为:秦君神道石柱;其二为:“山东琅邪刘君石柱”,后者现存山东省博物馆。两相比较而言,秦君神道石柱柱顶佚失,柱身及柱础相当完整,能真实反映东汉墓前神道石柱的神韵。而山东刘君石柱,残毁严重已不辨原貌。秦君神道石柱现存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通高225厘米,柱身雕通长直线竖纹,柱上部雕两只螭虎盘于柱侧承托柱额,额上刻隶书“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三行十一字。螭虎刻划极富动感,其虽为半浮雕技法表现,亦能看出典型的东汉风格。

在汉代石阙建筑中建造年代最早的是1965年出土于山东莒南,建于东汉章帝元

和二年(公元85年)正月初六日的孙仲阳残阙,现存山东石刻博物馆。我馆所藏的秦君石墓阙残件,建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七年(亦即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属建造年代较早的一座。出土的13件石阙残件,有一石柱正面镌刻“永元十七年四月板令改元元兴元年其十月鲁工石巨宜造”;左侧面刻《乌还哺母》题记,为墓阙及神道石柱确定建造年代和建造缘由提供了重要实物佐证。另一件石方柱高207厘米,方形,正面刻门吏持矛侧立,头上方雕朱雀;右侧面雕刻游龙一。雕刻手法采用减地平钹(类似于浮雕),为典型汉代做法,风格与题材均与汉画像石相同,为汉时多用的神人瑞兽等题材。

此批文物从1964年6月出土至今,有许多专家学者对秦君石墓阙残件上残存的文字进行了考证和诠释。邵茗生先生在《文物》1964年第十一期发表了题为《汉幽州书佐秦君石阙释文》的文章;郭沫若先生和陈直先生在1965年第4期《文物》上,分别发表题为《“乌还哺母”石刻的补充考释》和《关于汉幽州书佐秦君石柱题字的补充意见》。郭沫若先生在文章中,还建议将秦君石墓阙复原展示。由于秦君石墓阙残损过甚,这项工作无法实现。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文物》1964年第11期发表的《北京西郊发现汉代石阙清理简报》(以下简称“简报”)对于石刻的出土情况和复原构想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时间已经过去了41年,现将大家的考释结论进行一下综合概括,以其对于此套文物的内容有一个全面的印象,有利于同行学者的进一步研究。

一、秦君石墓阙残件及秦君神道石柱的正名

据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简报》上的记载,当时共出土有17件石刻,对于这批石刻的发现位置、地层情况、石刻分布,文章中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同时,对石刻的种类、规格进行了科学的记录,对于神道石柱和石墓阙的结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对石刻上的

题记作了简要的释文。这篇文章是唯一详尽记录秦君神道石柱和秦君石墓阙情况的文字材料,后来的研究者多借用上面的观点。文章的开篇提出“这批石刻都是汉阙上的各个部分的构件”,就给许多研究者造成了误解,将这批石刻的名称搞错了。其实在文章的结语中已经明确指出了“十七块石刻可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是墓表的构件,一部分是石阙的构件”。而许多研究者未加注意,都将其统称为“汉幽州书佐秦君石阙”或“汉故幽州书佐秦君神道石阙”。尤其在文章中错将秦君神道石柱描述成“凡二阙,一阙稍残缺,一阙完整。……二阙上端都刻‘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隶书十三行”,这就更容易造成误解了。由于这批文物出土时都是单独的构件,早期研究者的撰文又都是在当年和次年,难免出现一些误解。而此后的一些研究者依然对此称谓还有错误的引用,所以在此次撰文的开篇,笔者认为,首要的工作是要对此批文物正名,以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正确的线索。

神道石柱也称做“墓表”(在刘敦桢先生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就将其定名为“北京西郊东汉秦君墓墓表”),是在陵墓中标明神道开始的建筑,它与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建筑形式,它们在墓上建筑中各自独立存在。阙,这种建筑,据文献记载在西周时期就开始出现,是设置于宫殿庙宇的门前,起标表宫门,别尊卑的作用,有城阙、宫阙、庙阙、墓阙等许多种,是秦汉时期广泛使用的一种建筑形式。它的作用有三:1. 等级的标志,是皇帝贵族炫耀权利财富的象征;2. 颁布政令、法令的地方;3. 是地域界限的标志,如宫殿、陵墓等。神道柱标明了陵墓神道的开始,而墓阙标志着陵园门的位置和墓园的等级。如皇帝可用四出阙,即陵园四面的陵门均用阙来装饰。普通官吏就不能,只能用单阙或双阙,这在《汉书·霍光传》中有关于建阙违制的记载。《汉书·霍光传》记载,其妻显为改建霍光茔墓并建三出阙,而受到皇帝降罪。确证了在西汉初年,墓阙已广泛被士大夫阶层所采用,而且也有制度上的规定。

现存于世的此类墓阙建筑多为东汉时期所建,并被称为“汉阙”。

鉴于以上诸点,将它们笼统地称为“汉阙”的话,明显是错误的。建议使用“秦君神道石柱”及“秦君石墓阙残件”这两个名称分别称呼它们。称“神道石柱”而不用“墓表”,是借鉴古代文献中的称谓,尤其是《水经注》中记录汉代一些陵墓上遗存时用“石柱”这个称谓,故沿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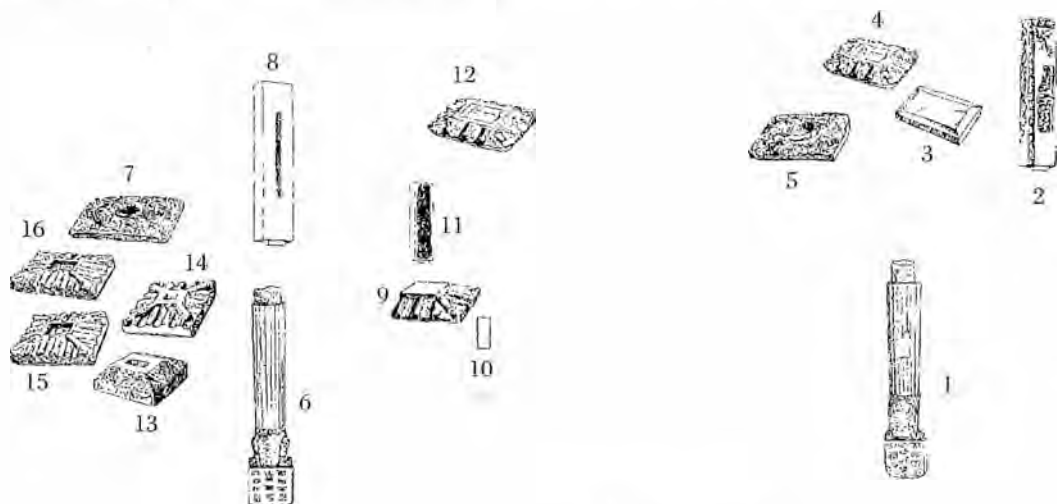
二、秦君神道石柱和秦君石墓阙的建筑形式

为了弄清此批文物的确切出土位置,笔者特意向一些知情人士作了简单的采访。据《简报》的执笔人苏天钧先生介绍,这些文物发现地是永定河的古道,当时是采石厂工人在采石过程中挖掘出土的。这些石刻所在位置是否为原始地点呢?对于这个问题有几种说法:1. 这些石刻是从永定河上游冲下来;2. 从永定河下游冲上来的;3. 从附近的老山上冲垮后坍塌在附近的;4. 就地冲垮的。通过对石刻的观察发现,石刻上的雕刻磨蚀很轻微,不像经过河水冲击漂流后棱角全无的样子。虽然1号石柱有大量的磨损,但是据知情者回忆,那是采石的铲车

无意破坏的。由此可以推翻1、2两种说法了。后两种说法,都有它的合理性,据苏先生回忆,此批文物的发现地——永定河的古道,当时是老山的一个缓坡上,极有可能是在墓址附近。所以,《简报》中对石刻分布的描述对于研究文物的原状是有借鉴意义的。

根据石刻出土的地点和位置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简报》认为,这17件文物中有4件属于秦君神道石柱,其它为秦君石墓阙的残余构件。4件石刻分别是1号、6号神道石柱、5号石柱础和3号石屋顶。

从《简报》对石刻出土时分布的描述来看,石刻大体分为东西两部分,每部分又按照南北方向分布。东侧出土的秦君1号神道柱柱头南向,倒扑于地,其北出土方形石柱一件(2号)、石阙顶两件(3号、4号)、石柱础一件(5号);西侧相距秦君1号神道柱11米出土了秦君6号神道柱,它的西北出土了7号石柱础和8号方石柱;东侧3米处出土9号阙顶和10号石雕双人;9号阙顶以北1米出土11号方石柱和12号石阙顶;9号阙顶以西4米处出土13号方形复斗式石柱础、14号石阙顶和15、16号石阙顶。按照《简报》所描述石刻出土位置绘制了一幅出土方位示意图,见下图。



秦君神道石柱、石墓阙出土方位示意图

从附图可见,神道石柱的南侧没有石刻出土,石刻全集中于北侧,神道柱倒扑于地,柱头南向,可见是面南背北而立。它应该位于石阙的南面,是神道的先导,其后是墓阙。阙,在宫殿建筑中是“标表宫门”的,在陵墓建筑中应与此相同,表示陵园的门户。这与文献记载是相符的,证明在东汉时期陵墓神道上的设置,是由南向北依次排列,以北为上。

在出土的石阙残构件中有石阙顶 8 件,《简报》中分析,其中 3 号石阙顶可能是神道柱上的石屋顶。因为神道石柱顶部有榫,上部还应该有什么构件存在,他们认为应该是屋顶式的建筑。而究竟应该是什么呢?

东汉时期墓上完整的石柱建筑,现有的考古发现中没有披露,而且在文献中也记载阙如,这就为研究者的进一步推断带来了困难。现存完整的墓上石柱建筑最早的是南朝时期的遗物,但是用后代文物来判断早期文物的形制,在文物考古界虽不能以为科学,但是为了推断出大致的模样也只能借鉴离东汉时期最近的遗物。现存完整,可以参考的材料有南朝萧景墓墓表、北齐义慈惠石柱,在研究南北朝时期的陵墓墓表(神道石柱)建筑形制时,均以它们作为典型例证。萧景墓墓表柱顶雕为覆莲图案的圆盘上置圆雕的辟邪;义慈惠石柱的柱顶是一座面阔三间的小石殿。前者,确实是陵墓神道上的墓表,与秦君神道石柱意义相同;而后者是为了义葬北魏时期“杜葛之乱”阵亡的将士所建纪念建筑。萧景墓墓表与秦君神道石柱建造意义相同,南北朝时期尤其南朝对于汉代陵墓建筑规制是继承和发展的,所以有说法认为秦君神道石柱上的柱头装饰,应该是圆雕的瑞禽或瑞兽。而且,在《搜神记》中有瑞禽落于石柱顶的记载。后代的华表,无论在宫殿还是在陵墓前,柱头上的装饰物已经固定为望天吼(龙的一种变体)。从这个事实来推断,石柱顶端是瑞禽或瑞兽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所以,《简报》中对于 3 号石阙顶的推测有可能是错误的,它不一定是秦君神道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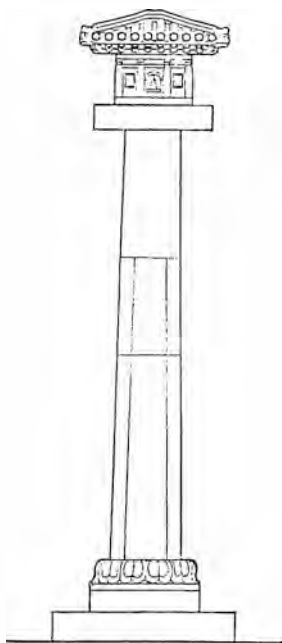
柱的构件。

在 17 件出土的石刻中有 8 件石阙顶,除去 9 号石阙顶从造型上很容易就分辨出是子阙的阙顶外,其它 7 件均为主阙的阙顶,《简报》分析秦君石墓阙是重檐双阙。在两汉的阙中是否有重檐的阙呢?查阅刘敦桢先生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他总结阙的形式有两种,“一种为独立的双阙,其间无门”;“另一种是门、阙合一的阙”,“阙身覆以单檐或重檐屋顶”,在四川的汉代画像石上也有重檐双阙的描绘。经过向古建专家王世仁先生请教,他指出,这是汉代特有的一种叠压式重檐形式,现在统称为“重檐”。可见,秦君石墓阙是一座重檐双阙的推论是成立的。同时,从出土物综合分析,它应该是独立的重檐双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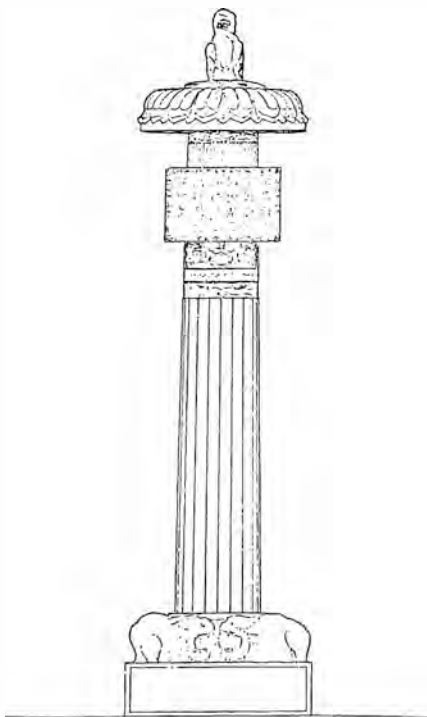
三、秦君石墓阙及秦君神道石柱铭文考释

秦君神道石柱和秦君石墓阙残构件中有 4 件石刻镌有文字,1 号、6 号秦君神道石柱和墓阙残构件的 8 号和 11 号方石柱,在当时对于这些文字的考证,引起多位两汉学者的关注。秦君神道石柱两件规格相同,通高 225 厘米,四方形柱额长 48 厘米,宽 43 厘米,上为汉隶竖刻三行,第一行和第三行每行 4 字第二行 3 字,内容相同为“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石柱上文字清晰,汉隶字体古朴浑厚。从书法艺术角度分析,秦君神道石柱上的题字具有很高的价值,它代表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在书法艺术发展中,具有阶段性的象征意义。

从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来看,隶书是“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的一种字体,把篆书圆转的笔画变成方折,在结构上,改象形为笔划化,以便书写。”汉隶是在汉代使用的隶书,是与唐代隶书“唐隶”风格迥然不同的。在碑刻中大量使用汉隶是在东汉的末期,公元 150 年以后。秦君神道石柱和石墓阙建于公元 105 年,正是处于篆向隶转变过程中,没有完全进入汉隶的成熟阶段。与篆书



义慈惠石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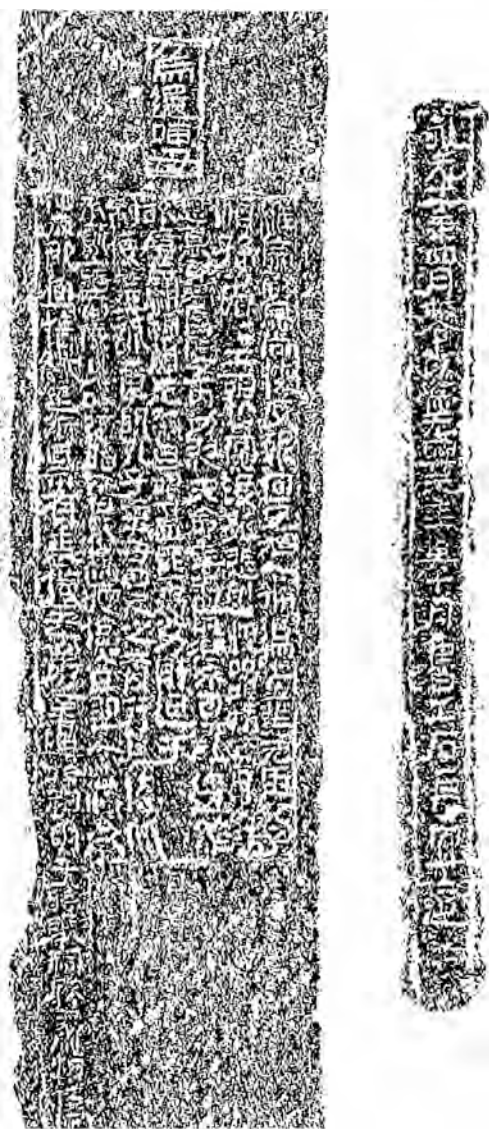


萧景墓墓表

比较,洒脱随意,具备了隶书的一切特点;与成熟的汉隶比较发现,没有那么规范的装饰性,尤其是没有汉隶碑刻中那种蚕头雁尾的特点。整体来看,十一个字大小不一,没有太多的拘束,古拙劲挺。单个字来讲,并不出色,它们组合在一起后,彼此呼应,体现了作者独特的个性。它的优秀还在于,让观者感觉其独具匠心的同时,又能体会随意而为的神采,在没有章法中求得了极佳的章法之美。

8号方石柱正面竖刻文字一行,为“永元十七年四月,板令改为元兴元年。其十月,鲁工石巨宜造”;侧面用线刻碑形,碑额处镌有“乌还哺母”四字为题,碑内文共7行,字不对齐,大小不一,每行字数各不相同,第7行字数最多、最长。对于这两处文字的考证有郭沫若、陈直、邵茗生三位专家的考释意见。对于石柱正面的建造年款,有两种说法:

其一为陈直先生所提出的“四月”下两字应该是“板令”。其依据是“板令即诏书之板令,亦即诏令之解释”。并引《居延汉简释文》35页简文“版诏令男子狗大勿论,毋辄上廷尉以为常。”提出这是汉代公牍中的制度。其二是郭沫若先生和邵茗生先生提出的应为“卯令”。郭沫若先生认为“卯令”,是卯日的命令之意,并提出此石刻还更正了史书上的错误。《后汉书·和帝纪》载:“夏四月庚午,大赦天下,改元元兴”,因当年的四月根本没有“庚午”这一天,“庚午”不是“甲午”就是“庚子”之误。参照石刻上的卯日,可知应该是“甲午”,因为“甲午乃当时首都洛阳颁布改元令的日期,而‘卯令’则是地方上接到改元令而发布的日期。由午至卯相隔十日,这是洛阳驿传到今天的北京的时日”。上述两种说法都有他们的合理性,在仔细研究拓片的基础之上,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专家刘之光先生和韩锐先生共同研讨后,我们认为从拓片的笔迹分析还是“板令”为是。我们现在在研究中所采用的就是陈直先生的考释意见。在本文中特将拓片刊出,以期得到学者、专家的共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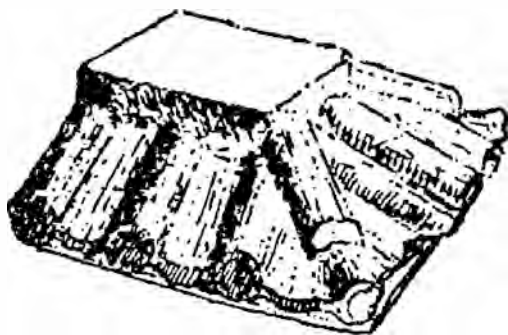
8号方柱侧面、正面铭文拓片

8号石方柱侧面是秦君石墓阙的主题“乌还哺母”，对于此段文字的考释有邵茗生先生和郭沫若先生的考释文字，相比较而言，郭沫若所考释的更加确切。全文如下：“维乌维乌，尚怀反报，何况于人，号治四灵，君臣父子，顺孙弟弟。二亲薨没，孤悲惻怛，鸣号正月，且夕思慕，互心，长网五内。力求天命，年寿非永，百身莫赎。欲厚现相，尚无余日。呜呼，匪爰力财，迫于制度，盖欲章明

孔子葬母四尺之裔行上德。比承前圣岁少，以降昭皆，永为德俭。人且记入于礼。秦仙爰敢宣情，征之斯石，示有表仪。孝弟之志，通于神明。子孙奉祠，欣肃慎焉。”

根据郭沫若先生的释文，用白话解释全文意译如下：“乌鸦是一种动物，还知道反哺父母报答恩情，何况是万物之灵的人类，有君臣父子人伦孝悌的道德观。今父母双亲亡故，遗孤整月处在号啕痛哭的悲苦之中，从早到晚思念双亲，痛苦万分，五内俱焚。已经着力祈求上天护佑，却不能使父母长寿，现在没有任何办法使人复活。想借助厚葬慰祭亡者，却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准备。呜呼，不是吝惜钱财，而是制度的要求不能逾越。因为孔子葬母时，树立了四尺高的封土作为以后祭祀标志的作法，已经成为前代圣贤树立的楷模，永远作为学习的借鉴，并且记入了礼法作为制度。秦仙怎么敢受感情的操纵而违背礼法，只好借此石阙，略表自己的哀思。这一片孝悌之心，父母在天之神灵有知，会理解和接受此礼遇的。后代子孙世世代代，永远供奉祭祀，谨慎不忘。”整篇文章充满了秦仙对父母亡故的懊悔，表达了一片孝悌之心，同时也提到并不吝惜钱财，而是制度约束，非常的无奈。在东汉时期，墓葬制度是否那么严谨呢？建造这些建筑需要多少钱呢？

我国的墓葬制度是在西汉时期确立的，到了东汉进入了繁荣阶段，当时的人们不惜



9号阙顶

倾家荡产为父母营建坟墓,以此表示对长辈的孝敬。从文献上还没有发现具体的制度规定,什么级别的官吏可以树立神道石柱。但是,秦君书佐的神道石柱是文献记载和实际发现中官职地位最低的一个。陈直先生在文章中指出,秦君身为书佐,不过是一个主管文书的小官,身份地位低微,在坟墓前树立墓表,并且堂而皇之的命名为神道,是一种创见。墓上建筑中建双石阙确实有逾制的问题,所以他在建造坟墓时,坟丘就不能太高了。同时,陈直先生分析,他的俸禄每月只有三百六十钱,而建造一座石阙费用就要达到十五万钱左右,加上神道石柱和墓上的其它费用,那就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数字,是秦书佐一生也赚不到的。这样来看,确实如祭文中所说的那样,秦仙非常不吝惜钱财,就想用建石阙的方法向父母表达自己的孝心。对于建造神道石柱和石阙的花费及逾制的问题,有人认为秦书佐的后代秦仙可能是高官或显贵,父以子贵,并不逾制;或者秦仙是富商,虽然逾制,但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再就是秦书佐本人是一个赃官。秦仙在文献中没有记载,就排除了做过高官的可能。秦书佐贪污受贿,而他不过是一个文书,即使受贿也应该是非常有限的。我认为秦仙可能是一个富商,无论怎样,题记的内容和建筑本身,主要还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风俗;即不惜一切代价殓葬长辈,以此来表现子孙的孝敬程度,这也是当时社会潮流的一个具体体现,为研究汉代厚葬习俗提供了事物例证。

11号石方柱残长仅有92厘米,正面线刻碑形内文字细密,而且剥蚀过甚,无法辨认;侧面文字一行四字“乌还哺母”,仅“乌”字能够辨认,余下三字从字形分析是“还哺母”。邵茗生先生所考释文依据是8号石方柱上的“乌还哺母”题记,而且同一石阙上的

题记应该是一致的,这种论断是正确的。现在从《文物》上登载的拓片照片上也能依稀辨认出一些,在适当的时候对照原石再进行详细的研究。

对于秦君神道石柱和秦君石墓阙的建筑形制的研究和考证,还有待建筑方面的专家进行细致的研究考证。尤其石墓阙的复原,对于研究东汉时期的墓葬建筑形式,具有重要意义。在编撰此文的过程中发现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艺术史、史学史、民俗学等方面的专家研究。而本文仅仅把前人的考证综合汇集到了一起,达到方便大家查阅,若能引起专家学者的兴趣,把对秦君神道石柱和秦君石墓阙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就会为我们了解古代文化和文明提供出更加有指导意义的结论。

参考书目:

- 1.《文物》1964年第十一期,苏天钧执笔的《北京西郊发现汉代石阙清理简报》和邵茗生所著《汉幽州书佐秦君石阙释文》。
 - 2.《文物》1965年第四期,郭沫若先生《“乌还哺母”石刻的补充考释》和陈直先生《关于汉幽州书佐秦君石柱题字的补充意见》。
 - 3.《河北金石辑录》,河北人民出版社,石永生、王素芳、裴淑兰主编。
 - 4.《中国古代建筑史》,刘敦桢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5.《中国建筑史》,梁思成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 6.《四川汉代画像石》,高文编,巴蜀书社版。
 - 7.《中国雕塑史册·汉晋南北朝石雕艺术》,王鲁豫编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 8.《辞海》。
- (作者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副研究员)

磁州窑与民间文化

赵光林

磁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最大和最著名的民间瓷窑。根据解放后多次文物的普查和考古发掘所知,窑址主要分布在两个地区。一处是以河北省磁县观台窑址为中心,其中包括冶子、东艾口、申家庄、观兵台、南莲花和荣华寨一带;另一处是在邯郸市彭城镇峰峰煤矿一带,^①窑址分布极为广泛。从出土器物和地层关系看,其始烧年代应在五代末年。但因各窑建造年代不同,其始烧年代也不完全一致。总之,早期器形显得单调,釉色单一。北宋中期以后有了很大发展,直至金代前期是它的成熟期。从出土器物看,有盘、碗、各式梅瓶、各式玉壶春瓶,及各式盆、罐、钵、香炉、薰炉、瓮、盒、水注、枕、盏托、人物、佛像、菩萨像、观音像、佛龕、佛座、塔等。此外,北京大学考古系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上世纪80年代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大量建筑构件,其中包括瓦件、鸱吻、宝刹脊座等。据清代出版的《明会典》称:“明代在彭城设官窑四十余座。岁造瓷坛堆积官坛场,舟运入京,纳入光禄寺。明弘治十一年进贡于皇家之瓷坛达一万一千九百三十六个。”这说明磁州窑后期也曾为官府烧制过瓷器,据说这些瓷坛多属盛酒之物。除贡品外,都具有浓厚的民间文化特性。

从其胎质看,主要采用当地煤系中出产的高岭石质泥岩,当地人称它为“大青泥”,故胎质普遍较粗。从瓷片的断面看,多有细小颗粒,胎一般呈灰褐或灰黄色。瓷化程度与景德镇产品相比明显不同。为了提高烧成温度 and 产品质量,普遍采用装入匣钵用煤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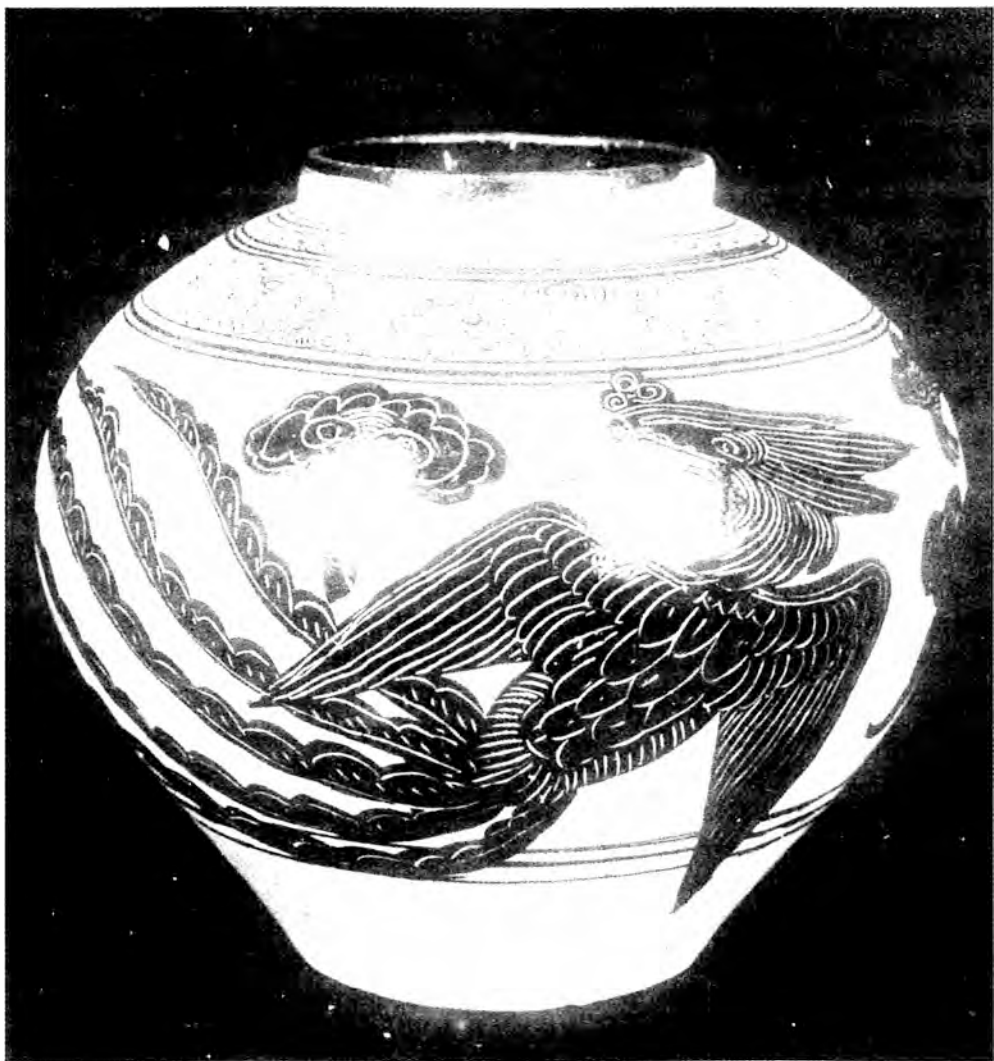
制。因胎质粗、釉面多不够光润,有的呈现有细小棕眼,这也是北方民间窑的普遍特点。为弥补这一缺陷,便于在器物表面彩绘和刻划各种图纹,多在器胎外壁施一层细白的高粘度化妆土,之后再外罩一层透明釉,从而为各种器物增添了美的效果。

从釉色和装饰工艺上讲,有青釉、白釉、黑釉、红釉、黄釉、绿釉、酱釉、白地黑彩、白地绿彩、绿釉黑花、白釉刻花、铁锈花、琉璃釉、宋三彩、珍珠地、凸线纹、兔毫纹、乳浊釉、油滴釉、鹧鸪斑等。其中窑变黑釉,所用原料是采用当地的黄土,因含铁量高,烧成后成黑褐色。又因施釉厚薄、窑温高低、火焰气氛的不同,往往在烧成后出现黑赭、黑褐、黑蓝、黑绿等不同釉色。^②还有绞胎、镂空、模印等。此外,还分釉上彩、釉下彩、高温釉、低温釉和仿定窑、仿钧窑、仿建窑等。清末和民国初年在彭城、富田两地还烧制青花瓷器。从已发现的器物中有各种盘、碗、瓶、罐、枕、盒、笔筒、帽筒、痰盂、绣墩以及书写“民国二十一年”、“民国二十三年”纪念瓶和“民国四年”纪年枕等。^③青花颜色一般偏淡,与清代前期青花瓷明显不同,均属民用瓷。

制瓷工艺种类极为繁杂,并且很多器物上书有各种铭款,为国内各地民间窑所少见。因此在宋、金、元时期对周边地区影响很大。除河北本省外,外省如河南的鹤壁窑、登封曲河窑、修武窑、当阳峪窑和禹县扒村窑、山西介休窑等,特别是它的白地黑花绘画工艺,还影响到南方的四川、江西、广西、广东、福建和东北辽宁的缸瓦窑等,形成

一个庞大的磁州窑体系。从考古材料发现,在我国许多地方都有出土,特别是上个世纪70年代,在北京元大都遗址发掘中,出土有大批磁州窑瓷片标本和许多完整器物。如元白地褐彩罐、白地褐彩四系龙纹扁瓶、白地褐彩鱼纹盆等。同是在元代窖藏出土文物中也常有发现,如1969年11月在房山良乡南关窖藏出土文物中,就曾发现一白地黑彩凤纹罐(见图一)。同时在房山城里文物窖藏中也发现三件白地黑花罐及两件黑釉梅瓶。1975年3月在东城区鼓楼中学窖藏

中出土一白地黑彩凤纹大罐,高44厘米。^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前后在西城区白塔寺白塔的北侧二层台上一龕内出土一白地黑彩罐,上题有诗文:“夹岸苍苔蔽绿苔,红林黄叶画屏开,彩船遥指十洲去,一派韶音天畔来(游十洲)。”其出土地点和诗文内容均为过去所少见。资料表明,磁州窑瓷器当时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大量出口国外,解放后在我国明州(宁波)古港遗址中就出土过不少磁州窑瓷器,其中有罐、盆、碗、缸、瓶和瓮等。当时磁州窑瓷器大量出口,在非



图一 元代白地黑彩双凤罐

洲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岛就曾出土过白釉赭色菊花纹盘、碗、罐之类的器物。并与元大都遗址中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日本九州福冈修建地铁时,在发现的大量中国瓷片中不少都属磁州窑制品,^⑤这在当时我国北方民窑中是不多见的。

磁州窑不仅因为它规模大、产量高和历史悠久而出名,更重要的在于它的各种制造工艺具有民间艺术和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尤其是它各种器物上的绘画和题铭最具特色,完全摆脱了官府的各种规制,而按照民间习俗和需要自由发挥。装饰内容的选题,主要来源于自然和生活。以写实为主,重于创新,其纹饰内容多为自然界的山水、树木、花草、牡丹、荷莲、菊花、水藻、云纹、龙纹、凤纹、游鱼、老虎、奔马、奔鹿、跃兔、芦雁、鹭鸶、飞鹤等。并且还常以人物画来装饰各类瓷枕,如《童子钓鱼》、《童子竹马》、《二童比武》、《童子风筝》、《童子牧鸭》、《少女蹴鞠》、《柳荫读书》、《柳荫观鱼》、《马戏》、《拜月》、《望月》等。还有的把整个幼童雕刻成枕面,呈卧状、仰头、跷脚、两眼圆睁、手提绣球,下面再精雕一长方形座,把幼童托起,显得十分精美生动。首都博物馆收藏有两件磁州窑人物枕,一为1980年在房山区出土的宋三彩人物枕,高13厘米、长42厘米、宽20厘米,主题画是西汉萧何追韩信的故事。周边纹饰为山石、花卉、祥云、垂柳。另一件为金代赭色人物枕,高13.6厘米、长39厘米、宽17厘米,主题纹为一男士与一妇女似在讲话,旁立一少年,山后有一老者目向前方呈观望状。周边画有山石、花卉、树木和房舍等,枕底题:“王氏寿明”款。^⑥每一件瓷枕上的画面,都充满着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给人以美的享受。

磁州窑的另一特点是以各种纪年、题句、姓氏、题诗款来装饰器物,其书写方法无一定规格,非常随意。如纪年款的写法,与后来的官窑写法完全不同,官窑款识只反映朝代和皇帝年号,如“大明宣德年制”等,不加其它内容。民窑款的写法却另有一番风味,如一件白釉罐上所书:宋“阿弥陀佛天寿

二年三月李吉泰叩敬造”罐的主人显然是位佛教徒,为敬佛而烧制的。又如1988年山东省城武县出土的一件瓷碗上所书:金“泰和三年十二月买二只”,但“二只”属何物没有说明,类似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在各类题句款识中,常见有警句、吉祥语、俗语等,如“众人无语,无事早归”、“孤馆雨留人”、“国家永安”、“镇宅大吉”、“利市大吉”、“天地大吉”、“长命枕”、“牛羊千口”、“天地大吉一日无事深谢”、“贫居闹市无相识,富住深山有远亲”、“风吹前院竹,雨折后院花”、“清风细雨,黄花绿叶”、“清吉美酒,醉乡酒海”、“甜香味美最为善”、“红花满院”、“道德清净”、“有客问浮世,无言指落花”、“风花雪月”等。上述题句多写在各种瓷枕上,完全采用民间白话语言,既增加了民间文化气息,又具有吉祥之意,故深受百姓喜爱。

姓氏款,均见于各式瓷枕上。常见有:“张大家造”、“吉祥张家造”、“张大家枕”、“张白家造”、“花瓶刘家造”、“潞阳陈家造”、“漳宾逸人造”、“赵家造”、“李家造”、“王家造”、“申家造”、“王氏寿明”、“王氏天明”、“赵小奇”、“程三程小”等。以上可看出在当时可能都是为不同姓氏人家所烧制,但以张姓为最多,这说明张姓在本地属于大姓,同时也可看出当时民间用瓷枕作枕具也是一种时尚。考古资料表明,磁州窑烧制瓷枕的窑址已发现多处,并且延续时间长达三百多年。

题诗款在各种器物上也可经常看到,但以瓷枕为多见,其内容丰富多彩,各不相同,有的悲观消极,有的欢乐向上。如,一瓷枕上写道:“时难年荒事业空,兄弟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十戈后,骨肉流离道途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时余游颖川,闻金兵南窜,观路两旁骨肉遍地,可叹可叹。为路途堵塞,不便前往,仍返原郡,又闻一片喧哗,自觉心慌,思之伤心悲叹,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只有作诗,少觉心安,余困居寒城半载,同友修枕二十有余。时在绍兴三年

清和望日也。”瓷枕二，“左难，右难，莫把功名干；烟波名利不如闲，到头来无忧患，积玉堆金，无边无岸，限来时后悔晚。病患过，谁救得贪心汉”。瓷枕三，“常忆离家日，双亲拂背言，过桥须下马，有路莫行船，未晚先寻宿，鸡叫早看天，古来冤枉者，尽在路途边”。另在一张白地黑花壶上又书道：“晨鸡初报，昏鸦早噪，哪一个不在红尘里闹？路遥遥，水迢迢，利名人上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好，人不见了——调寄山坡羊。”^⑦以上题文多反映了人们的遭遇和生活艰辛的消极心态。然而故宫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瓷枕上题写的一首《小桃红》，曲却有所不同，曲曰：“幸奉佳筵笑声喧，喜贺今辰宴，馥郁响香小庭院，画楼前，祥祥冉冉分明现，南级老人持丹诏，寿赐一千年”，这应是一件为人所烧制祝寿求平安的常用枕。另一瓷枕上的题诗为：“寒暑难迁，名利萦牵，得禄时平地神仙，忙中光影，醉衰长年，也由人，也由地，也由天，千卷窗前，有时行，有时坐，有时眠”。还有的瓷枕上题写：“白玉非为宝，千金我不须，怀念千张纸，心藏万卷书”。^⑧这两件瓷枕上的题诗，反映了当时读书人自由安详的生活和潜心研究学问的心态。同时上述题诗也反映了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其生活状况和心态的差异。另外也有在瓷枕上题写“福”“寿”“德”“禄”等单字，表示吉祥的。此外，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书有“仁和馆”款名的小口四系瓶，瓶上部施白釉，下部施黑釉“仁和馆”三字斜书在瓶肩上，属常见的磁州窑器型，山东博物馆也收藏一件与此相同的四系瓶，肩部斜书“太平馆”三字，两瓶造型完全相同，应同烧于一窑，近年在河北省彭城发现的宋代窑址中，常有斜书“馆”字瓷片的发现。根据史料记载，“仁和馆”似为宋代馆驿的名字，^⑨笔者收藏的一件小口四系瓶，胎质、釉色和造型与“仁和馆”瓶完全相同，只是肩部没铭款，而以几片草叶纹代之，这种小口四系瓶，在我国北方各地博物馆及旧货市场上常能见到，但带铭款的极为罕见。这种瓶当时属于一种盛酒或盛水的容器。

以纪年、题句和题诗等装饰在器具物上的工艺手法，始于我国湖南唐代长沙窑，常见的纪年款有，如唐“元和三年”（808年），五代后唐“天成四年（929年）五月五日造也”等，题句款有如“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等。题诗款，有“万里人南去，三秋雁北飞，又知何岁月，得共汝同归”；“日日思前路，朝朝别亲人。行行山水上，处处鸟啼新”等。因此，磁州窑以各种题铭在器物上作装饰，应是在长沙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运用上更加广泛，在内容上也更加丰富了。这在我国北方，甚至全国诸多民窑中，是极为少见的。元代，我国江西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中心后，北方各地绝大部分民间窑都停烧了，唯独磁州窑仍在继续烧造，并且还有新的发展，历经宋、元、明、清各代直至新中国成立，从未停烧过，它之所以有如此强的生命力，这与它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断适应广大人民的需要，因而深受人民大众之喜爱是分不开的。

①秦大树：《简论磁州窑的兴衰》，《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总38期，中国陶瓷研究会1997年论文集。

②魏之输：《磁州窑陶瓷艺术初探》，《中国古陶瓷研究》，1987年，科学出版社。

③马忠理：《磁州窑装饰品种及流行时代》，出版刊物见注释①。

④赵光林、安久亮：《从北京出土的窖藏文物看我国古代民间收藏》，1994年，北京燕山出版社。

⑤林士民：《宁波出土的磁州窑之探索》，出版刊物见注释①。

⑥《首都博物馆藏品选》，1971年，文物出版社。

⑦赵光林：《从古陶瓷器物铭文看民窑款识之演变》，《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4年。

⑧雪生：《试论磁州窑文化现象》，出版物见注释①。

⑨《中国陶瓷史》，第237页，1982年，文物出版社。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退休干部）

辽

大安山延福寺李山主实行录丛考

任 昉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北京地区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地不爱宝,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文献,其中,佛教的经幢和僧尼塔铭(墓幢)数量不少,对于北京地区佛教发展史的研究,有着极大的裨助,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新近出版的《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壹],收有佛教僧尼塔铭 16 件,最早为辽天庆十年(1120 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最晚为民国三十年(1941 年)秋,堪称洋洋大观。本文拟先对最早的辽天庆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塔铭进行一些考释。

这件辽僧塔铭,此前曾经发表,但只有图版与说明,名为《大安山延福寺李山主实行录幢》^①。说明较为简单,原文为:

八角直楞幢,汉白玉石质,只存幢身。幢身高 110 厘米,五面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现存房山区文物管理所。新近收入《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壹]时,图版、说明、铭文、简注俱全,名为《大安山延福寺李山主(供臻)实行录》(以下简称《实行录》)^②。先将说明按原格式照录如下:

天庆十年(1120 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立)

塔身高 101 厘米,身为八棱,大棱宽 17 厘米,小棱宽 13 厘米。铭文 13 行,大字满行 27 字,小字满行 47 字。正书。余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1949 年后房山区大安山乡征集。现藏房山区文物管理所。

铭文不长,除去附刻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其余亦按原格式照录如下:

大安山延福寺李山主实行录

门资遵撰

恭闻 大安山主者,良乡人也,俗姓李氏,释讳供臻。童龀别爱从释,于延福办李出家,师礼于归雅。清闲气貌,乃越良才之外;勇锐人慈,可□奇人之上。德行深而四海莫测,慧亮高而五岳那欺。蕴其志也,同润于千山之王;施其慧也,若洒万州之雨。释外别嘉,更多妙哉。去众峻之□,未假攘襟;突群寇之难,何劳奋袂。得幸居于此者,宿寔之因,山之瑞应,感其人也。今得重修,再加崇建,是我山主上仁为之首矣。致乃剃度门资,数满百人上者。道坚惟囑已

讫,立造精蓝上下二处。云毕寿限,俗]年甲子及五百贰拾捌数终也。别别有多,贞待其碣,录□□幢记。]

天庆十年十一月戊子戊戌朔二十三日庚申坤时建立并讫

□士 胡云翼]

山主 门资提点讲论经道坚、讲经沙门洪渊、讲经论沙门道遵、讲经沙门道琛、讲经沙门道祥、持念沙门道鉴、]讲经沙门道偈、持念沙门道信、持念沙门道志、持念沙门道钦、持念沙门道荣、持念沙门道仪、]寺主沙门道偈、尚座沙门善重、都维那沙门善崇。原有二条“简注”:一条在“若洒万州之雨”下,云:“‘若洒’下似脱‘于’字。”一条在“天庆十年十一月戊子戊戌朔二十三日庚申坤时建立并讫”下,云:“‘戊子’似为衍文。”现就几个问题进行考证。

(一)大安山

首题及铭文所见“大安山”,位于今北京房山西北约 80 里,号称京西名山。此山最早受到注意并被开发,是在唐末五代之初。最早注意并开发此山的人,是当时的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据《新唐书》卷二一二仁恭本传称:仁恭,深州人。唐昭宗乾宁二年(895 年),李克用表为卢龙节度使。是时:

中原方多故,仁恭得倚燕强且远,无所惮,意自满。从方士王若讷学长年,筑馆大安山,掠子女充之。又招浮屠,与讲法。以董土为钱,敛真钱,穴山藏之,杀匠灭口。禁南方茶,自撷山为茶,号山曰大恩,以邀利。其子名守光。《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守光本传记载更详:

是时,天子播迁,中原多故,仁恭嘯傲蓟门,志意盈满,师道士王若讷,祈长生羽化之道。幽州西有名山曰大安山,仁恭乃于其上盛饰馆宇,僭拟官掖,聚室女艳妇,穷极侈丽。又招聚缙黄,合仙丹,讲求法要。又以瑾泥作钱,令部内行使,尽敛铜钱于大安山巅,凿穴以藏之,藏毕即杀匠石以灭其口。又禁江表茶商,自撷山中草叶为茶,以邀厚利。改山名为大恩山。

《通鉴》卷二六六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 年)三月条亦云:

卢龙节度使刘仁恭,骄侈贪暴,常虑幽州城不固,筑馆于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悬绝,可以少制众。”其栋宇壮丽,拟于帝者。选美女实其中。与方士炼丹药,求不死。悉敛境内钱,瘞于山颠;令民间用董泥为钱。又禁江南茶商无得入境,自采山中草木为茶,鬻之。

刘守光后来篡夺父位,于后梁乾化三年(913 年)十二月被灭。关于刘仁恭经营大安山,类似记载还有很多,以清厉鹗《辽史拾遗》卷七统和十四年(996 年)四月己亥条注最为详赡,这里不赘举。

(二)延福寺

据前引仁恭、守光二传,可以推测,仁恭统治幽州时期,已在大安山建筑道观和佛寺。但检索传世文献及传世藏经,均未记录仁恭所建道观和佛寺的名称。关于此大安山延福寺,亦于史无征。我们仅知:佛寺常以“延福”为号,福建泉州、浙江武义、四川峨眉、内蒙古阿拉善盟的延福寺最为著名,涿州是否有延福寺未见记载^③。实际上,1991 年,齐心、王玲等先生根据各类文献、碑刻及经文题记统计辽燕京寺院,还不知有此延福寺^④。直到近年,据包世轩先生介绍,才知有两方辽代石刻提到该延福寺:一方为门头沟区清水村辽代古刹清水院遗址发现的统和十年(992 年)“陀罗尼经幢”^⑤,该经幢间残存大安山延福寺僧众题名^⑥。一方为房山区大安山莲花峪辽代延福寺观音堂遗址发现的寿昌四年(1098 年)后“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篆额)或“大辽燕京西大安山延福寺莲花峪更改通圆通理旧庵为观音堂记并诸师实行录”(首题)^⑦,该记录两处提到延福寺^⑧。由此可见,至少在辽代,该延福寺确为大安山名刹。

大安山延福寺的始建时间已不可考。前引包世轩先生论文据前述统和十年“陀罗尼经幢”残存大安山延福寺僧众题名,认为:“大安山延福寺,可知辽统和十年(992 年)

已经存在,此寺的创建年代要早得多。”但根据传世文献记载,似乎也不能建得太早。因为辽代以前大安山并不太平。譬如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的反目,曾经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大安山攻防之战。如前引《通鉴》卷二六六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年)三月条接云:

仁恭有爱妾罗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不以为子数。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所过焚荡无余。夏四月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犹在大安山。城中无备,几至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与思安战,思安败退。守光遂自称节度使,命部将李小喜、元行钦将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战,为小喜所败。虜仁恭以归,囚于别室。

后来,后唐政府还曾大张旗鼓地掘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所藏之宝。如《旧五代史·唐书·明帝纪》长兴三年(932年)七月己亥条云:“幽州衙将潘杲上言,知故使刘仁恭于大安山藏钱之所,枢密院差人监往发之,竟无所得。”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作为崇尚清静的佛教,恐怕是很难过早在大安山建筑寺院的。

大安山延福寺的终毁时间亦不可考。我们知道:在延福寺已经存在的辽统和十年(992年)之后数年,大安山也还一直处在掘宝动乱之中,不同的是,掘宝者由后唐政府换成了辽的政府。《辽史·圣宗四》统和十四年(996年)四月己亥条云:“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又同书《食货下》云:“圣宗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散诸五计司,兼铸太平钱,新旧互用。”《实行录》称李山主“去众儉之口,未假攘襟;突群寇之难,何劳奋袂”,说的可能就是这一类动乱。《实行录》又称:“今得重修,再加崇建,是我山主上仁为之首矣。致乃剃度门资,数满百人上者。(门资)道坚惟囑已讫,立造精蓝上下二处。”说明原来的延福寺规模甚小,直到掘宝动乱之后,李山主主持寺院工作,才扩大规模,剃度门资数满百人以上,命门资道坚等新造精蓝上下二处。这应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但此后延福寺情况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我

们只知道:同时征集、同书所收、仅时代稍晚的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三月十六日(建)《大安山龙泉峪西石堂尼院第二代山主(善)超师塔铭》,竟然没有提到同处一山的延福寺^⑩。在此之后,《明一统志》卷一顺天府山川大安山条云:“在房山县北八十里,上有大安馆,相传五代时刘仁恭所建,遗址尚存。”《大清一统志》卷四顺天府山川大安山条云:“在房山县西北八十里,上有龙湫山,甚高险,唐末刘仁恭筑馆于此。”《畿辅通志》卷五三古迹大安馆条云:“在房山县西北大安山,刘仁恭创宫观、师事方士王若讷处也。”也都没有提到该延福寺。或许辽、金之后,延福寺已渐衰败,离终毁已经不远了吧。

(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前已介绍:《实行录》上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我们知道:《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简称《尊胜经》,属于密教经典。此经曾经多译,名称不尽相同,如:(1)唐杜行颢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2)唐地婆诃罗译,《佛顶最胜陀罗尼经》一卷;(3)唐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4)唐地婆诃罗重译,《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经》一卷;(5)唐义净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6)宋施护译,《尊胜大明王经》一卷;(7)宋法天译,《最胜佛顶陀罗尼经》一卷,等等。可见此经受密教重视之程度。

此外,我们还知道:20世纪30年代以来,我国北方出土辽代佛教文物,不少都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如:辽宁北票县南八家子乡四家板村曾出土辽开泰二年(1013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记”^⑪,1930年内蒙古巴林左旗哈巴气山谷曾出土辽重熙十五年(1047年)“陀罗尼经幢”^⑫,1953年内蒙古巴林左旗洞山曾出土辽乾统十年(1110年)“云门寺陀罗尼经幢”^⑬,1977年河北易县西北太宁寺村净觉寺舍利塔曾出土辽天庆五年(1115年)“净觉寺舍利塔墨书陀罗尼经及题记”^⑭,1981年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北曾出土辽纪年不详“开龙寺陀罗尼经幢”^⑮,等等。此外,前引梅宁华主编《北京

辽金史迹图志》(上)经幢类所收将近 30 件经幢,几乎都是“陀罗尼经幢”。其中,前述统和十年经幢,上层幢身刻《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下层幢身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和《佛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尤为可观。又,同书墓幢类所收墓表、塔铭,绝大多数也都附刻“陀罗尼经”。还有很多,陈述先生《全辽文》记载甚详,无须赘述。这似乎说明,有辽一代,密教在我国北方十分昌盛,实际情况恐怕也是如此。游侠先生谈到辽代帝室重视佛教教学,曾经指出:“辽代最发达的教学是华严,其次是密教,再次为净土以及律学、唯识学、俱舍学等。”^⑮也证明密教在辽代是我国北方的主要教派。

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据此推测:辽代的大安山延福寺就是一座汉传密教的寺院呢?答案恐怕不能如此简单。

首先,密教寺院的界定,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严耀中先生指出:“汉传密教的寺院是从来不像禅宗寺院称‘禅寺’那样在寺名上自称为‘密寺’的。”他认为:“从完整的意义来说,密教寺院应该符合三个条件。第一,所供奉的主要是密教的神祇,如毗卢舍那佛、千手千眼观音、毗沙门天王等等;第二,寺院住持当为密僧,至少是精通密经或密法咒术者;第三,寺僧之日常功课应该以密教内容为主,并经常做密教仪式法事。如果有的寺院只具有其中的一点,那就算是兼有密寺的性质;具有二点,可称为基本密寺。”^⑯而根据前引出土文献,是很难将大安山延福寺界定为汉传密教的寺院的。

其次,我们知道:《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缘起,乃是善住天子于命终之后,将受七度畜生恶道之苦,帝释天愍其业因,遂诣佛所,乞求救济,佛乃为之宣说尊胜陀罗尼及持诵之功德,等等。这就是所谓“佛顶尊胜”。据载:“佛顶尊胜”为密教胎藏界曼荼罗释迦院五佛顶之一。而五佛顶中,以释迦如来之佛顶所显现之轮王形佛顶尊为最殊胜。故密教以佛顶尊为本尊,而称修持息灾、除病之法为“尊胜法”。《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即说“佛顶尊胜”之功德,由八十七句

组成,历来十分灵验。而最重要的是:此经不仅密教使用,由于禅宗与密教关系密切,有所谓“禅密合一”之说,禅宗实际上亦行用^⑰。

再次,我们知道:前引“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或“大辽燕京西大安山延福寺莲花峪更改通圆通理旧庵为观音堂记并诸师实行录”,提到的通圆、通理二位高僧,均为禅宗高僧。前引包世轩先生论文对此已有考证^⑱。稍后,黄春和先生又特别对其中通理的实行进行了补考^⑲。近年,黄春和先生对辽代燕京禅宗传播史实进行考述时,又特别提到:“辽初禅宗的传播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便陷入了长期的沉寂。”但到了“辽代末期,禅宗从南方宋地重新传入燕京,给燕京禅宗带来了复燃的火种,通过外来和本土禅僧的共同努力,很快在燕京大地上传播开来。当时南来的禅宗有临济和曹洞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是当时中原内地最有势力的两个禅宗支派。它们在燕京各有其代表人物和活动地点。临济宗以竹林宝、竹林安、通理、通圆、寂照等人为代表,主要活动于城内竹林寺和大安山延福寺;曹洞宗以青州希辨为代表,主要活动于京西潭柘寺。”^⑳更为明确地将大安山延福寺作为禅宗寺院。笔者赞同这种解说。因为还有一条证据,这就是《实行录》称本寺住持供臻为“山主”。而尊称寺院住持为“山主”,似乎是禅宗的专利。北宋道原《传灯录》、李遵勖《广灯录》、明居顶《续传灯录》等禅宗灯录例证颇多。总之,大安山延福寺只能是一座禅宗寺院。

除了前述大安山、延福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外,《实行录》还记载了一些有意义的材料。譬如:李山主为“良乡”人。而我们知道:李山主的前辈、著名禅师通圆亦为“良乡”人。此二僧先后都曾在大安山延福寺弘法,其中存在什么渊源关系值得探究。又,“□士胡云翼”之“□”,根据图版辨析,似乎应该是个“信”字。而“信士”称谓出现甚晚。敦煌、吐鲁番所出晋唐迄宋初写经题记,供养人多自称“清信女”或“清信弟子”^㉑。清翟灏《通俗编》说:“今人出财布施曰信士。

汉曹全碑阴义士某千,义某五百,义士即出资助刊者。宋太宗(976~997年)朝,避御名,凡义士皆改为信。今之信士,即汉碑所称义士也。”从时间上看,宋避讳改称信士在前,《实行录》刻立径称信士在后,没有什么问题。但包括今北京地区在内的所谓燕、云十六州,从来就没有进入过宋的版图。如《宋史·地理一》说:“至是,天下既一,疆理几复汉、唐之旧,其未入职方氏者,唯燕、云十六州而已。”在宋、辽对峙的情况下,辽供养人的称谓避宋帝讳,似乎难以想象。但如果考虑辽的禅宗原从宋地传入,辽的禅宗供养人称谓从而也沿袭宋地之旧,这个似乎难以想象的问题也就不难解释了。据此,可以认为:该《实行录》的出土,对于进一步了解北京地区辽代佛教的发展,确实有着极大的裨助。

①梅宁华主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230~231页(说明、图版)。

②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上册50页(图版、说明)、下册40~41页(铭文、简注)。

③按:大安山延福寺属于涿州。与此涿州延福寺可能有点关系的传世文献记载,仅见元赵孟頫《松雪斋集》卷九《大元大崇国寺佛性圆明大师演公塔铭》提到“蓟州延福寺”。因为《辽史·地理四》南京道条曾云:“玉河县,本泉山地。刘仁恭于大安山创宫观,师炼丹羽化之术于方土王若讷,因割蓟县分置,以供给之。在京西四十里。”《钦定四库全书》卷九五记同。蓟、涿州县相邻,历史上常彼此割属,该塔铭有可能将“涿州”误为“蓟州”了。但如此解释,总觉牵强,因而不取。

④齐心、王玲《辽燕京佛教及其相关文化考论》,《北京文物与考古》第2辑,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1年,104~120页。按:前引梅宁华主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上)遗址类亦无此延福寺。

⑤前引梅宁华主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上),190~193页(图)。

⑥包世轩《辽玉河县清水院统和十年经幢考》,《北京文博》1995年第1、2期,90~92、86~90页。

⑦前引梅宁华主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上),150~151页(图)。

⑧⑨包世轩《辽〈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碑疏证》,《北京文博》1997年第3期,72~77页。

⑩前引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壹],上册56页(图版、说明)、下册46页(铭文)。

⑪冯永谦《辽宁地区辽代建置考述》,《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1期,119页。

⑫金永田《辽上京城址附近佛寺遗址及火葬墓》,《内蒙古考古与文物》第3辑,1984年,94页。

⑬⑭金永田《辽上京城址附近佛寺遗址及火葬墓》,《内蒙古考古与文物》第3辑,1984年,95页。

⑮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净觉寺舍利塔地宫清理记》,《文物》1986年第9期,76~77页。

⑯游侠《辽代佛教》,《中国佛教》第1辑,北京知识出版社重印本,1989年,89~94页。

⑰严耀中《五代以降的密教寺院》,《汉传密教》,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31页。

⑱严耀中《禅与密教》,《汉传密教》,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95~115页。

⑲黄春和《辽〈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通理实行补考》,《北京文博》1998年第3期,41~47页。

⑳黄春和《辽代燕京禅宗传播史实考述》,《首都博物馆丛刊》第13辑,北京地质出版社,1999年,1~6页。

㉑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90年。

(作者为中国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翠峰禅师、十方诸佛宝塔与延寿寺

韩建识

在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马房寺村东北角，矗立着一座八角九层密檐砖塔，这就是十方诸佛宝塔。塔坐北朝南，塔高 25.18 米^①，塔座高 3.2 米，塔周长约 24.9 米，拱券形门洞，洞高 1.78 米^②，门洞外的正上方刻有楷书“十方诸佛宝塔”石匾，塔心呈圆锥形。塔前原有一座延寿寺。该塔、寺都由明代翠峰禅师修造。可能因地处京郊，关于该塔的记载极少^③，本文试对翠峰禅师生平、十方诸佛宝塔及延寿寺的历史沿革加以考述。

一、翠峰禅师生平

今天在十方诸佛宝塔北偏西处，立有一块石碑，碑额篆书：“明故翠峰禅师碑文”，碑高约 180 厘米，座高 60 厘米，青石质。该碑对研究翠峰禅师生平有重要价值，笔者未见公开发表，现录文如下：

明故翠峰禅师碑文[↓]

赐进士第兵科都给事中陕西古灵近河俞撰[↓]

禅师，吴姓，法名德山，翠峰其别号也。关陕西夏人。幼而质朴，长慕禅门，年三十遂弃尘缘出家，礼灵南牛首寺海公和尚[↓]为师，守五戒，誓四愿，日积月磨，渐有领悟。未几而海公西化，师曰：“释门法教，海阔无涯，彼岸未登，可遽已乎？”因遍游天下[↓]名寺，历访高僧，始遍证因缘于古峰，继受传心印于月天，禅门宗旨，颇得顿悟。乃入河南伏牛山励志苦修，日饭麸糠菜[↓]根一食，为法忘躯，越六年而证果有成。师曰：“佛者，觉也。己觉而不以觉人，非慈悲也。”由是北游神京，相地于崇文门外二[↓]里^许建寺吉祥，阐扬正法，以振聋聩，当时闻教而景从者



十方诸佛宝塔

以千数，虽高明之士亦往叩其玄而服其说。第物盈[□]起法盛，[↓]魔生浮言。[↓]上闻，天威震撼。众皆为师危之，劝暂潜避。师稳坐蒲团，略无懼色，无妄之灾纵击撞数月而卒亦无事。乃辍讲归伏牛山，大建[↓]坛场，广演法教，受度者视昔愈倍，领悟者视昔愈多。时师年已七十矣，一旦谓众僧曰：“归与，归与，吾北人也。归化首丘，吾[↓]之愿也。”遂辞众还京，仍于吉祥东买香火地七余顷建寺，以延寿名额。且演教有堂，参禅有室，养老有斋，普通有塔，比视[↓]吉祥、伏牛旧寺地之广狭虽不同，而规制森严则一也。师度^{□□}员甚广，而圆月其尤也，见为长老住持。

师度功德主甚广，而内相李昕为首也，建寺之力居多。然寺功甫毕，师生成化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沐浴归化于嘉靖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得寿八十有一。卜葬于普通塔后数丈余。锦衣户侯王君应隆亦夏人也，曾受师度，以事属予，予亦夏人也，宦游适逢其会，因言曰：儒、释异教也，释非儒所言也，然儒道广大如天也，释氏得其一者也，凡理所在，儒亦不容默也。尝观释氏法门大要，以无念为宗，以无相为体，以无住为本，此上乘也。若执有者泥相迷无者落空，皆下也，况日用而不知者何纷纷耶。师三十出家，日生顿悟，天资发迹与六祖同也；他如淡薄日甘，六根定也；累劫不懼，四大空也；南北阐教，功施也。释门上乘，予固不敢以深许要。师旨归，亦得明心见性，不失六祖相传法门之正宗也。意使继之者守师之心，自一世递百世绵绵延延，师教岂有穷乎？铭曰：

翠峰之生，黄河之灵。翠峰之名，贺兰其凭。披荆牛山，五蕴皆空。苦修伏牛，百炼真精。否泰，宠辱不惊。南北阐教，玉振金声。猗欤翠峰，有风斯清，有月斯明。欵欵翠峰，磐石斯铭，沧。

嘉靖二十九年岁次庚戌孟夏吉日立。

与翠峰禅师生平有关的较详细的资料，还见于《高僧传合集·明翠峰山公传》^④。又《中国佛学人名辞典》载：“德山，（明）比丘。号翠峰，陕西宁夏人。三十出家，谒宝月潭得悟，入伏牛山结茅，清侣奔赴，法席大张。后至京师，住吉祥寺，名益盛。或毁之，即尔返山。众随之往。说法三十年，度人不计，以万历中寂于京师延寿寺，寿八十一。”^⑤

下文首先对翠峰禅师的名号、师承、生卒年等问题加以考证。

禅师名号。《明故翠峰禅师碑文》载：“禅师，吴姓，法名德山，翠峰其别号也。”《高僧传合集·明翠峰山公传》载：“德山，号翠峰”，《重修古刹延寿寺十方诸佛宝塔碑铭》载：“禅师，法讳德山，号翠峰，荆璧老人其别号也。”^⑥《中国佛学人名辞典》载：“号翠

峰”。可见，禅师应为吴姓，法名德山，号翠峰、荆璧老人。

禅师师承。《明故翠峰禅师碑文》载：禅师“年三十遂弃尘缘出家，礼灵南牛首寺海公和尚为师，……未几而海公西化，……始遍证因缘于古峰，继受传心印于月天”。《高僧传合集·明翠峰山公传》载：“年三十始出俗，从灵南牛首寺海公为弟子。……海公就化，师得以自便。……然偶遇古峰上人，悯师为道之勤，劝见宝月潭公。潭公，为时大禅伯，声光显著，一见相契，遂示以法要”。《中国佛学人名辞典》载：“三十出家，谒宝月潭得悟”。《明故翠峰禅师碑文》中提到的月天禅师，《中国佛学人名辞典》载：“月天，（明）比丘。字幻空，参广善宝月潭公得法，为南岳二十七世，住伏牛山栢梯寺，传法金台大觉而寂。”^⑧可见，翠峰与月天同为宝月潭公弟子。^⑨由此可知，翠峰禅师三十岁出家时，首先拜海公和尚为师，海公西化后，禅师始遍游天下名寺，历访高僧，后来遇到古峰上人，被禅师的为道之勤所感动，劝他拜见宝月潭公，经宝月潭公点拨，颇得顿悟。

禅师生卒年月。《明故翠峰禅师碑文》载：“师生成化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沐浴归化于嘉靖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中国佛学人名辞典》载：“以万历中寂于京师延寿寺”，《明故翠峰禅师碑文》所述为当朝人写当朝事，应该较为可信，即翠峰禅师生于成化四年（1468年）十一月十二日，卒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二月十一日。

综上所述，禅师，吴姓，法名德山，号翠峰、荆璧老人。关陕西夏人。幼年时天性质朴，深慕禅门。禅师三十岁时出家，拜灵南牛首寺海公和尚为师，守五戒^⑩，誓四愿^⑪，日积月磨，渐有领悟。海公西化后，禅师始遍游天下名寺，历访高僧，后来遇到古峰上人，被禅师的为道之勤所感动，劝他拜见宝月潭公，经宝月潭公点拨，颇得顿悟。随后，入河南伏牛山励志苦修，日饭麸糠菜根，六年后终成证果。于是，北游神京，在崇文门外二里许建吉祥寺，阐扬正法，信徒数以千计，魔起浮言，天子闻后，天威震怒。^⑫众人

都为禅师担心,有人劝他暂时躲避。禅师不从,稳坐蒲团,毫无惧色,后无事而终。于是,辍讲归伏牛山,大建坛场,广演法教。禅师七十岁时,一天,他对众僧说:“归与,归与,吾北人也。归化首丘,吾之愿也。”^⑬遂辞别众人回到京师,仍在吉祥寺东买香火地七余顷建延寿寺。在寺内修建演教堂、参禅室、养老斋、普通塔等,古刹規制初具。禅师生于成化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卒于嘉靖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享年八十一岁。弟子奉全身葬于十方诸佛宝塔后数丈处。禅师梵貌颀伟,观视凝定,喜怒不形于色,有容人之德、诲人不倦,持身甚约,所蓄无长物。

二、十方诸佛宝塔

关于修建十方诸佛宝塔的起因,《重修古刹延寿寺十方诸佛宝塔碑铭》认为:“凡开山创业之僧[腊]生脱灵骨[藏]无归隐”。^⑭《明故翠峰禅师碑文》也说此塔为普通塔。《佛学大辞典》“普同塔”条下:“禅林之语。藏亡僧之骨於一处,故云普同塔。又曰普通塔、海会塔。”^⑮同书“海会塔”条下:“亦云普通塔。众僧之纳骨塔也。”^⑯由此可知,因延寿寺为新建寺院,亡僧之骨无处安放,修建十方诸佛宝塔是为了安放众僧的灵骨。

关于十方诸佛宝塔始建于何时,《重修古刹延寿寺十方诸佛宝塔碑铭》载:“于乙巳岁季春□日刹后禅师忽偶发心处建立十方诸佛普同之宝塔”。^⑰据《明故翠峰禅师碑文》,翠峰禅师生于成化四年,卒于嘉靖二十八年,七十岁时开始修建延寿寺,在寺内修建十方诸佛宝塔,禅师七十岁时应为嘉靖十七年(1538年),那么,十方诸佛宝塔的始修时间应在嘉靖十七年至嘉靖二十八年之间,此段时间内的乙巳岁只能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因此,十方诸佛宝塔的始建时间应为嘉靖二十四年季春(三月)。

关于十方诸佛宝塔的内部结构,《重修古刹延寿寺十方诸佛宝塔碑铭》载:“檐层九,中通八,□内安请佛罗汉像,内下有藏真

之穴圻以盛不朽之坚固或藏衣钵之爪发齿牙,迁化有德者咸有所依附焉。”^⑱可见,该塔建成之初,有九层檐,中空,直通第八级,塔内安请佛罗汉像,塔内下有穴圻以盛众亡僧的灵骨、爪发齿牙等。该碑文的描述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情景基本相符,只有佛罗汉像今已不存。

明朝尚衣监太监薛铭等重修十方诸佛宝塔。该塔建成十多年后,由于骤雨损伤,尚衣监太监薛铭^⑲等人在暇日祭奠先师公等时,发现塔有漏缝,担心日后影响塔体坚固,产生了重修宝塔的想法,在延寿寺第二代主持圆月^⑳等人的请求下,薛铭和内外信官出资置灰添石,砖填砌实,重修此塔。该工程于嘉靖丙辰(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季秋(九月)完成。^㉑

民国年间,该塔曾被重修^㉒。

1959年,十方诸佛宝塔的塔门有些砖被拆去,其它尚好;塔后有四个和尚塔,塔座为砖制,有雕花,其中一个塔前有螭首龟驮碑。^㉓四个小和尚塔今已不存。

1989年3月,朝阳区人民政府拨款10万元再次重修。^㉔1990年2月23日被公布为北京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㉕

三、延寿寺

嘉靖十七年,翠峰禅师在吉祥寺东买香火地七余顷建延寿寺^㉖,修造了演教堂、参禅室、养老斋、普通塔,古刹初具规模。

翠峰禅师主持延寿寺时,四方善士、各处戒僧云集,有众多布施者,但是,禅师不集布施,不集余粮、不修寺宇,把布施所得都买成衣服、粮食供奉善士、僧众等,有人劝他积余防后,禅师便说:“集财招盗,我山野之僧何必为之。”众人叹服。因此,延寿寺愈加破损。嘉靖三十五年,尚衣监太监薛铭等在重修十方诸佛宝塔时,也没有对该寺其它建筑加以修理。由于风雨摧坏,年久失修,到嘉靖三十七年,延寿寺内殿堂、厨房、僧房等处瓦箔脱落,椽檩损坏,已难以居处。司礼监太监李公(号中轩)^㉗闻知后,自己出资鸠工

集料,修盖了殿堂、厨库、僧房等处,再筑了周围墙垣。整个寺院,金碧交辉,焕然一新。这次重修兴工于嘉靖戊午(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孟秋(七月)一日,完工于本年孟冬(十月)吉日。^②

明隆庆年间,慈圣皇太后^③听说延寿寺年久圯坏,发心施舍银一千五百两,宫眷人等陆续施银一千两,命近侍官王喜主持重修。自隆庆五年(1571年)四月初三日至万历元年(1573年)八月初十日,“内建山门一座,天王殿一座,钟鼓楼二座,藏经殿五间,内新印藏经,全水陆殿五间,新造水陆全方丈房三间,禅房十间,接待僧房三间,凡供设器物靡一不具,芝房桂殿尽善尽美,宝阁琼台美轮美奂。”^④

明万历年间,慈圣皇太后命勤侍夫人传施惠资及众眷布施重修地藏阁、左右配殿及四周山房。该工程始于万历乙酉(万历十三年,1585年)春季,完工于明年丙戌(万历十四年,1586年)秋季。^⑤

明万历戊寅(万历六年,1578年),印空禅师(即延寿寺第二代主持圆月)隐逝,寺内无主,印空之徒,慈舟上人,慨然应允施主的请求,于癸未(万历十一年,1583年)离开伏牛山,来到延寿寺,一时乐善好修之士闻风而至,富者捐其赢,拙者罄其有,贵势者持其画智,能者运其思,不出三四年,地藏阁及左右配殿、大雄天王伽蓝祖师殿、钟鼓楼等修盖完备,重门、周垣、斋庖之房、栖容之庐金碧掩映,左右回互。该次重修完工于万历丙戌(万历十四年,1586年)仲秋(八月)。^⑥

寺院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遭焚毁,破坏殆尽。^⑦

附录:《高僧传合集·明翠峰山公传》:

德山,号翠峰,关陕西夏人。幼质朴,深慕禅悦。年三十始出俗,从灵南牛首寺海公为弟子。束戒缚禅,日积月磨,渐有契会。海公就化,师得以自便。因遍参丛席,足迹殆半天下。虽历诸禅老钳椎,而碍膈之物终未脱。然偶遇古峰上人,悯师为道之勤,劝见宝月潭公。潭公,为时大禅伯,声光显著,一见相契,遂示以法要,且曰:“子期心固远,

然终欠一番彻骨在,必过此一番,死中发活,始可面目向人,出言吐气,皆有著落。不然,徒使伎俩,了没交涉也。”师闻忽醒,即日辞去。入伏牛山,傍崖结茆,日食麸糠草根,不知身为何物,如是六年,而豁然融贯。瓣香为潭公嗣,不忘所本也。自是远近奔赴,法席大张,相从者动以千计。以众盛故,魔起浮言。上闻,天威震怒。众皆为师危之,或劝师暂避,不从,安坐丈室,略无懼色,而卒亦无他。此在都门吉祥寺时事也。既而舍众归伏牛,而众终不舍师,故伏牛之众,视吉祥为尤盛。说法三十余年,度人不可称记。一旦谓众曰:“归欤,归欤,吾北人。归化首丘,吾之愿也。”遂还京,居延寿。延寿在吉祥东,师所创也。未几而寂,年八十有一。弟子奉全身,瘞于寺普通塔之后。师梵貌颀伟,观视凝定,喜怒不形于色,有容人之德,学子不谕其意,师谆谆为教,必使达之而后已。持身甚约,所蓄无长物,得禪施辄缘手尽,以广二田,若於已无与焉者。有为师赞者曰:“有风斯清,有月斯明。猗欤翠峰,玉振金声。”师实录,当之无愧。

①《北京名胜古迹词典》(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9月北京第1版,352页)和《新编文物工作手册》(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369页)皆作:“高约30米”;《北京市朝阳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728页)作:“高30米”;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1984年5月《文物古迹调查登记表》作:“高约20多米”;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委员会所建“朝阳文化”网“十方诸佛宝塔”条下作:“高25.19米”,据本人现场目测,高25.18米较为可信。

②参见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1984年5月《文物古迹调查登记表》。

③《宸垣识略》([清]吴长元辑,1983年12月第1版,251页)载:“延寿寺在马坊,去广渠门十八里,有浮图一,明嘉靖中建,有礼部侍郎许成名、户部郎中李景二碑。”另有较详细的叙述见于《北京名胜古迹词典》和《北京市朝阳区地名志》等。

④《高僧传合集》,[梁]慧皎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715页。

⑤《中国佛学人名辞典》，比丘明复编，中华书局，1988年1月第1版，534页。

⑥⑭⑰⑱⑲《重修古刹延寿寺十方诸佛宝塔碑铭》，《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六册，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14页。该碑今立于十方诸佛宝塔北偏东处，碑首雕双龙戏珠，碑身高约151厘米，碑额高约40厘米，碑座高约60厘米。碑阴为“万古流芳”题名，内有薛铭等人。

⑦璧，《北京名胜古迹词典》和《北京市朝阳区地名志》皆作“壁”，今据《重修古刹延寿寺十方诸佛宝塔碑铭》应作“璧”。

⑧《中国佛学人名辞典》，48页。

⑨参见《中国灯录全书》第19册，净慧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11月。

⑩五戒指不杀生戒、不偷盗戒、不邪淫戒、不妄语戒、不饮酒戒。

⑪四愿指誓度一切众生、誓断一切烦恼、誓学一切法门、誓证一切佛果。

⑫明王朝对佛教采取了既利用又整顿，着重在控制的方针。明宪宗时对寺院的数量严加控制，规定：不得妄自增修寺院（见《宪宗成化实录》卷3），不许於原额外增修额（见《宪宗成化实录》卷49）。《世宗嘉靖实录》卷313载：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壬戌礼科右给事中李文进言：迩年宣武门外天宁寺中，广聚僧徒，辄建坛场，受戒设法，拥以盖舆，导以鼓吹。四方缁衣，集至万人，瞻拜伏听，昼聚夜散，男女混淆，甚至有通罪黠徒，髡发隐匿，因縁为奸。故四月以来，京师内外盗贼窃发，鞞毂之下，岂应有此？……乞捕外护为首者数人及通法师者案治其罪。诸郡邑各山古刹，如有佛子法师假以讲经聚众至百人者，一体禁止。如此则邪说不兴，异端自熄。疏入，得旨：奏内通法师及寺主俱令锦衣卫捕系鞫问，余下礼部禁治。”天宁寺因听众人数众多，就以盗贼混杂其中为由加以镇压，由此可见明朝统治者对佛教严加控制的方针。吉祥寺的众多听众，必然引起明朝统治者的恐慌，对其法事加以限制也在所难免。

⑬见《明故翠峰禅师碑文》。

⑭《佛学大辞典》，丁福保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1月新1版，1045页。

⑮《佛学大辞典》，902页。

⑯据《重修古刹延寿寺十方诸佛宝塔碑铭》，薛铭时为尚衣监太监，承受厚禄之爵，赐以蟒玉，日侍皇上之左右。

⑰圆月，为延寿寺第二代主持，其事见于《高

僧传合集》(716页)：“圆月，字印空，姓熊，京师人，入翠峰之室，栖伏牛山，久之有得，性光显露，辟道场开法，学子□至，声闻九重，被命於广善戒坛，为受戒者宗师。”

⑱见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委员会所建“朝阳文化”网“十方诸佛宝塔”条。

⑲据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1959年1月《文物古迹调查登记表》。

⑳见《北京市朝阳区地名志》。

㉑见《新编文物工作手册》，369页。

㉒据《重修敕赐延寿寺鼎建地藏阁碑记》(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该寺曾被勒名为“延寿”。

㉓据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重修古刹延寿寺记》和《皇明司礼监太监中轩李公墓志铭》，李公，讳端，字克正，姓李氏，别号中轩。保定安肃人。正德丙子(正德十一年，1516年)选入内，明年收内馆受业儒臣。历任典簿、左右丞、太监等。李公天性正直，资质秀爽，举止动静不类常人。自奉命问刑以来，夙夜勤慎、小心翼翼，上不负君命，下不亏人心。宽仁厚德，不矜小节，济人利物，沾养者众。挥金仗义，发现先贤废祠就慨然修建。先帝为嘉其劳勋、奉公守法，特赐蟒衣玉带、内府骑乘，岁加禄米以酬其劳，又命接引大臣，进出其奏。生于弘治戊午年(弘治十一年，1498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亥时，卒于隆庆改元(1567年)五月十九日，享年七十岁。六月七日葬于廓西白口社。

㉔参见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重修古刹延寿寺记》。

㉕慈圣皇太后，《明史》([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1版，3536页)卷一百十四载：“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钜万，帝亦助施无算。居正在日，尝以为言，未能用也。”

㉖见《重修延寿寺碑记》，《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七册，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4页。该碑今立于十方诸佛宝塔北，碑首雕双龙戏珠，碑身高约250厘米，座高约60厘米。

㉗参见《重修敕赐延寿寺鼎建地藏阁碑记》。

㉘参见《重修延寿寺记》，《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七册，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143页。

㉙参见《北京名胜古迹词典》，352页。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北京文博》编辑部编辑)

乾隆御制

《帝都篇》、《皇都篇》

碑文注释

高凯军

目前已知刻有乾隆御制《帝都篇》、《皇都篇》的碑刻有二。其一，在永定门外燕墩。据[清]于敏中等编《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九十，《郊坰南》记载：“燕墩在永定门外半里许，官道西，恭立御碑台。恭勒御制《帝都篇》、《皇都篇》。其制，甃砖为方台，高二丈许。北面西偏门一，以石为之。由门历阶而上数十级，至台顶，缭以周垣。碑立正中，形方而长，下刻诸神像，顶刻龙纹，面北恭镌御制《帝都篇》，面南恭镌御制《皇都篇》，均清、汉书。”此碑至今保存原貌，与上述记载相符。

其二，埋藏于先农坛墙外京青食品厂院内地下。据悉，该碑原处天桥十字路口西北方的“斗姆宫”内，民国时有人将它移至先农坛东北外坛墙下，后又移至先农坛内坛东北角，因历久风尘，埋地下。经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专家们多年探索查找，于今年初春发掘出土。据笔者现场勘察，该碑由碑顶、碑身和底座等部分组成。其中碑身为146平方厘米截面、高320厘米的方形石柱，四

面刻有满、汉两种文字的《帝都篇》和《皇都篇》。汉文部分与《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九十，《郊坰南》所录《帝都篇》、《皇都篇》文字基本相同，唯结尾处有“乾隆十有八年岁次（在）癸酉孟夏月御笔”字样，其后有乾卦圆形章和隆字方形章。另外，碑中《皇都篇》“阅今千年峨天闾”句的“年”字，《旧下旧闻考》误录为“载”字；“八旗居处按界疆”句的“按”字，《日下旧闻考》误录为“安”字。

该两碑及其所刻汉、满文本乾隆御制《帝都篇》和《皇都篇》系研究和展示北京历史的重要实物文献。为便于人们进一步研究和理解这两篇碑文的内容和更准确地把新发现的这块碑用于首都博物馆新馆展陈，笔者在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两篇碑文的汉文部分加以注释，仅供参考。不妥之处，尚祈读者斧正。

一、《帝都篇》

帝都者，唐虞^①以前都有地而名不著，夏商以后始各有所称，如夏邑^②、周

皇都篇

皇都者據今都會而為言約形勢則若彼詳沿革則若此蓋不如研京十年紀
都一紀鴻篇巨作纂組雕龍若夫文皇傳十首之吟賓王構一篇之藻師之
和固兩景仰歸於際遇亦用興懷俊逸清新古人檢以加矣還淳返樸斯為
致意焉

惟彼陶唐山冀方上應帝車曰開陽軒轅臺榭雖莫詳職方有幽無徐泗夏之
長且廣叶山河襟帶具大綱列國據此士馬強可以雄視諸南邦遺金以來始稱京
叶閱今千年我天閭地靈信比長安長至帛奔走來梯航儲胥紅朽餘夫倉天衢十
一九軌容叶八旗居處按界疆朱樓甲第多侯王槐市陸海無不嚴富乎盛矣日中
央是予所懼心傍徨

乾隆十有八年歲在癸酉孟夏月

御筆

帝都篇

帝都者唐虞以前都有地而名不著夏商以後始各有所稱如夏邑周京之類
是也王畿乃四方之本居重馭輕當以形勢為要則伊古以來建都之地無如
今之燕京矣然在德不在險則又鞏金甌之要道也故序大凡於篇

天下宜帝都者四其餘偏隘無足稱軒轅以前率荒略至今涿鹿傳遺城豐鎬頗得
據扼勢不叶方首洛乃營天中八達非四塞建康一暫何堪憑此冀方曰天府唐
虞建極信可徵右擁太行左滄海南襟河濟北居庸叶會通帶內遠海外雲帆可轉
東吳杭幅員本朝大無外不叶廊連兩京北京順天府 盛京奉天府有嘉賓歲來集無煩控御聯
歡情盛湯百二要在德叶勸其飲洛

乾隆十有八年歲次癸酉孟夏月

御筆

先农坛墙外出土乾隆御制《帝都篇》、《皇都篇》拓本

京^③之类是也。王畿乃四方之本，居重驭轻，当以形势为要。则伊古以来建都之地，无如今之燕京矣。然在德不在险^④，则又巩金瓯^⑤之要道也。故序大凡千篇。

天下宜帝都者四^⑥，其余偏隘无足称。轩辕^⑦以前率荒略，至今涿鹿^⑧传遗城。丰镐^⑨颇得据扼势，不均方贡洛^⑩乃营。天中八达非四塞，建康一堑何堪凭^⑪？惟此冀方^⑫曰天府，唐虞建极^⑬信可征。右拥太行左沧海，南襟河济^⑭北居庸^⑮叶^⑯。会通带内辽海外，云帆可转东吴^⑰杭^⑱。幅员本朝大无外，丕基式廓连两京^⑲。北京天津居北京西关外我有嘉宾岁来集，无烦控御朕欢情。金汤^⑳百二要在德，兢兢永勛其钦承。乾隆十有八年岁次癸酉孟夏月御笔（此处有圆、方两印）

注 释

①唐，即陶唐氏，传说中夏代以前以尧为领袖的远古部落，相传居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虞，即有虞氏，其首领舜为尧的继任者，相传居于蒲阪（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但是，据古史传说和考古资料来看，尧、舜时期，由于洪水泛滥，旱涝无常，他们的居地一直处变动不居的状态，据唐朝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越州余姚县，顾野王曰：‘舜后支庶所封地也，舜姚姓，故云余姚’”，“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濮州雷泽县有历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舜生处也。及妫州历山、舜井，皆云舜所耕处”。这说明舜的活动史迹有三处，即浙江余姚、山东雷泽和山西妫州。史树清先生据上述记载和河姆渡遗址发掘情况，提出河姆渡遗址姚墟说（参见史树清《鉴古一得》第189—191页，学苑出版社2001年）。《史记·夏本纪》说：“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也许正是由于当年南方洪水肆虐，导致了尧舜部落从浙江余姚到山东雷泽再到山西妫州的迁徙。由于频繁迁徙，都城建设不具规模，缺乏准确记载，所以这里说他们“都

有地而名不著”。

②夏邑即夏朝的都城，据史书记载共有三处：始都阳城（今河南登丰东），后迁斟鄩（登丰西北），再迁安邑（山西夏县西北）。另外，考古发掘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一般被认为是夏朝所留。

③周京即西周镐京，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建西周，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沔水东岸）。

④“在德不在险”，语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系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吴起的重要观点。据该书记载：“（魏）武侯（携吴起乘船一引者）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

⑤金瓯，原指盛酒器。比喻疆土完固。《南史·朱异传》：“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

⑥这里主要是指西周镐京、东周洛邑（今洛阳）、汉唐长安（今西安）和明清北京。

⑦轩辕，即黄帝。《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唐司马贞《索引》引皇甫谧曰：“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轩辕丘在今河南新郑西北。

⑧涿鹿，地名，在河北西北部桑干河流域，汉置涿鹿县。该县东南有涿鹿山，相传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即此。

⑨丰镐，丰亦作沔，指丰京，西周文王时建于沔水西岸；镐，指周武王时建于沔水东岸的镐京。此两京均系形势险要的战略要地。

⑩洛，即洛阳。西周末年，虽然周天子据有镐京这一战略要地，但由于不修德政，对天下横政暴敛，遭到诸侯国和少数民族

的反抗,公元前 771 年申侯联合犬戎攻杀周幽王,导致西周灭亡。前 770 年周平王即位,迫于诸侯反叛和戎族攻击,东迁洛邑(今洛阳),史称东周。此时周天子权威逐渐衰落,很多诸侯国已各自为政,不能如期朝贡,使周王室在政治和经济上日益受制于诸侯,并最终走向了灭亡。

⑬建康,即古都南京。公元前 333 年,楚威王在今南京清凉山设金陵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金陵邑为秣陵县。公元 229 年,孙权把都城迁至秣陵,第二年改名建邺。西晋建兴元年(公元 313)因避愍帝司马邺讳,改为建康,东晋、南朝皆都于此。一甿,指长江。此句意思是说,由于东晋、南朝的汉族统治者狭隘的民族政策,虽据有长江天险,仍无法阻止羯、氐、羌、匈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割据状态。

⑭冀方,即北方。冀,古九州之一,包括今山西全省,河北西北部、河南北部、辽宁西部。天府是指物产富饶,形势险峻的地方。《战国策·秦策一》:“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三国时,蜀国都城成都亦被誉为“天府之国”,即取此意。乾隆称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为“天府”,亦取此意。

⑮极,指房屋的中栋。《后汉书·蔡茂传》:“茂初在广汉,梦坐大殿,极上有三穗禾”。这里指尧、舜时期所建的早期都城。

⑯河即黄河,济乃济水。《尚书·禹贡》:“导沔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据《水经注·济水》,济水源出河南济源县王屋山,其故道本过黄河而南,东流至山东,与黄河并行入海,后下游为黄河所夺,惟河北发源处尚存。

⑰居庸,即居庸关。

⑱东吴,三国时的吴国,因皇室姓孙,亦称孙吴。公元 221 年,孙权自公安迁鄂(今湖北鄂城)汝鄂为武昌,称臣于曹魏,魏封其为吴王。229 年孙权在武昌称帝,建吴国,不久迁都建邺。占有今长江中下游,南至福建、两广及越南北部和中部部分地区,

280 年为晋所灭。东吴系指我国东南沿海富庶地区。

⑲秔,粳的异体字。我国栽培稻的一个亚种,米质粘性较强。上述两句的意思是说,北京不仅战略地位重要,而且经济交通便捷,可以通过京杭大运河把南方的稻米顺利地运往京师。

⑳丕乃大也。式通试。廓,开展,扩张之意。两京,指北京和沈阳。

㉑金汤,金城汤池之简称。金以喻城之坚固,汤喻沸热不可近。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大清垂国百余年来关键在“德”,朕欲兢兢业业以先世德政勩勉,使大清基业发扬光大,传之永远。

二、《皇都篇》

皇都者,据今都会而为言,约形势则若彼,详沿革则若此。盖不如研京十年,练都一纪,鸿篇巨作,纂组雕龙。若夫文皇传十首之吟^①;宾王构一篇之藻^②。节之中和^③,固所景仰;归于睽遇,亦用兴怀。俊逸清新,古人蔑^④以加矣;还淳返朴,斯篇三致意焉。惟彼陶唐此冀方,上应帝车曰开阳^⑤。轩辕台榭虽莫详,职方有幽无徐梁^⑥。要之幅员长且广^⑦,山河襟带具大纲。列国据此士马强,可以雄视诸南邦。辽金以来始称京^⑧,阅今千年哦天阊^⑨。地灵信比长安长^⑩。

玉帛奔走来梯航^⑪,储胥^⑫红朽余太仓。天衢十二九轨容^⑬,八旗居处按界疆。朱楼甲第多侯王,槐市^⑭陆海^⑮无不藏。富乎盛矣日中央,是予所懼心彷徨^⑯。

乾隆十有八年岁在癸酉孟夏月御笔(此处有圆、方两印)

注 释

①文皇,指唐太宗。唐太宗逝世后,谥曰文,故谓文皇。《十首之吟》指唐太宗所作《帝京篇十首并序》。参见《全唐诗》卷一,《太宗皇帝·帝京篇十首并序》。

②宾王，即骆宾王（公元640—？）唐婺州义乌人。高宗末为长安主簿，以言事得罪，贬临海丞。文明（684）中，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武则天，骆宾王参与起草讨伐武则天檄文，文锋犀利。相传武则天读檄文，叹曰：“宰相安得失此人！”后徐敬业兵败，骆宾王不知所终。骆宾王诗文俱佳，与同时王勃、杨炯、卢照邻齐名，称四杰。《旧唐书》有传。“宾王构一篇之藻”指骆宾王所作《帝京篇》，参见《骆宾王集》。

③中和，儒家中庸观念，不偏不倚、宽猛相济、政治平和之意。

④蔑，在这里是“无”的意思。

⑤帝车，指北斗七星。《史记·天官书》：“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开阳是北斗星中第六颗星的名字。此句的意思是说，由陶唐氏开辟的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上方正对着开阳星的位置，因此北京具有作为帝都的吉兆。

⑥职方，系《周礼·夏官·大司马》中的一篇，作者不详，大约成书于战国，是我国古代重要地理著作。幽，即幽州，徐即徐州，梁即梁州，皆古九州之一。关于古九州，史书说法不一。《尚书·禹贡》记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周礼·职方》所记，有幽、并，而无徐、梁。关于幽州，该书记为“东北曰幽州”，包括今北京、河北北部及辽宁南部一带。《尔雅·释地》所记，有幽、营，而无青、梁。这里“职方有幽无徐梁”是说以今北京为首府的幽州自古就是我国北方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

⑦指辽南京和金中都。

⑧闾，即闾阖，传说中的天门，亦指皇宫正门。天闾，指北京。

⑨疑此段上句缺落。原因盖在乾隆，工匠岂敢漏刻？下句意思是北京乃人杰地

灵之宝地，比汉、唐长安城更适合于作国都。

⑩梯航，指登山之梯和航海之船。也指登山与航海。这里是说北京是玉帛汇粹之地。此句典故出自《汉书·食货志》，其中描述“文景之治”的富庶景象说：“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⑪储胥，原意为木棚藩篱之类，作为守卫之用。这里指盛粮食的粮仓。这句是说，北京是万物珍宝汇粹之地，皇家太仓里存粮丰盛，朽烂了也吃不完。

⑫天衢，即天路。衢是四通八达的大路，比喻通显之地。天衢，指京师。轨，指车两轮间距。古代各国车轨间距不一，故秦始皇搞“书同文，车同轨”。九，泛指多样化。这里是指清政府在对待各民族政策上，不搞整齐划一，能够兼容并蓄，团结了汉、蒙等民族，靠满、蒙、汉八旗来巩固统治、保卫边疆。

⑬槐市，汉长安市场名，在城东南，以其地多种槐树而得名。这里指北京的市场。

⑭陆海，旧指关中一带。《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朔进谏：“汉兴……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注曰：“高平曰陆，关中山川物产饶富，是以谓之陆海也”。这里是说北京百货汇集，市场繁荣。

⑮这句是说，尽管大清政权巩固，京师繁荣，如日中天，但乾隆帝仍心存警惕，彷徨担忧，表明居安思危之意。乾隆的担忧颇具远见，他逝世以后，“康乾盛世”也随之结束了，清朝开始走向逐渐衰落的下坡路。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研究员）

试论北京唐代墓志的地方特色

陈 康

本文所说北京唐志,特指的是在唐代幽州所辖之今北京市的范围,不包括已划归河北省那部分出土的唐代墓志。

唐代幽州都督府治蓟,下辖幽、檀二州及妫州、饶乐都督府在今北京境内的部分地区。幽州领10县,其中蓟、潞、良乡、昌平四县在今北京境内,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析蓟县西界分置幽都县,与蓟分治蓟城内外,唐代蓟县和幽都县所辖范围包括今北京市的城内及市区,潞、良乡、昌平三县,檀、妫二州在今北京市的郊县。

幽州城,也就是历史上的蓟城,在今北京城西南隅宣武区范围内,唐代的蓟城与从战国到唐代以前的蓟城有了比较明确的记载。

另,范阳县(今河北省涿州市)的西北部在今北京房山区境内。

一、幽州在唐代的地位

幽州之名因何而起?又源于何时呢?“东北曰幽州”。《释名》曰:在彼幽昧之地,故曰幽地,又曰:燕之为音,燕也,其气内盛而燕宛也。^①

幽州在春秋战国时还属于周王朝一个相当落后的诸侯大国——燕国,自秦汉以来已逐渐成为国家北鄙的重镇,是中原王朝在北方与东北抵御草原民族南侵的门户。隋朝时在此设立涿郡,隋文帝为加强防御突厥的南犯,在此设立了幽州总管府。唐朝建立

后,其国家版图虽然幅员辽阔,主要的政治舞台在长安及东都洛阳,但幽州却一直是唐王朝经略、防御、巩固、发展北方及东北边疆的军事重镇,它已成为唐王朝在北方的一个窗口和前沿阵地。

在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幽州的地位上升,已与洛(今河南洛阳)、荆(今湖北江陵)、并(今山西太原)、交(今越南河内)四州并称五大总管府了。诗云:“幽朔巨都,全燕重地。”^②

唐初幽州地位、管辖范围和政权、军权大小都与当时的边境形势有密切的关系,规模最大时在武德六年(623年)突厥大举南侵时,高祖将幽州总管府升为大总管府,领州三十九。反之,在和平时期,其管辖范围便大幅度缩小,如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亲征讨平东突厥,东突厥败退,北边出现了较长时期的和平状态,至贞观八年(634年)幽州都督府所辖州仅有幽、易、燕、北燕、平、檀6州。

在长期的战争中,唐政府清楚地认识到幽州在对少数民族的入侵逐步采取了抵御、进击和怀柔、沟通的双重政策,体现出它在国家版图中的重要性。国家的对外政策需要有幽州这样一个处于至关重要地位的地方机构来实施。

虽然唐代幽州的地位十分重要,但实际上史籍对唐代幽州的记载甚为简略,人们对幽州城的了解甚为粗浅,幽州所辖的县治相比中原地区还是相当落后的,农业经济和村

庄聚落的密度远远低于中原地区,唐代幽州的里坊、村乡都没有文献的记载,因此唐代墓志才凸现出其独特的历史文献价值。

北京唐代墓志反映了幽州地方政权机构的设置和变化,对于幽州城的方位、城市布局,以及唐代幽州地方的军事、经济、冶铸、手工业、交通、文化、对外交往等诸方面都提供了最真实的记载,尤其是对唐代幽州建制复原、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北京出土唐志概况

幽州在唐代是北方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官署衙门健全,军号、折冲府齐备,羁縻州遍布,县乡村镇设置,一应俱全。幽州的人口相对北方其他地区较为稠密。自清代以来,在北京地区陆续出土了不少唐志,这对北京史地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按目前已公布和已知入藏及散落在各区出土唐志统计,历年来在北京出土的唐志约有 80 余方左右。北京唐志的来源:(1)《全唐文》、罗振玉《京畿冢墓遗文》、朱士端《宝禄堂收藏金石记》等,(2)国家图书馆馆藏唐志拓片,(3)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以及首都博物馆、市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博物馆等藏品,(4)各区县文物单位所藏。

从现在已出土的唐志所刻年代看,最早的是《唐故朝散大夫仪同三司上柱国左戎卫开福府旅师件(欽)君墓志铭》,时间是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最晚的是《大唐范阳

卢公故夫人天水郡赵氏墓志铭并序》和《唐故陇西郡要氏夫人墓志铭并序》,为唐昭宗文德元年(888年),时间跨度在 200 余年。

北京地区绝大多数出土的墓志,时代多在开元(713—741年)以后,比例在 49%,其中又以顺宗永贞元年(805年)以后的居多,比例为 34%。新中国建立前,唐志有些零星出土,已知最早的是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在西城区西安门内发现的《唐故濮阳卞氏墓志》^④,但这些唐志大多没有明确的出土时间和地点。(见罗振玉《京畿冢墓遗文》),唐志在解放后才大量出土。

在已出土的唐志中,志主地位最高的是 1966 年在丰台区林家坟出土,葬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僭称“大燕昭武皇帝”的史思明或史朝义的玉册。

北京已出土的唐志分布:以幽州城周围西、南、北三个方向居多,集中在今西城、东城、宣武、丰台、海淀、石景山、通州、房山区,大兴、昌平、密云有零星出土。

三、北京唐志的内容和特点

唐代的墓志向以内容丰富、文体潇洒见长,真实地反映出盛唐的方方面面,而北京出土的唐志有着其鲜明的地方特点。

1. 墓志志主的身份复杂,几乎包括了唐代幽州地方各阶层

(1)幽州官署:唐代幽州地方行政机构名称及其变化,可分为三个时期:

时 期	年 代	名 称	长 官
前 期	武德元年 (618 年)	幽州总管府	总管
	武德五年 (622 年)	幽州大总管府	大总管
	武德七年 (624 年)	幽州大都督府	大都督
	武德九年 (626 年)	幽州都督府	都督
中 期	景云元年 (710 年)	幽州都督府	节度使
	开元十二年 (724 年)	幽州大都督府	节度使
	天宝元年 (742 年) 治幽州控奚、契丹	范阳都督府	节度使

续表

时 期	年 代	名 称	长 官
中 期	治营州(今河北省昌黎县)控室韦	平卢都督府 节度使	节度使
后 期	乾元二年 (759年)	燕京	
	广德元年 (765年)	幽州卢龙都督府	节度使

墓志中有:《唐幽州大都督府兵曹参军陈(立行)君墓志》、《故幽州卢龙节度都押衙周(元长)府君墓志》等。

(2)幽州所辖下的地方官吏:幽州在唐代所辖地区变化很大,多时所辖地区包括了今北京、河北、辽宁、内蒙、天津等地,少时仅有北京、河北二地,如广德元年范阳节度使改幽州卢龙节度使时领有幽、蓟、易、定、沧州。但不管如何变化,今北京一直是在幽州的管辖之下。本文中所述唐志中幽州辖下的地方官吏也只限于今北京范围,如《大唐昌平尉李(相)墓志铭》、《唐故妫州刺史充清夷军营田等使刘(钤)墓志铭》。以及唐代在北京境内设立的军号、折冲府、归义州等机构的官员,如《唐幽州节度押衙摄纳降军营田使侯(元知)府君墓志铭》、《唐故归义都督府李(诗)府君墓志铭》。

(3)京官及外地官员:北京出土的唐志中有一部分是死于任上的京官和外地官员,他们或葬于幽州,或迁葬幽州及与夫人合葬幽州,如已见外地官吏的唐志有:1.《唐薛府君墓志》,薛府君为信州(今江西省上饶市)刺史。2.《唐李公墓志》,李永定为青山州(羈縻州)刺史,青山州在今河北省涿州小门村,李永定“以乾元二年十二月二日寝疾于怀之官舍”。3.《唐姚府君墓志》,姚子昂为棣州(今山东省惠民东南)刺史,“宝应二年十月十八日因使遘疾官舍”。4.《唐王府君墓志》,王郢为瀛州(今河北省河间市)司马。5.《唐刘公墓志》,刘公为涿州(今河北省涿州市)司马。6.《唐王府君墓志》,王恭为汾州司马,汾州在河东道(今山西省汾阳)。7.《唐张府君墓志》,张道升为陇州(今陕西省陇县)刺史。8.《唐朱府君墓志》,朱府君为涿州刺史。9.《唐高府

君墓志》,高行晖为怀州(今河南省沁阳县)别驾。10.《唐朱府君墓志》,朱绅为瀛州司仓参军。11.《唐周府君墓志》,周屿为平州(今河北省卢龙县)刺史,卒于洛阳后迁葬幽州的京官,见《云麾将军李神德墓志》。

(4)平民:北京出土了不少平民的墓葬,墓中通常也有墓志,如《唐故西河任(紫宸)府君墓志》、《唐故高(元表)君墓志》、《大唐开元观道士王(徽)公墓志》等。

(5)妇女:唐志中常见“××夫人墓志”或夫妇合葬墓志,如《故汝南郡夫人周氏墓志》、《唐故黎阳桑氏夫人墓志》、《唐故瀛州司马隆邑安平范阳三县令幽州节度押衙兼侍御史太原王(郅)公夫人博陵崔氏合附墓志铭》等。

2. 唐志中的北京少数民族

唐代北京是一个开放性的城市,面对的是北方的突厥、回纥,东北的奚、契丹、靺鞨、室韦各族,历史上发生的战争、交往、融合事例很多。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被唐军打败后,大量降众被安置在幽州境内定居,随之粟末、靺鞨也迁入燕州(今北京怀柔、顺义),新罗人迁入良乡广阳城,唐置归义州统之,开元四年(716年)契丹弹汗部迁入幽州东北置归顺州(今北京顺义),开元二十年(732年)奚人李诗、琐高等以其部落五千帐来降,安置在良乡县广阳城。

安史之乱前,唐政府为了安置日益增多的人居的少数民族,在幽州境内设置了供少数民族定居的羈縻州,共有19个,其中在今北京境内就有14个。安史之乱后,继文、武、宣宗三朝以降,除回纥人迁入外,其他民族迁入的已大为减少了。但目前已出土的墓志中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墓主却很

少,仅见史思明玉册、《李(诗)府君墓志》、《论(博言)墓志》三例。

史思明(?—761)是有复杂血统的胡人,他与安禄山是营州同里。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甲子,史思明从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于范阳起兵叛唐,史称“安史之乱”。天宝十五年(756年)史思明会四路叛军围攻太原,为李光弼所败,退守范阳,安庆绪以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后安庆绪暗图加害史思明,史思明降唐,后任河北节度使,封归义王。然因李光弼欲剿其军,史思明复叛,乾元元年(758年)史思明大败郭子仪等九节度使,杀安庆绪。乾元二年(759年)他在燕京(今北京)称帝,号“大燕皇帝”,上元二年(761年)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在陕西柳泉,以毡毯裹尸运回幽州埋葬。1966年文物部门在丰台区林家坟发现一座唐墓,墓中出土了部分玉册残片,玉册上的文字有“而早昏风悲隧路月冷山门”、“李之交淬同蚌鹬之相倾击”、“屋而不还垂白云而永逝鸣”、“艰难悠济悲毅林之超”、“血未干唐有异端俛人罔极”、“昭武皇帝崩于洛阳宫玉芝”、“帝朝义孝乃因心亲惟□□”等句。从玉册文字考证,玉册似以史朝义口吻为史思明所撰,故此墓可能是史思明之墓。

李诗(?—736),为奚人,1993年在房山县医院发现了《李(诗)府君墓志铭》志盖,同时出土的是《唐故归义王李府君夫人故贝国太夫人清河张氏墓志铭》,奚为匈奴别种,居于鲜卑之故地,通天中契丹叛,奚随之。开元二十年(732年)信安王李祎奉诏讨奚,大酋长“李诗、琐高等以其部落五千帐来降”^④,诏封李诗为归义王兼特进左羽林大将军同正,李诗率部降后,朝廷赐物十万段(段),移其部落于幽州良乡县安置,设归义州。

《论(博言)公墓志》是1995年在石景山区老古城出土的,志主论博言为吐蕃松赞干布时大相禄东赞之后,武周圣历元年(698年)弃都松赞赞普在逻些(今西藏拉萨)诛灭其家族,其子钦陵在青海宗喀自刎,赞婆

及钦陵子弓仁率部归唐。进入中原的禄东赞这一支后裔在唐朝世代为官,祖惟贞为左领军卫大将军,父修为宁州刺史,论博言任卢龙节度使押衙,升幽州节度押衙兼侍御史加检校国子祭酒,咸通初曾领军征交趾。

这些少数民族墓主人的墓志出土,揭示了唐代幽州居民成分的复杂多样,也表明了唐代幽州历史的动荡,以少数民族身份来到幽州的人经历不同,充分显示出幽州在唐代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开放性大城市。

3. 志盖图案丰富多彩

北京唐志的志盖多为盖顶式,四斜面在不同时代所雕图案不同,早期的为素面,如《仟(钦)君墓志》志盖为素面,四面凿出方向不同的槽线。中后期志盖大部分是四斜面刻十二生肖图案为主,细分可有三个时期:早期的刻“十二生肖形象”,如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的《李神德基志》,志盖刻十二生肖兽;其后出现了十二兽首文臣身的图案,如《大唐天宝十三载故开元观道士王(徽)公墓志》,志盖上兽首人身的文臣都是身着朝服,足登乌靴,手持笏板的形象,惟《李永定墓志》志盖上刻十二人臣中仅虎、兔、龙、蛇、马、羊者为手持笏板,是个例外;再后又出现了志盖刻十二文臣手捧十二兽的图案,如《王叔原墓志》、《张建章墓志》。后两者的图案交互使用存在的时间较长。

唐志的装饰繁褥华丽,往往在志盖四斜的每面交角处刻各种花卉,如番莲、牡丹等,志盖、志石的四侧刻各种忍冬、蔓草纹,少数的还刻有动物的图案,如《归义王李府君夫人清河张氏墓志铭》志石侧面壶门内刻“双犀对峙”图。

唐代墓志的书法最大的特点是楷书书体“已臻极致”,唐早期书法以虞、欧、褚、薛四大家风格已成为人们习字的典范,书体或“华腴丰美”,或“朗健峻迈”。这些出土的唐志刻制中大多都打出界格,刻工精细,文字笔力刚劲有力,整齐隽美。

4. 北京唐志撰志人

墓志撰志人通常是墓志的重要内容之一,唐代已经出现了名人撰写志文的墓志。从目前已出土的北京唐志来看,部分唐志志文中题有撰志人的官职、名讳,但这些撰志人的身份大多不高,也不是名人。1.《唐故彭城夫人刘氏墓志铭》:唐故平州刺史卢龙节度留后,乡贡进士贾暄撰文。2.《周(屿)府君墓志铭》:孙子前幽州节度衙前兵马使中散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在中小名薊郎号绝撰上并书。3.《唐王(叔原)府君墓志铭》:从弟乡赋进士知微撰。4.《大唐范阳卢公故夫人天水郡赵氏墓志铭》:前飞狐铸钱院巡覆官儒林郎试太常寺奉礼郎张铃撰。5.《唐李府君夫人故贝国太夫人清河张氏墓志铭》:朝请郎行深州录事参军薛晕撰。6.《大唐瀛州司马王(郅)府君墓志铭》县令李再撰。7.《张建章墓志》:从兄幽州节度掌书记中散大夫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间侍御史赐绯鱼袋(张)珪撰。8.《论博言墓志》:幽州卢龙节度押奚契丹两蕃副使正议大夫检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张建章撰,志文末刻:节度要籍兼摄涿州范阳县丞赏绯于金则书并篆盖。

以上所列中仅《论博言墓志》的撰志人张建章是唐代一位相当著名的文人,张建章事迹散见于(北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三:“尤好经史,聚书至万卷”。大和六年(832年)张建章受幽州都督府派遣,以假瀛州(今河北省河间市)司马,代表幽州回聘渤海国国王大彝震,自大和七年(833年)“癸丑秋,方舟而东,海涛万里,明年秋杪达忽汗州暨上京龙泉庄(今黑龙江宁安县渤海镇),岁换而返”,张建章在渤海国逗留达一年,就其在渤海国所见所闻,著有《渤海记》一书,该书今已佚,仅见《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郑樵《通志二十略·艺文四》存目,是一部宝贵的地方史籍。其他撰志人还有:《常(俊)府君墓志》康济撰、《刘(建)公并夫人杨氏合附墓志》郭洪撰、《张(道升)府君墓志》李伯良撰、《朱府君墓

志》李鸿撰、《高行晖墓志》郑宗经纂、《任(紫宸)府君墓志》存诚撰、《崔(载)府君墓志》成表徽撰、《周(元长)府君墓志》李掖撰、《南阳郡张氏墓志》郭少达撰、《陈(立行)君墓志》李俭撰、《耿(宗倚)府君墓志》卢希逸撰、《侯(元知)府君墓志》路愈述、《王(公晟)府君夫人张氏合附墓志》许舟撰、《敬(延祚)府君墓志》张宾撰、《曹府君夫人张氏合附墓志》崔建撰……。

5. 志主的官职

从目前已出土的北京唐志来看,志主中除史思明外,大多数是中下级的文职、武职官员,如1976年在西城区二龙路出土的《仟(钦)君墓志》,志主为开福府旅师,旅师乃地方掌征收粟税的官员;王景秀是恒王府参军,(见《王(景秀)府君墓志》,恒王瑱为唐玄宗第二子^{⑤⑥},典军是唐代时在亲王府设立的官名,秩正五品上;王郅是瀛州司马,(见《王府君墓志》),司马在唐代是位于刺史之下的属官,后成为虚设;朱绅为瀛州司仓参军,(见《朱府君墓志》),唐代在各府置“仓曹参军”,在各州置“司仓参军”,掌仓廩庖厨、财物、廛市之事。武职官员在北京唐志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董庆长是卢龙节度衙前兵马使,(见《董府君墓志》),衙前兵马使为唐代藩镇自置的军队武职;周元长为幽州卢龙节度都押衙,(见《周府君墓志》),都押衙为高级武职,可参与军事机密,并指挥一线军队。

奚、契丹两蕃使是在幽州都督府特设的主管两蕃军务机构,于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设,最早可见“(开元)捌载貳月令充两蕃使薛泰下总管”^⑦,副职为奚、契丹两蕃副使。唐代设立这个机构是因为在万岁通天时契丹叛后,奚众管属突厥,两国常遂为表里,号曰“两蕃。”^⑧朝廷于幽州卢龙节度使后加“押”表临制。张建章在“咸通五年(864年)四月奏升押奚、契丹两蕃副使。”^⑨幽州节度使奚、契丹两蕃事务机构的设立,说明了唐代边境的局势变化和唐政府对东北边境的重视。

6. 军号及折冲府

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在地方始设节度使,玄宗开元中在全国已设了碛西、河西、朔方、幽州等八节度使,天宝元年(742年)又增设为十节度使,“曰安西、北庭、河西以备西边,曰朔方、河东、范阳(幽州)以备北边、平卢以备东边也……”^①。节度使的设置主要是为“备边”、“御戎”。范阳节度使统兵为91400人,分为9军,分驻幽州各地,在今北京境内驻有经略军,驻幽州城内,管兵3万,威武军驻檀州城(今北京密云),管兵1万,清夷军驻妫州(今北京延庆),管兵1万^②。由出土的唐志可知:刘钤为清夷军营田等使^③,清夷军是垂拱二年(686年)由妫州刺史郑崇古奏置,经略军是延载元年(694年)置^④,威武军是大足元年(701年)置,开元十九年(731年)改称威武军。其他唐志志主所在各军不在今北京境内,“雄武军,开元十八年(730年)析幽州置……又有雄武军,故广汉川也。”^⑤“禄山阴有逆谋,天宝六载(747年)于范阳北筑雄武城(今天津蓟县东北)”^⑥,有黄直为雄武军捉生将^⑦,耿宗倚为雄武军营田等使^⑧。静塞军,原称渔阳军,在幽州北卢龙古塞,开元十九年九月十七日改为静塞军,陆日岷为静塞军营田等使^⑨,其他另见侯元知为纳降军营田等使^⑩,敬延祚为镇安军使^⑪,李永定“俄兼知静塞军使”^⑫,军使为唐代都督府下设“军”的长官。

折冲府。唐沿隋的府兵制度,职责为镇戍地方和配合中央军队出征,兵府在隋时称鹰扬府,“贞观十年(636年)始名折冲府”^⑬。唐代在幽州地区共设有14个折冲府,“幽府十四,曰昌平、涿城、德闻、潞城、乐上、清化、洪源、良乡、开福、政和、停驂、柘河、良社、咸宁。”^⑭北京出土唐志中可见件钦为开福府旅师^⑮,孙如玉为平州卢龙府折冲府都尉^⑯,李神德“拜易州长乐府折冲

都尉——仲清朝易州长乐府右果毅都尉”^⑰,长乐府属易州^⑱。1955年7月在阜城门外二里沟出土的《王叔原墓志》和在大兴出土的大历十一年(776年)《王景秀及妻魏氏墓志》都提到了“恒王府”。罗振玉《唐折冲府考补》中认为恒王府乃折冲府名,其实非也,恒王当为玄宗子李瑱,李瑱于开元二十三年封为恒王,恒王府在关内道。

①(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建置”

②(唐)李商隐《为荥阳公贺幽州破奚寇》

③(清)朱彝尊《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七,北京古籍出版社

④《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九下“北狄列传”

⑤恒王瑱,玄宗第二十子也,初名,开元二十二年七月封为恒王,《旧唐书·玄宗诸子传》

⑥恒王瑱,性好道,常服道衣,天宝末,从驾幸蜀,不复衣道衣矣,《唐会要》卷五

⑦《李(永定)公墓志》,藏首都博物馆

⑧《旧唐书》“北狄列传·奚国”

⑨《张建章墓志》,藏首都博物馆

⑩《唐语林》卷八“十节度”

⑪《旧唐书·地理志》

⑫《刘(钤)公墓志》

⑬《唐会要》卷七十八

⑭《新唐书·地理志三》妫川、妫川郡上

⑮《旧唐书·安禄山传》

⑯《黄(直)公墓志》

⑰《耿(宗倚)墓志》

⑱《唐陆(日岷)府君夫人王氏墓志》

⑲《侯(元知)府君墓志》

⑳《敬(延祚)府君墓志》

㉑《李(永定)公墓志》

㉒《唐会要》

㉓《唐会要》

㉔《件(钦)君墓志》

㉕《孙(如玉)公墓志》

㉖《李(神德)府君墓志》

㉗《新唐书·地理志》:县六,有府九,曰遂城、安文、修(政)武、德行、新安、龙(石)亭、武遂、长乐

(作者为北京市石景山区文管所干部)

唐幽州诸坊考^①

鲁晓帆

北京地区,有着五十多万年的发展史,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这一切无不是北京的骄傲。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中,战国、汉魏时的蓟城,隋唐时的幽州城,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作为唐代北方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重镇的幽州城,更成为辽南京城、金中都城发展的前奏。

唐代的城市行政基层单位是城内分坊(里),郊区分乡和村(里)。唐代的都城长安、东都洛阳,城中都设有若干坊,而北方重镇的幽州城仿照两都城,也在城中置立若干坊。坊的格局是田字形,中间的十字街把坊分为四部分,每部分又被十字巷分为四小部分,即把每坊分成十六小区。坊四周有围墙、四周各开一个坊门,门上有坊名,并由专人管理,每天五更开坊门,黄昏关闭,坊内有大路一、二条,路旁有巷,巷内为住房。而坊与坊之间,则通过大十字街道相连接。唐幽州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②,城周三十二里(合今约 23 华里)。城内坊的具体数目没有直接记载。但据宋人路振的《乘轺录》记载:燕京“城内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鬲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名。”由此推测,唐代的幽州城也应有二十六坊。宋人路振曾于辽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到过辽南京,他在书中所著录的南京城的坊名,都是亲闻目睹,当然是可信的。然而,路振只是记录了唐时幽州城三个旧坊名,其它各坊名却没有记录下来,这为我们

今天研究唐幽州城中的坊(里),带来了许多缺憾。但辽南京是在唐幽州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址并没有多少变化,只是在城中增加了一些宫殿建筑,所以坊的数目理应有太多的变化。

尽管幽州城的坊数、坊名不详,但 1949 年以来,特别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北京地区出土的近百方唐、辽代墓志遗文中,却记录下许多唐幽州、辽南京城坊(里)的名称。结合前人留下的有关书籍记录,为我们今日考稽唐幽州城坊(里)名称,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实物资料。现就现有收集到的各种记载,考证如下:

1. 鬲宾坊

迄今北京地区出土的唐、辽代墓志中还没有出现过“鬲宾坊”名。鬲宾坊的得名,与唐代的西北方的鬲宾国有关。鬲宾国曾在唐初来“朝贡”,唐高宗置修鲜都督府,并委任鬲宾国王为修鲜都督。宋人路振来到燕京城,辽南京(燕京)城中的坊名保留一部分唐时旧名,记录还是十分准确的。辽南京城是在幽州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金代把辽南京城的东、西、南三面向外进行了扩展,形成了有六十二个坊的中都城,金代的中都城坊名就有“鬲宾坊”。“鬲”与“蓟”音同而字不同,这或许就是金中都沿袭唐幽州城旧坊名矣。

2. 肃慎坊(里)

阜成门外迤南铁旗杆庙附近出土的《幽州大都督府录事参军蓟州刺史陆日岷妻王氏墓志铭》云:陆日岷妻王氏“以元和九年(814年)四月二十六日遭疾,终于肃慎坊私第,享年四十八。”^③

据《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二八载:《幽州大都督府兵曹参军陈(立行)君墓志铭》云:陈立行大中十一年(857年)“夏四月甲戌,陈君浸於府城之肃慎里”。^④府城即幽州城。《旧唐书·地理志》:“幽都县管郭下西界,与蓟分理,建中二年取罗城内废燕州廨署置幽都县,在府北一里。”^⑤幽州城有子城、外城,罗城当指外城,而府城则指(大)总管府、(大)都督府所在地幽州城。

3. 卢龙坊

1956年,在永定门外安乐林村大公报宿舍工地出土的《唐故棣州司马姚府君墓志铭》云:姚子昂夫人康氏“建中元年(780年)十月廿八日,终于卢龙坊,春秋七十七。”^④

1958年,西郊温泉白家疃出土的《唐故陇西郡要氏夫人墓志铭》云:要氏夫人“以中和四年(884年)五月六日,殁于卢龙坊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五。”^⑤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在琉璃厂出土的《辽李内贞墓志》云:“……保宁十年(978年)六月一日,薨于卢龙坊私第。”^⑥

据以上唐、辽墓志所记载唐幽州城、辽燕京城的卢龙坊、肃慎坊(里),可知路振所记辽燕京坊名,并唐时旧名,可信有证。在金中都城坊中就有南、北卢龙坊,即是沿袭唐、辽之旧坊名。

4. 花严坊

1970年10月,出土于广安门外马连道中街商场门前的《故汝南郡夫人周氏墓记》云:夫人周氏“以元和三年(808年)七月五

日,终于花严坊私第,享年五十有一。以其月廿三日窆於幽都县太平乡之西原。”^⑦证实幽州城内有花严坊,但未记县属。

在北京《房山石经题记汇编》(《无能胜幡庄严陀罗尼经》)中记载:“施生燕京市内院了遵京北花严寺惠澄,共化到钱续造此经。”说明辽燕京城内,有花严寺并在城北,这或许就是唐幽州花严坊遗留下的旧寺。是寺以坊得名或坊以寺命名,还有待新数据的出现加以解决。

5. 辽西坊

1975年9月,阜成门外甘家口出土的《唐姚季仙墓志》云:“……以咸通四年(863年)三月廿二日,卒于辽西坊私第。”^⑧

1987年,丰台区西罗园小区出土的《唐故卢龙节度衙前兵马使兼知船坊事银青光禄大夫捡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上柱国陇西董府君墓志铭》云:董庆长“以大中十二年(859年)十二月五日,启手足于辽西坊之私第,终于位,享龄五十五。”^⑨

辽西坊之得名,或与辽西县有关。辽西县是幽都县的前身,幽州旧治蓟县,仅一县地,自唐武德六年(623年)迁燕州(今内蒙古土默特右翼西)寄理于幽州城内,增设辽西县,管郭下西界,与蓟分理。唐建中二年(781年)朱滔废燕州,改辽西县为幽都县。辽西坊可为研究北京地理变迁作一佐证。

6. 铜马坊

罗振玉《京畿冢墓遗文(下)》载《唐故中山郡郎氏夫人墓志铭》云:“夫人享年七十有三,大中元年(847年)十一月而遭疾焉,十二月十日,终于铜马坊之私第”。

幽州城内的铜马坊得名,似以鲜卑人建立的前燕有关。鲜卑人慕容皝建立的前燕,在公元350年时,慕容皝之子慕容儁攻占了蓟城,并把蓟城作为前燕的都城,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年时间,但也给幽州城留下了坊名的参照物。北魏的酈道元在他的《水经注·

《水经》中云：蓟城宫城“东掖门下，昔慕容儼立铜马像处。昔慕容皝有骏马赭白，有奇逸力。至僊光寿元年，齿十四年矣，面骏逸不亏。儼奇之，比鲍氏骢，命铸铜以图其像。亲为名赞。镌颂其奇，像成而马死焉。”即前燕的慕容儼建都蓟城并称帝。曾在宫城东掖门下，为其父的坐骑“赭白”立铜像。像是立成了，马却死了。而宫城东掖门也被后人称为铜马门，这又派生了唐幽州的铜马坊。《元一统志》：“铜马门在旧城东南隅，昔慕容儼铸铜马置之东掖门，后人因名铜马门为坊。”据此可知，中都的铜马坊即在城的东南部，它与唐、辽承继的关系肯定是存在的，铜马坊名经辽一直延续到金中都城，铜马坊属幽州东部蓟县无疑。而宫城东掖门应指幽州城内的罗城之门，即今西砖胡同南口之处。

7. 蓟北坊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西安门内出土的《唐濮阳卞氏墓志》云：“贞元十五年（799年），岁次己卯，七月癸卯，朔一日癸卯，夫人春秋卅七寝疾，卒于幽州蓟县蓟北坊。”^⑩

北京房山的云居寺，在隋唐时为北方最有名的佛教巨刹。到了每年的四月初八的释迦牟尼佛诞日即浴佛节，幽州地区的善男信女，刻石献经成了风气，而在所刻石经旁多留有刻经题记。题记即记载了刻石经过，有些又记载了幽州的坊名，这对今天确定幽州城坊名，提供了又一重要依据。

在房山云居寺所藏《大般若波罗密石经》题记载：“大唐幽州蓟县界蓟北坊檀州街西店弟子刘师弘、何惟颇、侯存纳、贾师克等造大般若石经两条……卷四百七十一。”由此可知，蓟北坊紧挨蓟县界，并有檀州街及街中商铺西店。

8. 燕都坊

1951年，在东单御河桥出土的《唐故梨园桑氏夫人墓志铭》云：桑氏夫人“泊乎以元

和八年（813年）冬十月廿九日，考终命於燕都坊里之私第也，享年六十有八。”^⑪而同一地点出土，五年前卒于“以元和三年四月八日，幽州蓟县南私弟倾背，享年七十有六。”^⑫的丈夫任紫宸也应死于相同私第。任志只记县属，桑志只记坊属，但恰好记录了蓟县有燕都坊，并在蓟县的南部，这为确定燕都坊位，提供了重要依据。

1976年，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今北海中学教学楼前）出土的《唐故前蓟州刺史幽州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侍御史上柱国宋府君夫人蔡氏合祔墓志铭》云：宋再初“以大中十二年（858年）十一月十八日，归全於蓟县界燕都坊之私第，休明之代八十有二。”^⑬

《唐故宋再初夫人蔡氏墓志铭》云：宋再初夫人蔡氏“以会昌六年（846年）十月卅日，属纻於幽州蓟县燕都坊之私第也。”^⑭

《唐故妫州刺史充清夷军营田等使朝散大夫检校尚书司封郎中摄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彭城刘公墓志铭》云：刘钐“文德元年（888年）春三月甲子，以疾辞印绶。夏四月戊辰，捐馆舍於幽州蓟县燕都坊之私第，春秋之齿五十有二。”^⑮

1985年5月，丰台区槐房乡六必居酱园基建工地出土的《唐故幽州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太原王（时邕）公墓志铭》云：“公享年卅有七，会昌五年（845年）十一月遭之疾矣，医卜无验，乙丑岁，月次大吕，廿有四日，终於燕都坊之私第。”^⑯

现藏于海淀区文物管理所的（1949年后海淀区出土的）《唐故幽州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上柱国天水郡赵公（从一）墓志铭》：“享年七十有七，咸通九年（868年）八月廿日，终於蓟县界燕都坊私第。”^⑰而宋再初及赵从一都终于蓟县界燕都坊，这为幽州城内坊巷分布提供依据。结合桑氏夫人与其夫任紫宸两墓志的内容，燕都坊应在城东部西南靠近幽都县与蓟县界，即今北京宣武区南线阁一带。

燕都坊名在北京已出土的唐代墓志中，

出现的次数最多。由此观之,燕都坊为幽州城中的重要坊里,许多官员都在此居住。而燕都坊之得名,或与战国以来燕都于蓟有关。《新唐书·地理志二》:“蓟,古之燕国都,汉为蓟县。”

9. 军都坊

西直门外出土的《唐故幽州随使节度押衙正义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侍御史上柱国太原王府君(晟)夫人清河张氏合祔墓志铭》云:“以咸通十一年(870年)庚寅岁夏六月二日,属纆于蓟县军都坊之私第。”^⑩证实军都坊处于幽州城的东部蓟县,而军都坊之得名似与幽州城北的军都县有关。

在北京《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题记中载:“燕京北军都坊住人,故秦晋国王府前行、摄涿州录事参军王寿等,合家施财,镌刻经字。……重熙九年(1040年)四月十一日记。”证明军都坊在幽州城北,并证实辽南京还是在沿袭唐幽州旧坊名。而在金中都六十二坊名中,已不见军都坊名的出现。

10. 开阳坊

1985年,在丰台区蒲黄榆(今方庄小区焦家花园)出土的《唐故彭城夫人刘氏墓记》云:周玘妻刘氏夫人于“大和七年(833年)二月遘疾,三月上巳日,终于蓟县开阳坊之私第。”^⑪

北京《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佛说八部名经)中记载:“会昌元年四月八日,幽州蓟县西角开阳坊邑主僧克存邑人等同献……”。“蓟县西角开阳坊”,这为确定开阳坊在幽州城蓟县具体坊位提供重要依据。即开阳坊处于蓟县治所西角,离蓟县治所很近。而蓟县治所处于幽州城东南,开阳坊的具体方位,应是治所的西北。结合辽南京的南城墙东门开阳门,可以断定开阳坊在蓟县治所西北,南到幽州南城墙东城门。即今北京宣武区南樱桃园一带。

开阳坊名也曾在金中都中出现。《元一统志》记载:“燕京金故宫东南有坊曰开阳坊,街之北有阍曰明远。”这里记载开阳坊与金故宫的相对位置,为确立金开阳坊方位提供了重要依据。房山石经题记与《元一统志》记载有异,这是由于金中都有东、西开阳坊的缘故。这又是金沿唐、辽旧坊名的实例。

11. 招圣里(坊)

清朱士端《宝禄堂收藏金石记》著录的《唐故太子洗马博陵崔府君墓志铭》中云:崔载“以元和十四年(819年)五月廿三日遘疾,终于幽州蓟县招圣里之私第也。”以“招圣”名坊,这里似乎与战国时燕昭王设黄金台,从而招揽天下贤士的故事有关。

12. 归仁里(坊)

1976年12月,在西四羊肉胡同西口出土的唐贞元庚午六年(790年)《幽州故右厢节度衙前讨击付使任希墓志》云:任希贞元己巳五年(789年)“岁十二月二十日,奄化于蓟县归仁里之私第。”^⑫证实幽州城东部蓟县有归仁里(坊)。

13. 通闾坊

1981年10月,海淀区万寿路出土的《唐故幽州节度衙前讨击副使太中大夫试殿中监温(令绶)府君合祔墓志》云:温令绶“以咸通十五年(874年)二月廿二日,歿于幽都县通闾坊之私第也,享年六十有九。”^⑬证实幽州城幽都县有通闾坊,位于幽州城的西部。

14. 东通闾里(坊)

1949年,石景山庞村出土《唐故幽州节度押衙摄檀州刺史充威武军营田团练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南阳乐公墓志》云:乐邦穗于“乾符四年

(877年)夏五月廿二日,在疾奄然就木於蓟县界东通闾里之私第,寿止五十有一。”^②

这方墓志的内容说明,幽州城内的蓟县东通闾里(坊),紧靠幽都县与蓟县界线,两县界线在东通闾里(坊)的西边。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幽都县的通闾坊,两坊应是邻坊关系。这就为幽州城内坊巷分布提供了一定依据。

15. 劝利坊

罗振玉《京畿冢墓遗文(下)》载《大唐幽州节度随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太原王公夫人清河张氏墓志》云:张氏“以咸通四年(863年)正月廿日寝疾,至五月廿四日,终于幽州幽都县界劝利坊私第,享年六十有一。”证实幽州城西部幽都县有劝利坊。

16. 时和里(坊)

《南阳郡张氏夫人墓志铭》:张氏夫人“大中二年(848年)戊辰岁五月三日,谢於幽都县界时和里之私第,时春秋六十有二。”^③

2000年出土于北京丰台区丰台路口南侧的《大契丹国故朝议郎尚书水部郎中守幽州府蓟北县令赐绯鱼袋陇西李公(继成)扶风县太君马氏墓志铭》云:李继成于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正月六日“寝疾薨于燕京西时和坊之私第,享年三十有四。”^④即辽燕京沿袭唐时和坊。

时和坊(里)名在金中都城中也有出现。《元一统志》云:“归义寺,在旧城时和坊内,有大唐再修归义寺碑,幽州节度掌书记荣禄大夫检校太子洗马兼侍御史上柱国张再撰。略曰:归义金刹,肇自天宝岁。迫以安氏乱常,金陵史氏归顺,特诏封归义郡王,兼总幽燕节制,始置此寺,诏以归义为额。大中十年丙子九月立石”。据考证归义废寺在今广安门大街北,当时在金中都之时和坊内,坊系沿唐、辽时旧坊名。这为确定唐幽州时和

里(坊)方位提供了重要依据。实时和坊内有归义寺,并在今广安门一带。

17. 遵化坊(里)

1985年丰台区蒲黄榆(今方庄小区焦家花园)出土的《唐故平州刺史卢龙节度留后周府君墓志铭》云:周珂“大中十年(856年)五月廿九日,奄锤殃罚于幽都县遵化坊之私第,享龄七十。”^⑤

1972年4月,在房山县崇各庄公社焦庄大队出土的《唐焦西鸾夫人郑氏墓志铭》云:夫人郑氏“以贞元二年(786年)三月乙巳,终于幽都县遵化里之私第,春秋廿有六。”^⑥

现藏北京海淀区文物管理所的(1949年后海淀区出土)《唐故太夫人吴氏墓志铭》:太夫人吴金“以贞元四祀(788年)四月十日,终于幽都县遵化里之私第,时春秋七十有三。”^⑦

现藏北京海淀区文物管理所的(1949年后海淀区出土)《唐故幽州节度两番副使朝散郎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绯鱼袋平原华府君墓志铭》:华封與于“越以会昌六年(846年)景寅十月二日,遭弃背于幽州幽都县遵化里第,享年五十九。”^⑧

遵化坊名也出现在后人记载中。据《元一统志》记载:“善化寺,在旧城。由唐僖宗中和三年九月内古记兴禅寺上坐僧文贞撰述唐幽州善化院故禅尼大德实行录,其略曰:大德以唐宣宗大中十二月春来燕,选名寺以憩,……侍中张公崇敬别卜禅居于遵化坊吉地,辟开梵宇,俨似莲宫,奏请赐额为善化”。可见,唐幽州城内确有遵化坊,而遵化坊内还有佛寺善化寺。

18. 平朔坊(里)

现藏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唐幽州口节度押衙纳降军营田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侯府君墓志铭》云:侯元知“以大和二年(828年)二月廿八日,属纆于幽都县平朔坊之私第,享年七

十有六。”^②

1965年,于朝阳区高碑店出土的《唐故正议大夫试怀州别驾赐紫金鱼袋赠户部尚书渤海高府君墓志铭》云:高行晖夫人汝南袁氏“以大历元年(766年)七月廿九日,终于幽州平朔里之私弟。”^③

1981年11月,丰台区樊家村郭公庄(今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南五百米)出土的《唐处士田公(处琼)故夫人北平阳氏墓志铭》:田处琼夫人阳氏于“皇永泰二祀(766年)秋七月一日,幽都处士渔阳田公曰处琼夫人□平阳氏,物故于蓟城平朔里之私弟,春秋七十有三,归真□也。”^④蓟城——战国经秦汉到晋魏时期对幽州城的称谓。这几方墓志证实了幽州城有平朔坊,并在城中西部的幽都县。

19. 归化里(坊)

1956年,在北京市西城区旃檀寺西街出土的唐《故幽州卢龙节度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使持节檀州诸军事檀州刺史兼殿中侍御史充威武军团练等使汝南周府君墓志铭》云:周元长“以开成二年(837年)十月廿日,终于幽都归化里之私弟。”^⑤

民国初年,在西直门外出土的《唐故居士河内常府君墓志铭》云:常俊“以大历十有四年(798年)三月廿四日,逝於辽西县归化里之私弟。享年五十有五。”^⑥

辽西县乃幽都县的前身,唐高祖武德六年(公元623年)迁燕州城内,增设辽西县,管郭下西界,与蓟分理。燕州自隋开皇中为容纳粟木靺鞨族“归化”而设,故幽州城内有归化里。在常俊死后二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朱滔废燕州,改辽西县为幽都县。燕州于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移至桃谷山。而幽州城内的归化里名未改,故开成三年(838年),周元长志称“终于幽都县归化里”。据此可为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变迁和民族关系史上的重要实物佐证。

20. 敬客坊

现藏北京丰台区文物管理所的(1949年后丰台区出土)《唐故衙前散将游击将军守立羽府中郎将和公墓志铭》:和元烈元和十一年(816年)“春秋纔有卅,寝疾终于蓟县敬客坊之私弟也。”^⑦

《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中载:“施主檀州街敬客坊樊刘氏续造此经为自身恶业。”证实敬客坊经唐、辽延续到金,并幽州城的檀州街经过敬客坊。根据金敬客坊位判断,敬客坊在幽州城的蓟县管辖范围内,具体位置相当于今广内大街和牛街十字路口东南一带。

21. 通肆坊

1984年11月,在海淀区甘家口外进出口大楼后出土的《唐茹弘庆墓志铭》云:茹弘庆“千符五年(878年)秋季月下旬五日,□□蓟县通肆坊私弟,享年五十二。”^⑧证实幽州城有通肆坊,并在城的东部蓟县内。

22. 蓟宁坊(里)

《有唐故处士纪公墓志铭》云:纪宽“天宝十二载(753年),正月五日,卒於范阳郡蓟宁坊之弟也。享年七十三。”^⑨据《旧唐书·地理志二》载:幽州“天宝元年,改范阳郡,属范阳……妫州……八郡。”治幽州城。即范阳郡就是幽州城,并设有蓟宁坊。

1985年丰台区永定门外(原四路通北京市邮局汽车修理厂)出土的《大唐故天水赵府君墓志铭》:赵悦于“以大历十二年(777年)二月十一日,终于蓟宁里之私弟,享年六十。”^⑩这里两方墓志都没有记载县属。

《元一统志》记载:金中都城有南蓟宁坊、北蓟宁坊,并表明坊在城中东部。这又是沿唐、辽旧坊名实例。只不过是因金中都城扩大而坊名增加的缘故,致使出现了南北两个蓟宁坊。参照金中都坊的定位,对唐

幽州城蓟宁坊定位,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即蓟宁坊在幽州蓟县。

23. 宁里(坊)

现藏北京丰台区文物管理所的(1949年后丰台区出土)《唐故幽州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韩府君墓志铭》云:韩宗穗“以干符六年(879年)五月遭疾,廿四日丑,终于幽州蓟县宁里之私第,享年五十。”^⑧ 上记有蓟宁里,这里只记蓟县宁里,结合幽州已知所有坊名基本都为三字说,是特例还是疑丢“蓟”字,或与蓟宁里是对应关系,这里还需要发现新材料加以证实。

24. 来远坊

1985年丰台区永定门外西罗园小区出土的《唐卢龙征马使游击将军守左武卫大将军赐紫金鱼袋曹朝宪故夫人太原陶氏墓志铭》云:曹朝宪陶氏夫人“春秋五十七,大和元年(827年)九月三日,终于幽都县来远坊私第。”^⑨ 金代来远坊是沿唐、辽时旧坊名。

25. 玉田坊

《唐故幽州节度衙前兵马使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济阴董府君夫人太原郡君王氏墓志铭》云:董庆长王氏夫人“以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廿五日,终于蓟县界玉田坊之私第,享四十七。”^⑩

玉田坊名也曾在金中都城中出现。《元一统志》记:“崇仁寺,在旧城玉田坊,至元九年沙门显辨立石”。证实金玉田坊系沿唐、辽旧坊名。《元一统志》又列中都玉田坊大致方位在中都城西南、西北二隅,与唐董庆长墓志记载:“终于蓟县界玉田坊”有异。《元一统志》记载的方位可能是由于金中都城址扩大的原因,出现县属的变化及坊位的增加。这里只能说玉田坊是在幽州城东部蓟县的西北,临两县界。

26. 析津坊

1995年11月,北京石景山老古城地区出土的《有唐幽州庐龙节度左都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摄檀州刺史充威武军使兼御史中丞上柱国晋昌论(博言)公墓志铭并序》云:论博言在“咸通乙酉(即咸通六年,公元865年)重五聘东垣迴喝疾于路,迄秋分永逝于蓟城南郭析津坊,寿六十一。”^⑪ 墓志虽没有记载县属,但明确记载坊在蓟城南郭,结合唐幽州子城在城的西南及辽南京析津府第所在位置,析津坊应属于幽州蓟县管辖,应与开阳坊相距不远或相邻。

综上所述,根据现有资料证实的唐幽州城的坊数已有二十六坊,从承继意义来讲,与宋人路振《乘轺录》所记载:辽南京(幽州)“城内凡二十六坊”数相同。但其坊位界线,由于时间的久远而早已被湮没。除少数坊位置根据墓志记载,及后人所记《元一统志》等,能大致推断出来外,大多数坊位已难以确定。但根据唐、辽墓志所记载,还可以确定大部分坊的县属,即能确定唐幽州城坊的总方位。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幽都县管郭下西界,与蓟分理。”根据本文所考的已有明确记载的墓志,故可知属于幽都县管辖的有:辽西坊、通闾坊、劝利坊、时和里(坊)、遵化坊、平朔坊、归化里(坊)、来远坊等,皆在幽州城西部;而属于蓟县管辖的有:蓟北坊、燕都坊、军都坊、铜马坊、开阳坊、归仁里(坊)、敬客坊、东通闾里(坊)、通肆坊、宁里(坊)、蓟宁坊、玉田坊、析津坊等,皆在幽州城东部。其中一些坊名一直到金中都还在沿袭使用,如:蓟(罽)宾、卢龙、铜马、蓟北、开阳、时和、敬客、蓟宁、玉田等,在金中都六十二个坊名中,都占有一席之地。根据这些坊在金中都城之中的东、西部位置的分布,又可以判断唐幽州的罽(蓟)宾坊属蓟县,卢龙坊属幽都县。

根据以上考证蓟北坊在今宣武区三庙前街和范家胡同一带;与它相邻的“檀州街敬客坊”也应相距不远,具体位置相当于今

北京宣武区广内大街和牛街十字路口东南一带。而时和坊在今宣武区善果寺一带;开阳坊在今北京宣武区南樱桃园一带;析津坊应与开阳坊相距不远或相邻;铜马坊在今宣武区西砖胡同南口之处;燕都坊应在今北京宣武区南线阁一带。

幽州的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市”里进行。城北是市肆之区,称为“幽州北市”,《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大顺二年(891年)六月乙酉,幽州市楼灾,延及数百步。”由于商业繁荣,一些店铺也在封闭的坊巷中出现。《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汇编》收集的《大般若波罗密石经》题记载:“大唐幽州蓟县界蓟北坊檀州街西店……”。说明幽州城中檀州街一带已设有商铺,并一直延续到辽代仍称为檀州街。又载“幽州蓟县界市东门外两店”,这表明当时的商铺已扩至到幽州市门外。而“市”内设立各类店铺种类繁多,仅在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中就记载了三十余个行业。这些行业分工很细,有米行、白米行、粳米行、屠行、肉行、染行、油行、布行、无熟行、果子行、淑笋行、炭行、生铁行、磨行、绢行、小绢行、大绢行、彩绢行、锦行、丝织行、幞头行、靴行、杂货行、新货行等,经营着食物、金属用具、日用品、纺织品、燃料品的交易,几乎囊括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丝织手工业相当发达,范阳绫就是幽州的名牌产品。此外这里还设立了“胡市”,大批的“胡商”在这里与各族民众平等交易。南方大量的稻米、茶叶、布帛也通过陆路、运河、海运源源不断地运到幽州,幽州城不愧为唐代北方的最为重要的商贸中心。

总之,唐幽州城坊中不仅居住着大量的居民,还有经略军数万,以及人数众多的达官显贵。唐太宗李世民东征高丽时就曾在这里驻足,并在城的东南修建了纪念阵亡将士的悯忠寺(今法源寺前身)。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等也在幽州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诗句。宝集寺、仙露寺、归义寺、悯忠寺、善化寺、智泉寺、天王寺、崇效寺、圣寿寺、天长观、大悲阁、石幢等寺观建筑,在各个坊之间星罗棋布。幽都县、蓟县等衙署;紫微殿、

听政楼、逍遥楼等宫殿门楼;遍布于坊巷中的民居;以及商品交易的街市;组成了唐朝北方著名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幽州城。

另外,在已经出土的辽代墓志,以及房山石经题记和《元一统志》等材料中,还出现一些辽燕京的坊名,如:隗台坊、永平坊、北罗坊、齐礼坊、显忠坊、棠阴坊、大田坊、归厚坊、军都坊、市骏坊、仙露坊、甘泉坊、水平坊、奉先坊、单罗坊等。由于这些辽代坊名的出现距唐已接近上百年,它们是不是唐代旧坊名遗存,还有待新的证据出现加以证实、补充。而这些辽坊名与沿续到金中部的其它唐、辽旧坊名:蓟(蓟)宾、卢龙、铜马、蓟北、开阳、时和、敬客、蓟宁、玉田等,又组成了辽燕京城二十六坊中的二十四坊。这对研究唐、辽、金城坊的延续与变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①家父鲁琪先生曾在二十多年前,于北京史第二届学术论文集上发表过一篇《唐幽州城坊考》的论文。二十多年过去了,北京地区又有许多新的历史遗存相继出现,原考证的一些观点已不准确。今在家父的指导下,重新对幽州城内的坊巷进行考证。文中所用材料都是文博界同仁辛勤工作的结果,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②《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志》载。金陵书局刊行光绪八年五月版。

③④⑤⑦⑧⑩⑪⑫⑬⑭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等墓志,现均收藏在首都博物馆。

⑥墓志原文见钱大昕《潜研堂文集》载《记琉璃厂李公墓志》。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以上墓志原文、出土地点、现收藏单位均见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与中国文物研究所编撰的《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卷》,文物出版社。

⑩墓志原文见《全唐文》卷995。

⑬墓志原文见《光绪顺天府志》卷128。

⑳墓志原文见《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燕山出版社。

㉑墓志原文见罗振玉《京畿冢墓遗文》下。

㉒墓志原文见陈康《北京文博》1999年第4期《从论博言墓志谈吐蕃噶尔氏家族的兴衰》一文。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馆员)

万寿寺明朝史事考略

胡桂梅

万寿寺坐落在西直门外7华里处,是京西著名古刹之一,现为北京艺术博物馆。万寿寺在诸多明清文献中均有记载,但这些文献所载史事有同有异,有的甚至彼此相互矛盾。鉴于上述情况,笔者对万寿寺的史事做了一番梳理和考证工作。限于篇幅,本文仅就万寿寺明朝相关史事考述如下,其清代史事笔者将别文另叙。

一、明代万寿寺的营建

营建时间。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城外》记万寿寺始建时间为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其工程“役不逾时,公私若无闻知”。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至五年之三月,今上又自建万寿寺于西直门外七里”,其营建工程仅“浹岁即成”,即在第二年也就是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完工,但未提及具体完工时间。对万寿寺营建和竣工时间记载的都比较具体的是明万历初年首辅大学士张居正所撰《敕建万寿寺碑文》。该文记,万寿寺“工始于万历五年三月,竣于明年六月”。^①

督工官员。《帝京景物略》记万寿寺营建之时,“物力有余,民已悦豫,太监冯保,奉命大作”。《万历野获编》亦记“司礼故大珰冯保领其事”。《江陵张文忠公全集》卷十二辑张居正所撰《敕建万寿寺碑文》记:“今上践祚之五年……命司礼监太监冯保等卜地于西直门外七里许,广源闸之西,特建梵刹。”可见冯保奉命督工建寺是不争史实。冯保,嘉靖时期曾任司礼监秉笔太监。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奉命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神宗即位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慈圣太后遇帝严,保侍太后势数挟持帝。帝甚畏之”。^②由于慈圣皇太后的信任,且冯保“善琴能书”,^③神宗对他“待之甚隆”,^④并曾“屡赐牙章,曰光明正大,曰尔惟盐梅,曰汝作舟楫,曰鱼水相逢,曰风云际会。”^⑤用这样的亲信内臣作为寺院督工,而不动用工部官员,说明神宗皇帝不仅对该项工程非常重视,而且意在体现此项工程“毋烦将作”,^⑥即不增加朝廷负担。

营建费用。《江陵张文忠公全集》卷十二辑张居正撰《敕建万寿寺碑文》记载：该寺的营建费用系“出帑储若干缗，潞王、公主暨诸宫御、中贵亦佐若干缗”。据此，则万寿寺的营建费用当来自宫廷内府和皇室成员、中贵的捐助两个方面。那么，明末清初人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十八《寺庙》所讲的，万寿寺营建时，“慈圣李太后出资巨万”，和《万历野获编》所记冯保在营建万寿寺时“先助万金”之事，虽可能采自传闻，但按《明史·孝定李太后传》记，神宗生母慈圣李太后“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帝亦施助无算。居正在日，尝以为言，未能用也”，且按张居正撰《敕建万寿寺碑文》所说，万寿寺虽是神宗下旨营建，但却是“祇奉慈命”，即在李太后授意下下令营建的，冯保则是李太后最信任和倚重的内臣，这样，李太后和冯保为营建万寿寺，分别助以万金，亦当是情理中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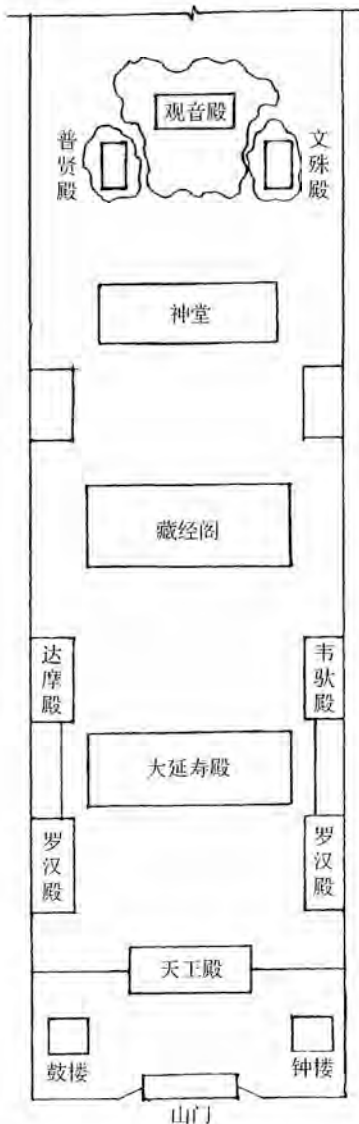
寺庙所在地。按《天府广记》卷三十八《寺庙》记载“万寿寺……大珰谷大用寺基”。但是，《万历野获编》中则记载用“正德间大珰谷大用地”所营建的寺庙是明神宗生母慈圣皇太后所建的慈寿寺。清于敏中等编纂的《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七《郊垌》引于慎行撰《敕建慈圣寺碑文》，记载慈寿寺的营建历史时也谈到慈寿寺所在地才是谷大用的“故地”：“圣母慈圣皇太后与皇上永怀穆考在天之灵，思创福地以荐冥祉。乃命内臣卜地于阜成门外八里，得太监谷大用故地一区。遂出宫中供奉金，潞王、公主、宫眷、内侍各捐汤沐，经始于万历四年二月，至六年仲秋既望落成。”由此可见，究竟是万寿寺，还是慈寿寺的寺址是谷大用的“故地”，文献记载并不一致。考之三书作者，《天府广记》作者孙承泽，世隶上林苑籍，为崇禎进士，官至刑科都给中。《万历野获编》作者沈德符，浙江嘉兴人，文学家，万历举人。二人虽均为明朝人，且沈德符还是万历时人，但孙承泽考中进士时，万寿寺已建成 50 多年了，沈德符也只是寺院建成后，偶尔去过该寺。二人均非寺庙营建的真正知情者。而于慎行

则不然，他是隆庆二年（公元 1568 年）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万历初年充任神宗皇帝的日讲官。他为人诚实，深受神宗信任。《明史·于慎行传》记载：“尝讲罢，帝出御府图画，令讲官分题，慎行不喜书。诗成，属人书之，具以实对。帝悦，尝大书‘责难陈善’四字赐之。词林传为盛事。”据此可知，万寿寺和慈寿寺营建时，于慎行为在京官员，其奉命为敕建寺庙撰写的碑文，自当严谨可信。由此可以推知，《天府广记》之说当系误记，作者是把万寿寺同慈寿寺记混了。

二、万寿寺建筑规制

明朝时万寿寺的建筑规制，据《帝京景物略》记载，“中大延寿殿，五楹；旁罗汉殿，各九楹；后藏经阁，高广如中殿；左右韦驮、达摩殿，各三楹，如中傍殿。方丈后，辇石出土为山，所取土处，为三池。山上，三大士殿各一。三池共一亭……。山后圃百亩。……寺之碑，大学士张居正奉诏撰。先是，文皇帝铸大铜钟，侈奔齐适，舒而远闻。内外书华严八十一卷，铄于间，书金刚般若三十二分，字则铸欵，点画波捺楚楚，如碾如刻，复如书楷，其笔法，必沈度、宋克也。向藏汉经厂，于是敕悬寺，日供六僧击之。……天启年中，钟不复击，置地上。”明蒋一葵《长安客话》记万寿寺“璇宫琼宇，极其闳丽。有亭山在佛阁后，可结趺坐。……寺有方钟楼，前临大道，楼仅容钟。钟铸自文皇，径长丈二。内外刻佛号弥陀法华诸品经，蒲牢刻楞严咒。铜质精好，字画整隼，相传为沈度笔。少师姚文荣公监造。”《钦定日下旧闻考》引孙国敕《燕都游览志》：“万寿寺……神宗朝敕建，丹楼紺宇，几与大内等。……方丈筑山上，有广榭，下峙小亭……。后有圃数顷。赐出万石大钟，乃太宗时制。昔悬于楼，迩年有讹言‘帝里白虎分不宜鸣钟’者，遂卧钟于地。”《江陵张文忠公全集》卷十二所辑张居正奉敕撰《敕建万寿寺碑文》记万寿寺的建筑为，“中为大延寿殿五楹，旁列罗汉殿各九楹。前为钟鼓楼、天王殿，后为

藏经阁,高广如殿。左右为韦驮、达摩殿各三楹,修檐交属,方丈庖湏具列。又后为石山,山之上为观音像,下为禅堂、文殊、普贤殿,山前为池三,后为亭池各一,最后为果园一顷,标以杂树,琪□璇果旁启,外环以护寺地四顷有奇。”《万历野获编》记万寿寺,“其正殿曰大延寿。阁曰宁安。重楼复榭。隐映蔽亏。视慈寿寺又加丽焉。其后垒石为三山。以奉西方三大士。盖象普陀、清凉、



图一 万寿寺明朝初建时的格局

峨眉。凡占地四顷有奇。……时,上从内府赐出永乐间所铸铜钟,内外范华严全部”。

以上是文献对万寿寺明代建筑的记载。综合观之,其中,比较一致且与现状对比基本符合史实的是:寺庙的中心建筑为大延寿殿,面阔五间。两旁有左右配殿,为罗汉殿,各面阔九间。前面设天王殿,天王殿前方左右为钟楼、鼓楼。正殿之后为阁,面阔亦五间。阁两旁分别为韦陀殿、达摩殿,各三间。再后隔开一座建筑还有人造石山,有三大士殿,观音殿居中,文殊、普贤殿在两侧。假山之下有池、亭等建筑。此外,寺庙内还有方丈的居住室、厨房、浴室和临街的钟楼等。假山之后为果园。(图一)

文献记载不相一致的有如下四点:

1. 大延寿殿后的阁名说法不一。《帝京景物略》及张居正碑文中都用的是“藏经阁”这个名字。《万历野获编》中则记:“阁曰宁安”。清代乾隆时《钦定日下旧闻考》也在引用《万历野获编》关于万寿寺记载的后面注云“臣等谨按:宁安阁今改为万寿阁”。《光绪顺天府志》中《京师志》第十六《寺观》“万寿寺”条亦记“殿后为万寿阁,即宁安阁”。考前述说法,《钦定日下旧闻考》和《光绪顺天府志》当是沿用《万历野获编》的说法。但从前述说法的作者情况看,《万历野获编》中关于“宁安阁”的说法当属误记。因为,万寿寺为敕建寺庙,张居正作为当时的首辅大学士,奉诏撰写万寿寺碑记,对万寿寺的情况应该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在碑文中连厨房、浴室都提到了,藏经阁作为主要建筑之一,如果真的叫宁安阁的话,他在碑文中是不会不记或记错的。《帝京景物略》的作者是明崇祯时的刘侗、于奕正。刘侗,字同人,号格庵,湖北麻城人,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顺天府举人,七年考中进士。于奕正初名继鲁,字司直,宛平(今北京)人,崇祯初年秀才,好游名山。二人考察万寿寺时虽距万寿寺建成已有几十年的时间,但治学严谨,“事有不典不经,侗不敢笔;辞有不达,奕正未尝辄许也。”^⑦该书在《略例》中说“成斯编也良苦,景一未详,裹粮宿春;事一未详,

发篋细括；语一未详，逢襟提问；字一未详，动色执争”。^⑧可见他们对万寿寺是经过实地考察而且态度是认真的，所以他们的记载也是较为可信的。而《万历野获编》的撰写情况就不同了。其作者沈德符，虽为明代文学家，且为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举人，自幼曾居住北京。但中年后又回到南方。这时才把早年从祖、父听来的朝章故事，加上自己的其他见闻，随录成篇，撰写该书。虽然作者确实来过万寿寺，但成书时却是凭借记忆来写，故难免有记忆模糊之处。例如，他将万寿寺的建筑记为“藻绘丹雘，视金陵三大刹不啻倍蓰。盖塔庙之极盛，几同洛阳伽蓝记所载矣。”显然，沈德符是将万寿寺和慈寿寺记混了，因为明朝时万寿寺并没有塔。有塔的应是慈寿寺。慈寿寺在阜成门外八里，《帝京景物略》记“万历丙子，慈圣皇太后为穆考荐冥祉，神宗祈胤嗣……建寺焉。寺成，赐名慈寿，敕大学士张居正撰碑。……有永安寿塔，塔十三级，崔巍云中。……中延寿殿，后宁安阁，阁扁慈圣手书。”万寿寺与慈寿寺有相似之处：均在京西，均与慈圣皇太后关系密切，修建年代相差仅一两年，均有张居正撰写的碑文，主殿的名称均带“延寿”二字。所以，沈德符极有可能把二者记混，导致误记。

2. 阁、山之间的建筑是禅堂还是方丈（室）的说法不一。《帝京景物略》记为“方丈（室）”，而张居正所撰碑文则为“禅堂”。这里笔者仍以为张居正的记载较为可信，因为张居正毕竟是当时人，且系奉诏撰文，不能有半点马虎。另外，从现状看，阁、山之间的建筑确是禅堂，而非方丈室。故《帝京景物略》的记载当属误记。

3. 假山上的建筑说法不一。《帝京景物略》记“山上，三大士殿各一”，《万历野获编》记“垒石为三山，以奉西方三大士，盖象普陀、清凉、峨眉”。张居正撰《敕建万寿寺碑文》则记“山之上为观音像，下为禅堂、文殊、普贤殿”。而孙国敕《燕都游览志》则记“方丈筑山上，有广榭”。笔者认为，前三者看似彼此不符，实则大体一致，只不过描述

方式略有不同罢了。《帝京景物略》清楚地记载了山上有三大士殿各一座，《万历野获编》则写明了山分三座，分别象征普陀、清凉、峨眉三山，以奉西方三大士，已经暗示了三山之上建有三大士殿。张居正撰《敕建万寿寺碑文》说该山上有观音像，实际上是指三山中中间一山，山上有观音殿。因为三座石山都不高，但两侧石山比中间石山还低（见三山现状照片），所以，张居正便写成了观音殿在石山上，而文殊、普贤在山下了。文中的“观音像”当为“观音殿”，可能是刊刻时的笔误。至于《燕都游览志》所说“方丈筑山上，有广榭”之说，当属误记。因为，山上三大士殿至今犹存，并无方丈室，就地貌而言，方丈室也不可能建在山上。因三山之上仅中间石山观音殿后略有狭窄的空地，但也不可能在殿后建可供僧人起居的方丈室。因为那块空地，不仅面积小，而且即使建成，必然是前无庭院，违反古代建筑“负阴抱阳”的一般营造规律。

4. 山下亭池的说法不一。《帝京景物略》仅记“所取土处为三池……三池共一亭”，未讲三池在山前还是山后，但似乎表明三池与一亭共处一处。而张居正撰《敕建万寿寺碑文》则清楚的记述了三池在山前，一亭一池在山后。从建筑布局的合理性来看，张居正所撰碑文描述的当较为准确。因为，山前地方不大，三池已差不多将空间占满，且三殿之间再建一亭，不仅空间不允许，布局也显局促。故山后一亭一池之说较为可信。

三、明代万寿寺在历史上的作用

明代，万寿寺作为神宗敕建寺庙，与皇室有密切的关联，具有十分尊崇的地位。万寿寺除一般寺院具有的弘扬佛法、供奉佛祖功用之外，还有其特别的作用和功能：一、储藏佛经。据《万历野获编》记“先是京师有番经汉经二厂。年久颓圯。穆皇命重修未竟。上移贮汉经于其中”。张居正撰《敕建万寿寺碑文》亦记“初，禁垣良隅有番汉二经厂，

其来久矣。庄皇帝尝诏重修,以祝釐延颺。厥功未就。今上践祚之五年,圣母慈圣宣文皇太后谕:上若曰,朕一寺以藏经焚修,成先帝遗意。”二、为神宗皇帝祝釐之地。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记其在游览万寿寺时“正值寺衲为主上祝釐。其梵呗者几千人。声如海潮音。内主僧年未二十。美如倩妇。问之亦上替僧。但怪其太少。盖志善者已谢世。此又代职者。自承恩移居此中耳”。三、曾为神宗皇帝谒陵休息之所。万寿寺的建成为京西增添了一处胜景,由于它临近西郊长河广源闸,为明朝皇帝谒陵事毕从西山驾还京师的必经之地。所以,明朝万历年间神宗皇帝在谒陵返京途中曾驾幸该寺。《帝京景物略》记“僧云:万历十六年,上幸寺,尚食此亭(指石山下之亭)也。”《钦定日下旧闻考》引孙国敕《燕都游览志》也记载:“寺僧云:先帝曾于此尚食。”但该书又记称万寿寺“盖上幸山陵尝为驻蹕地也”则是缺乏根据的。

据《明神宗实录》记载,自神宗即位后,共有六次谒陵活动,时间分别为: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三月、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闰二月、万历十一年九月、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九月、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闰九月、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九月。

明神宗皇帝一生的六次谒陵中均未记载其曾驻蹕万寿寺。分析当时神宗谒陵的情况也确实没有驻蹕万寿寺的可能性。神宗皇帝谒陵,去时的路线都是从京城德胜门出城,经清河至巩华城行宫驻蹕,次日驾发至天寿山陵区,驻蹕陵区内的感思殿,然后去谒陵。中途并未经过西直门外的万寿寺,所以去时的路线没有驻蹕万寿寺的可能性。返京的路线,按《明神宗实录》的记载,六次谒陵中有四次是从感思殿出发经由巩华城驻蹕于功德寺的。然后次日由西直门或阜成门入城。另外两次未明确记载返京路线的分别是万历十一年九月和万历十二年九月。其中万历十二年那一次,虽未记载经由功德寺,但在谒陵之前,神宗于八月谕礼部

“九月十三日躬谒山陵行秋祭礼,奉两宫圣母率后妃同行,一应礼仪事务照万历八年例行。”^⑮因此,此次谒陵的返京路线应同万历八年谒陵路线一样,即从巩华城出发至功德寺驻蹕,然后沿水路御龙舟回京,由西直门入城。另一次万历十一年九月谒陵,只记载“驾发感思殿”,无详细的返京路线记载。因此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原路由德胜门返回,不会途径万寿寺;二是同其余五次一样,由巩华城至功德寺行宫驻蹕,然后由西直门或阜成门进城。

前面已经谈过,如果是走德胜门至天寿山陵区这条路线,无论去、返都不经过万寿寺,所以也没有驻蹕万寿寺的可能性。那么,神宗谒陵回京途经西山,驻蹕功德寺后是否会再驻蹕万寿寺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首先,万寿寺在明代时不具备驻蹕的条件。当时该寺只有中路建筑,没有右翼行宫,而皇室驻蹕必然有众多随从,需要大量的供给,以万寿寺当时的情况不可能提供驻蹕的条件。其次,就地理位置而言,功德寺是圣驾谒陵返京途经西山的最佳驻蹕地。明朝时,北京地区皇室的墓葬区有两处。一处为昌平天寿山一带的墓葬区,为帝陵主要墓葬区。另一处为金山墓葬区,以妃嫔、太子、诸王、公主墓为主,同时还有景泰皇帝陵和宣宗废后恭让章皇后胡氏陵两座帝后级墓陵。所以,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在祭祀完天寿山陵区后,有时也到金山祭景泰皇帝及恭让章皇后陵。而功德寺处于景泰帝陵稍东、青龙桥稍西处,^⑯神宗皇帝从天寿山陵区至巩华城,人困马乏,歇息一日或径直至金山陵墓区,祭祀完毕后,正好驻蹕于功德寺,然后第二天顺长河由水路返京,或由西直门,或由阜成门入城。而功德寺虽曾于嘉靖年间被拆去部分建筑,但是在万历十一年以前,每遇陵祭,工部都在功德寺旁用木板和席子搭盖有行宫。所以,万历十一年闰二月神宗皇帝第二次谒陵后“谕工部,功德寺驻蹕行宫每用板席搭盖,不惟骚扰烦费,益且防卫难肃,着于附近相择善地,量估经用,营建行宫一区。如用原地,其寺僧,官为移至

别所。”可见，功德寺因有行宫，已经具备了帝后驻蹕的条件，而万寿寺则不具备。再次，至万寿寺已至京城近郊，距皇宫已经不远，也没有必要在寺内住宿一夜。所以，神宗六次谒陵并未驻蹕万寿寺应是确定无疑的了。当然，神宗谒陵未驻蹕万寿寺并不等于神宗并不曾驾幸万寿寺。《帝京景物略》、《燕都游览志》所记寺僧所言神宗尚食于假山亭内，当即是指神宗谒陵事毕驻蹕于功德

寺后，经水路于广源闸下船，在万寿寺休息用膳的史实。（图二）

①《江陵张文忠公全集》卷十二。

②③④⑤《明史·冯保传》。

⑥张居正奉诏撰《敕建万寿寺碑文》（出处见①）。

⑦⑧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10 月《帝京景物略》出版说明。

⑨《明神宗实录》卷九七。

⑩《明神宗实录》卷一三四。

⑪《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一。

⑫《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三。

⑬《明神宗实录》卷一六六。

⑭《明神宗实录》卷三〇三。

⑮《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二。

⑯《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百《郊垌》引孙国敕《燕都游览志》：“功德寺侧皆古松，有庵曰松林……出松林庵稍西，转至金山口，望见景皇帝陵及诸王、公主墓。”又，引清乾隆皇帝《御制重修功德寺碑记》：“道海淀经青龙桥，折而西，距玉泉山麓不尽二里，有遗刹一区……讯诸土人，曰：是功德寺也。”

（作者为北京艺术博物馆助理馆员）



图二 明神宗谒陵行程示意图

门头沟下苇甸龙王庙的壁画

张凌

北京地区干旱少雨,这样的地理环境对仰赖自然、靠天吃饭的农耕社会来说无疑极为不利。于是,主掌风云雷雨的龙王信仰便在民间广为流行,大大小小的龙王庙几乎与城隍庙、土地庙一样遍布京城内外。每逢风雨失调,久旱不雨,或久雨不止时,百姓们就要到龙王庙烧香祈愿,求龙王治水,保佑风调雨顺。

位于京西崇山峻岭之中的门头沟,自古以来水源奇缺,老百姓对龙王的崇拜更是信奉有加。几乎在每个村落的井、池、潭、渠等有水源的地方都能看到龙王庙或龙王神龛。根据门头沟文物部门统计的数字显示,登记在册的373座庙宇中,龙王庙就占49座,是数量最多的庙宇之一,可考证最早的建于金代,^①距今已有了八九百年的历史,香火之盛可见一斑。如今,历经岁月沧桑,时代变迁,在全区仅存不多的龙王庙中,最古老的就要算下苇甸村龙王庙了。(图1见彩二)

该庙坐落在永定河北岸山脚、紧邻国道的崖坡上,整座庙宇大部被毁,只剩下山门和正殿,环以垣墙。院内伫立两株古柏,高大葱绿,直径约1米。整座庙宇精巧别致,极富京西山村庙宇特色。

根据明代《宛署杂记》载:“龙王庙,一在下草(苇)店(甸),以上离城一百里。”由此推断,下苇店村龙王庙在万历二十年(1593年)前就已建成。1996年被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当地百姓传说,这里的龙王曾显灵救驾,因此受到皇封,钦赐“敕建龙王庙”金匾。

自此以后,香火更加兴盛,前来烧香请愿的香客更是络绎不绝。为的是祈求龙王保佑永定河水风平浪静,灌溉良田,造福百姓;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久之,村民们还模仿官府衙门的仪规,形成抬龙王圣像出巡的风俗。各种神话传说也流传开来,龙王由最初的神兽,逐渐被人格化、世俗化,甚至同凡人一样有了亲戚家眷。相传,每年四月,下苇店龙王都要到樱桃沟的姥姥家去住。所以,来请龙王的村民都要到樱桃沟去请。因为灵验,屡试不爽,龙王的香火范围也就不断扩大。不仅是本村或周围的邻近村落,就连远在海淀区北安河乡的村民也要到这里来请龙王。祭祀活动一直到解放初期才逐渐消失。^②

如今,庙里早就没有了香火,只剩下残留的古建筑。顺着石阶,蜿蜒而上,迎面就是山门,再进去,便是面阔三间的正殿了(图2见彩二)。正殿坐北朝南,北侧另有别院,可惜地基已毁,仅存一门,门扇窗棂已不见了去向,但檐廊下的云头、雀替依然保存完好,古意盎然(图3见彩三)。

殿内空空荡荡,神像早已不见了踪影,但值得庆幸的是,墙上的壁画保存完好,令满目疮痍的古庙灵气仍在。难怪有虔诚的香客还会来这里进香、上供,将心中的感念写在糟朽不堪的廊柱上。更有趣的是有人索性将鸡、水果等一盘盘供品用白粉笔画在墙上,当作真的供品献给龙王了(图4见彩三)。

龙王庙壁画主要分布在正中、左右两侧山墙及梁架的象眼和前檐左右两侧的山墙

上。正中的壁画长3.4米,高2.1米,大致等分为三个部分。中间部分损毁严重,画的是龙王正厅内景:正中应为龙王塑像,塑像背后的墙壁上左右两侧画着两扇屏风,成八字,屏风的外面是两名侍女分别手捧茶水、茶壶笑盈盈地挑帘进入厅堂,两边还画有两根红漆柱子,上书楹联一对,上联“甘雨和风滋百谷以盈百姓”,下联“殷雷掣电鼓万物而浴万民。”虽已看不到龙王造像,单从壁画中所再现的厅堂摆设,就足以可以想见神像的威猛气势。这种充分利用空间,将平面与立体相结合,使壁画和神像融为一体,传达同一主题的表现手法,的确是别具一格,独具匠心。

左右两旁壁上各画着一位娘娘,坐在仪鸾宝殿内(图5、6见彩三)。每幅画面长约1.56米,高2.35米。画中的娘娘仪态端庄,雍容尊贵,峨冠彩披,手捧圭板,背面刻有北斗七星图。身后两名侍女掌扇銮驾,堂前站立两位女官。两位娘娘除了袍衫颜色各异,其余样式并无差别。仅就造型上看,极似北方民间香火最盛的泰山娘娘碧霞元君。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娘娘的座椅后背上搭着鱼鳞状织物,扶手两端饰着龙头。根据画面上出现的“五龙堂”、“云水宫”、“风调雨顺”等字样,笔者初步判断,这两位娘娘应该就是民间传说中的水母娘娘了。

水母娘娘信仰在北方多有流传。至今,在河北张家口还有一座水母宫,殿内两侧壁画描绘的是水母娘娘出宫为民施雨和雨后回宫的情景,笔法细腻,人物惟妙惟肖。当地传说水母娘娘在往北海幽会玄武大帝时,途中突然渴极思饮,四顾无水,便指地为泉,山崖随之裂开一隙,泉水汨汨而出,水母娘娘饮罢,念及塞外缺水,不忍心将水源切断,便让这股泉水千秋万代为民造福。与河北水母宫不同的是,下苇店龙王庙的水母娘娘是两位,二者究竟有何区别?

在两位水母娘娘的上方各有一小幅画,分别题名“代子上朝”、“居家欢乐图”。前者图中画有三条鱼,“代”即“带”,“带子上朝”寓意辈辈做官,代代上朝,永为官府门第,世

袭爵位不断;后者画着三只青蛙,寓意多子多福,人丁兴旺。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两位娘娘的职能分工,看来与碧霞元君信仰相似,她们不过是水母娘娘的分身罢了。

画面中,有几处明显表现被火焚烧的残卷的痕迹,生动逼真,呼之欲出。这种画作技法可追溯到元代,当时画家们对食余剥剩、无用当弃之物进行临摹,名之曰“锦灰堆”。后来经过演化,不论一页旧书、一纸公文、信笺、折扇、残贴、废契等都作为临摹对象,见诸画端。后人称之为“八破图”、“八段锦”,或索性称“残画”。表达一种复古风尚和体现残破之美的艺术追求。

两幅图的落款皆为“戮毅己未年仲秋月,重山道人拙笔画”。虽无法确定壁画的创作年代,单就风格断定,当为清中晚期作品。画匠自称“重山道人”,看来是位道士,他是否就是这里的看庙道士便无从知晓了。

整座壁画中,保存最完整、最精美的当属东西两壁的龙王与水官出巡图及回宫图。西墙壁画分天上、地下两部分。云层上端是水官与龙王骑马出巡的情景(图7见彩四)。水官骑白马,身穿黑衣的龙王骑着黑马。前面是雷公、电母、风婆、雨师做法,电闪雷鸣,光影闪动,风雨交加,地上的行人打着雨伞,四处躲避(图8见彩四)。只见雷公,背插双翅,额生三目,脸赤如猴,鹰嘴,足如鹰爪,身着红披帛,红短裙,勇猛威武。右手持锤,左手握凿,作欲击状。自顶至旁,环悬连鼓五个,象征五雷。其后的电母妆容端雅,发髻高挽,朱红短裤,花披帛,绿围腰,黄色素长裙,双手各拿一面镜子,是司掌闪电之神,又称金光圣母、闪电娘娘(图9见彩四)。雨师为一派道士打扮,头戴云冠,一手持符水碗,一手拿拂尘。最前面是一位四目长者,头顶方巾,身穿氅衣,几缕长髯,双手过顶横握禅杖,很像土地爷的样子。类似的形象在永乐宫壁画中也曾出现,至于他究竟是谁,所查资料均语焉不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图10)。

东墙壁是出巡回宫图,描绘的是水官和



图 10 四目长者

龙王兴雨之后回宫的场景。雨过天晴,从迎面而站的两个童子手中的宝瓶中射出一条拱形的光束。空中出现了一道绚丽的七色彩虹。龙王变回原形,成为一条真正的黑龙,水官骑在龙背上,神清气爽(图 11 见彩四)。雷公、电母、风婆、雨师、四目老人一派打道回府,悠闲自在的样子。

地面上,摆放着一张供桌,上面摆着香炉、蜡扦、牌位、水果等供品,一人跪于桌前,两旁站着四位乐师,吹着笛子、笙,打着镲、锣,显然是在作祈雨道场,感谢龙王恩泽人间。

龙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四灵之一。道教《太上洞渊神咒经》中的“龙王品”就称,“国土炎旱,五穀不收,三三两两莫知何计时”,元始天尊乘五色云来临国土,与诸天龙王等宣扬正法,普救众生,大雨洪流,应时甘润。其中还列有以方位为区分的“五帝龙王”,以海洋为区分的“四海龙王”,以天地万物为区分的 54 名龙王名字和 62 名神龙王名字。唐玄宗时,诏祠龙池,设坛官致祭,以祭雨师之仪祭龙王。宋太祖沿用唐代祭五龙之制。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 年)

诏天下五龙皆封王爵。封青龙神为广仁王,赤龙神为嘉泽王,黄龙神为孚应王,白龙神为义济王,黑龙神为灵泽王。清同治二年(1863 年)又封运河龙神为“延麻显应分水龙王之神”,令河道总督以时致祭。由于龙王之职就是兴云布雨,为人消灭炎热和烦恼,龙王治水成了民间普遍的信仰。至于龙王神诞的日子,各地皆不相同,并没有统一的说法。

在中国民间信仰中,还有位主水之神:即水官。水官通常与天官、地官合称“三官”。三官信仰起源于汉代,主掌世人之命运。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以三官手书作为道教徒请祷治病之法。“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意思是让有疾病的人将生平所犯之事写下来,放在山上、埋在地里或投于水中,以示与神盟约,不得复犯,并以死誓约。民间便分别设置天官、地官、水官三位神仙执掌职事,考校量刑。有资料显示,三官形象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唐代,流传至今的画作则成于南宋。在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珍藏着宋代三官图,^③其中的水官手持圭板,骑在龙身上,云层上方是雷公,右上方是一判官和一名妇女,形象与龙王庙壁画如出一辙。

依照中国传统观念,人事万物皆有神明监察,民风好坏、人心向背都会由神灵来施与报应,而风、云、雷、雨等自然现象便起到最直接、最具表现力的警示作用。因此,龙王、水官的职能也由掌管自然万物的单一性,被民众赋予了替天行道、惩恶扬善的意义,形象再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宇宙秩序观和善恶报应观。

①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化文物局编《门头沟文物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年 12 月。

②北京门头沟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门头沟区民俗协会,《京西民俗》,香港银河出版社,2001 年 12 月。

③Stephen Little, 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2001.

(作者为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委员会干部)

北京大栅栏地区^①寺庙的信仰功能、 社会实用功能及其地理分布述略

何岩巍

今前门大栅栏地区直到明嘉靖年间政府修筑外城时才正式成为北京城区的一部分,在此以前的辽金元诸朝和明前期,这一带还是所谓“郊垌”。据笔者所见,最早系统记录大栅栏地区街巷、胡同的著作,即张爵所著出版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其中收录了一些当时此地区的寺庙名称。据该书记载“正阳门外西河沿至宣武门外响闸桥东…延寿寺…云峰寺…抬头庵…观音寺、五圣庙…新火神庙…云居寺…寄骨寺。”^②书中提到的今大栅栏区域内的寺庙共有上述八座。另据《宸垣识略》、《日下旧闻考》等史料中关于本区寺庙的记载,还能确定一些始建于明的庙宇。但是,这一地区大部分寺庙均曾屡经修缮,现存建筑基本上是清代遗存。

据笔者初步统计,本区共有各类寺庙58座,其中属于祭祀观音的庙宇8座,祭祀关帝的庙宇7座,火神庙4座,真武庙3座,土地庙2座,天仙庙2座。此外,还有正乙祠(祭祀财神赵公明)、吕祖阁(祭祀八仙之一吕洞宾)、皈子庙(祭祀文昌帝君)、龙王庙、娘娘庙、太岁庙等。笔者首先应指出虽然人们常说佛教和道教支配着前近代社会民众的思想,但在实际生活中,中国的寺庙仍然是民间信仰的处所,正统佛教在民众中影响不大。光绪年间有一法国人 Maurice Jametel 曾游历北京,他与一位僧人进行了如

下对话,他问道:“你们是否已得到许多铜板?”僧人答:“几乎没有。现在汉人很少到我们这庙里来;只有蒙古人还信佛,但他们只把钱拿给那些穿黄袍子的喇嘛,至于我们这些穿紫袍子的和尚都快要饿死了。”^③在此,我们可以见到佛教僧人的实际心态。相比于佛教,道教比较成功的进入了普通人的生活,这得益于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能够比较方便的把各种民间俗神纳入其神系谱中,以适应民众的需要。在此仅举搜罗道教诸神比较齐全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为例作一说明。该书共分七卷,所收神明除正统道教神外,崔府君、萨真人、许真君这样一些民间俗神也被收入道教神系谱。不过,道教和民间祭祀之间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由于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对寺庙祭祀活动的影响及中国民间传统信仰的复杂性,我们也不能将中国的寺庙祭祀活动和道教混为一谈。以下是对大栅栏地区寺庙分类阐述其不同的信仰功能和实用社会功能。

一、大栅栏地区寺庙的信仰功能 及其社会实用功能

(一)寺庙的信仰功能

1. 观音类寺庙

北京供奉观音的庙宇极多,“……城内

外白衣庵、观音院、大悲坛、紫竹林，庙宇不下千百，皆颂经聚会……。”^①本区除各种观音寺、观音阁和观音庵外，还有白衣庵，也是对供奉观音庙宇的称呼。白衣庵之名起源于何时不详。据石泰安说观音有两种不同的形象，“第二种观音坐在位于海中的一块岩石上的……观音身穿一件白衣。她有时可能怀抱一童子，但这种组合似乎是很晚期的了。”^②可见白衣观音产生甚晚。《因果随录》载“清初谭宪卿，家饶无子，他以五千金兴大悲忏坛，礼忏四十九日，妾即生子，胞衣白，妻乃发心建白衣阁……。”^③“白衣”一名应缘于此。北京的观音类寺庙虽多，但其修建原因多为求子的需要，这从白衣庵一名的由来可证。大栅栏地区观音类寺庙中值得注意的是位于今大栅栏排子胡同内的白衣庵。据《故都变迁记略》称：“白衣庵旧为地藏庵，在排子胡同。”^④这所地藏庵改为白衣庵的原因虽不清楚，但张总在《地藏信仰研究》中曾指出“在地藏菩萨各种组合造像中，观音与地藏的造像组合可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组合，其所占比例在各种地藏组合中也最高。”^⑤他又提到“安岳庵堂寺的12号为五代天成四年地藏与白衣观音的组合。”^⑥这样看来，排子胡同内的地藏庵改为白衣庵也应与此有关。

2. 关帝类寺庙

北京关帝庙的数量在清代北京各类寺庙中居首，在本区占第二位。《长安客话》“正阳门庙”条称：“正阳门庙者，祀汉前将军关侯。侯庙祀遍天下……。”^⑦可见迟至明代中叶以后，关帝庙已经遍及全国。民众对关帝的崇拜与信仰同清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密不可分。据《清朝续文献通考》中的记载^⑧，关帝不仅曾助清军平定张格尔，还曾经震慑了林清的八卦教起义军。这种“功劳”使清廷感其忠义，因而在全国各地遍修关帝祠庙，以示恭谨祭祀之意。但是，正象Prasenjit Durara所说：“国家政权和地方精英塑造的儒家正统的国家保卫者形象并未能取代关羽的其他形象。……一般的民众也向关帝求财、求雨或祈祷健康。”^⑨对于一般

民众而言，祭祀关羽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满足了人们的各种心理需要。本区的万寿关帝庙就是最好的例子。据《万寿关帝庙重修碑记》“京师正阳门外西河沿旧有伏魔庵（即万寿关帝庙），居民祷祀，久昭灵佑……”^⑩，可知当时香火之旺。大栅栏地区的关帝庙很有特色，有俗称粗旗杆庙的万寿关帝庙，有主祀关羽，旁祀其它神灵的协资庙，还有一座北京城内极为少见的石关帝庙。

3. 火神庙与真武庙

大栅栏地区自清代以来就是繁荣的商业区，火灾成了威胁这一地区安全的主要隐患。本区的火神庙和真武庙的修建目的正是为满足民众希望免除火灾的愿望。不过，二者的信仰功能有所不同。民众修庙祭祀火神可使其保佑周边地区免于火灾之祸。例如琉璃厂东边的火神庙是为保护厂甸庙会，在乾隆年间由步军统领衙门拨款重修的，这充分说明官方对其重视的程度。而大栅栏一带多店铺，为防止火灾，“六必居”等老字号筹款重修了粮食店街火神庙。由此可见，修建火神庙出于民众对于火神的虔敬之情。而真武大帝来源于玄武神。北方玄武属水，水能胜火，因此本区真武庙的修建原因在于以水克火。民众在此表达的显然不是对火神的尊重，而是希望真武大帝运用神力降服火神，以避免火灾。

4. 文昌阁、正乙祠

坐落在今樱桃斜街19号的版子庙原名文昌阁，据《宣南寺庙志略》称：“清光绪二十六年，京师北派刻字行出资重修。此为北平刻字行业公会址，现庙址已全部拆除，改为居民住宅。”^⑪刻字行业公会为什么要设在文昌阁？刻字行与文昌神有什么关系？现在的文昌神一般认为即梓潼帝君^⑫。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载：“梓潼帝君庙，在吴山承天观。此蜀中神，专掌注册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选者悉祷之。”^⑬可见梓潼帝君在宋代时已经成为科举考试举子的崇祀对象。一位保佑考试举子的神灵因何原因又为刻字商人们祭祀呢？《重建文昌祠记》透露了一些信息。该文称：“今天下自国都至于郡

县,得通祀者,惟社稷之神,与学之先圣先师,而文昌帝君居其一焉。京师刻字行,向分南北两派,春秋致祭皆兢兢洁性,量币修祀,事于帝君,若以不得与祭为憾。……”^②由此可见因为刻字业属于“斯文”的行当,文昌帝君也就成了刻字行业祭祀的对象。今前门西河沿街220号的正乙祠(供奉财神赵公明)是由在京经营银号业的浙江商贾集资所建。正乙二字缘于赵公明的神号“正乙龙虎玄坛赵公元帅”。据《中国民间诸神》载:“然而元明以来,道书每称张天师道陵初于龙虎山炼丹,天帝遣赵公明守护丹炉。”^③旧时人们化金银、铸钱需用火炉。道书中记载赵公明负责守护丹炉,可见他与铸钱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正是银号业奉其为祖师的原因。

综上所述,人们(统治者和普通民众)对于这些神灵的祭祀主要在于希望神灵能够满足自身的心理需要。而这些祭祀神灵的庙宇也在这种满足中实现了其信仰功能。

(二) 寺庙的实际社会功能

首先,住宿是这一地区寺庙的一项主要职能。据《北京寺庙历史资料》记载,本区大部分寺庙在民国年间都将余房出租,以维持生计。

其次,位于今琉璃厂东街的火神庙在每年初三至十五的厂甸庙会中担负着商业贸易和娱乐作用。《燕都丛考》称:“自杨梅竹斜街而西曰一尺大街,又西约琉璃厂,……南新华街直贯于厂之中间,其东有海王村公园……东有火神庙,今亦称文化商场,每年正月十五以前,珠玉书画各商群集于是,游人杂沓,不减当年。”^④不过,因大栅栏地区数百年来就是京师商业的繁盛之区,商业的发展必然对寺庙的建造产生影响。一方面,大栅栏地区的寺庙有很多是附近的商人集资修建,如樱桃斜街19号的皈子庙是由京师北派刻字行集资修建,前门西河沿的正乙祠是浙江银号商人所建,粮食店街的火神庙是“六必居”等老字号集资重修,这些正表明了商业和信仰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另一方面,寺庙的建造也往往要适应商业的需要,例如位于大栅栏西街、樱桃斜街和铁树斜街交汇处的观音寺,就因这一地区商业繁盛,用地紧张造成寺院平面呈不对称型,而且该寺的外观也与本地区店面接近,显然是为了让街面效果更加和谐^⑤。

再次,寺庙还有一定的慈善救济功能。位于今棕树头条和二条之间的万善给孤寺据称:“给孤寺,……顺治间重修……寺今为施粥之所。”^⑥

最后,还应谈到寺庙具有的标识方位的作用。位于今铁树斜街149号的五道庙的功能正在于此。如果将今天的樱桃斜街、李铁拐斜街向东北延伸,可以正抵金中都的施仁门。我们将这些斜街继续向东北延伸,就会发现正好可通到今天的前门附近。据地图出版社1998年《北京街道胡同地图集》图25及图26我们可以发现,在西直门外有呈倾斜状的高梁桥路,在东直门外有东直门外斜街、香河园街、东直门外小街三条倾斜状街道。由此看来关厢地区经常形成斜街,其原因可能是人们为方便起见进城要走最短距离。这些斜街有可能是明代未修外城前进出城门的要道。五道庙位于今樱桃斜街和铁树斜街(即李铁拐斜街)的交汇点,具有道路标识的作用。

二、大栅栏地区寺庙的地理分布

1. 一些寺庙地理位置的初步分析

本区的马神庙位于今培英胡同,据《宸垣识略》载:“马神庙在煤市街大马神庙胡同,有明万历年鼎一。”^⑦又:“中城副指挥署在西猪市大街。”^⑧二者位置接近。正象赵世瑜所说:“由于马政是国家行为,在当时马匹需要量较大的情况下,也成为考察地方官政绩的一个方面,故地方马神庙往往在政府衙门附近,为官方所祭祀。”^⑨而位于琉璃厂东街的观音阁和樱桃斜街的观音寺一在街东口,一在铁树斜街和樱桃斜街的交汇处,协资庙(祭祀关帝)在今南北火扇胡同之间,根据李孝聪教授的研究,“小街或胡同口以

建关帝庙和观音庵为多”^⑤，大栅栏地区关帝庙和观音类寺庙的位置分布正好符合这一说法。琉璃厂东边和粮食店街的火神庙建立的意义，上文已说明，在此不赘述。

2. 寺庙与水井

寺庙和水井分别满足传统社会民众的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二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细心的翻阅一些北京地方历史文献就会发现，寺庙与水井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之间竟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今取《京师坊巷志稿》作一说明：排子胡同有龙王堂，其左近的三府菜园有水井。湿井胡同有真武庙和水井。其余寺庙和水井在相同和相近地区的还有粮食店的火德真君庙、三井胡同的大宏庙、前门西河沿的两座关帝庙和正乙祠、煤市街南口处的古佛堂、大马神庙街的马神庙、西柳树井北边的万善给孤寺、南北火扇胡同之间的协资庙、茶儿胡同的鹫峰寺、百顺胡同的警觉寺、樱桃斜街的版子庙和观音寺、铁树斜街的五道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按照李孝聪教授的说法，主要为了防止因用水发生争执，而“龙王庙、龙泉庵等庙庵均与城内水井的位置有关。”^⑥笔者认为起初人们为此祭祀的对象仅限于龙王，后来人们把祭祀的对象逐渐扩大，许多神明都被老百姓赋予了这种意义，结果造成上述《京师坊巷志稿》里的情况。

①大栅栏地区指今前门大街以西，前门西大街以南，南新华街以东，珠市口西大街以北的区域。

②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卷下，14页。

③Maurice Jametel, PEKIN - SOUVENIRS DEL' EMPIRE DU MILIEU PARIS, 1887, p184.

④潘荣陞，《帝京岁时记胜》，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8月，15页。

⑤石泰安，《观音从男神变女神一例》，《法国汉学》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87页。

石泰安并在该书135页提到了女神观音菩萨、天仙娘娘和白衣送子观音的结合。

⑥引自《观音信仰》，学苑出版社，1994年。

⑦《故都变迁记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4月，卷九外城二，103页。

⑧张总，《地藏信仰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3月，419页。

⑨同上，420页。

⑩蒋一葵，《长安客话》，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5月，24页。

⑪《清朝续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9119-9120页。

⑫Prasenjit Durara, The Myth of Guand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4 1988.

⑬北图善本部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

⑭孙兴亚，《宣南寺庙志略》，北京市宣武区档案馆编印，2001年10月，19页。

⑮具体说法见吕宗力、栾保群，《中国民间诸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83页。

⑯吴自牧，《梦梁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5月，卷十四。

⑰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161页。

⑱吕宗力、栾保群，《中国民间诸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535页。

⑲陈宗藩，《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518页。

⑳王世仁，《宣南鸿雪图志》，中国建筑出版社，1997年8月，117页。

㉑陈宗藩，《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515页。

㉒㉓吴长元，《宸垣识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卷十，184页。

㉔赵世瑜，《狂欢与日常 - 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4月，90页。

㉕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210页。

㉖同上，209页。

(作者为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实习研究员)

今昔什刹海

张永和 张 田

什刹海位于北京内城的西北隅,她是由前海、后海、西海(积水潭)三个水域及邻近地区组成的。什刹海最初见于记载的名称叫积水潭或海子,原是高梁河上比较宽阔的一带河身,史前时期也曾一度是永定河的故道,曾对北京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八百多年前,公元1153年金主完颜亮迁都到燕京,一边建造都城,一边在郊区建造离宫。在修建最有名的大宁宫时,开拓了高梁河的河身形成一带湖泊,其北部就是日后见于记载的积水潭。又过了60年,公元1215年蒙古骑兵南下攻占了中都,金代的北京城毁于一片火海。元主忽必烈决定放弃旧城向东北方向移动,把原在城外的积水潭围入城内。为了解决大都水源与粮食的问题,由当时的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修建了通惠河,沟通了京杭大运河,使南来北往的漕运船只直接驶入城内,积水潭成为了通惠河的终点码头。宽阔的水面上停泊了大批从江南来的船只,出现了“舳舻遮海水”的繁忙景象。当时钟鼓楼也成为了繁华的商业区,附近米市、面市、绸缎市、珠宝市、酒楼茶肆鳞次栉比,犹如一幅《清明上河图》。

然而明清以后水道逐渐淤塞,什刹海也不再是大运河的终点。她的经济地位慢慢的转向文化意义。在北京,前三海(北海、中海、南海)和后三海(前海、后海、西海)是内城唯一的水系。而前三海被纳入皇家苑囿后,平常百姓就再也无缘得见,只有后三海仍作为京城百姓消夏避暑的好去处。

要逛什刹海,首先要去的是前海。它位于地安门西大街,北海后门的北面。最著名的景点是荷花市场。一到夏天水面开满荷花,让人想起了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句:“接

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里不仅可以乘凉、休息,更可以听唱、会友、品尝小吃。每逢夏季的端午节到中元节(即农历五月初五至七月十五日),岸两边就搭满了凉棚,主要经营各种风味小吃和时令鲜货,如年糕、扒糕、豆汁、豆腐脑、艾窝窝、驴打滚等,应有尽有。还有一些更为精明的商家,为了让顾客尝鲜儿,干脆把什刹海内出产的莲藕、鸡头米、菱角等时鲜现挖现卖。这里还有京剧、杂技、曲艺等娱乐节目供人欣赏,成为京城大众开心消遣的民众乐园。

在前海附近今前海西街17号,有一处极著名的大宅院,即前清的恭亲王府。此府原是乾隆皇帝宠臣和珅的宅邸,其获罪抄斩后,宅邸一部分归和珅的儿媳,皇帝之女和孝公主居住,另一部分赐给了嘉庆皇帝的哥哥永璘做庆王府,后又被清咸丰帝赐给其弟恭亲王居住。王府分为府邸与花园两大部分。整个王府分中、东、西三路,是由多个四合院组成的。王府花园中为“萃锦园”,其中有三绝:西洋门,据说在当时北京只有三个:御书“福”字碑;室内大戏楼。“萃锦园”不但景色迷人,更引人注目的是园中许多景物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相似,后人多认为《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就是依此园写成的。这座王府200年来历经沧桑,几多变故,侯仁之先生曾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可见其历史与文化价值。

将前海与后海连接在一起是座小巧玲珑的石桥,桥的形状颇似一个倒置的元宝,故得名银锭桥。初建年代已无从考证,但明代的史料上对其已有了明确的记载。《燕都游览志》描绘:“城中水际看西山第一绝胜处也。桥东西皆水,荷芰菰蒲,不掩沦漪之色,

南望宫阙，北望琳宫碧落，西望城外千万峰，远处毕露，不似净业湖之逼且障也。”因此“银锭观山”成为了燕京小八景之一。此外，还有一景，民国期间时局动荡，当时政府无暇疏浚河道，湖里的淤泥高于桥西水底，水便从东流向西，形成了“银锭观山水倒流”的特殊景观。

数百年来，后海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府一寺。府是后海北沿的醇亲王府。该府规模宏伟，环境幽雅。原为清康熙帝宠臣大学士明珠府邸。乾隆帝将该府赐给其善长书法的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理。最后又成为清光绪帝生父奕譞、清宣统帝生父载沣两个醇亲王的王府。由于奕譞父子两次扩充改建其府，先后共花掉国库中16万两白银。可见其工程糜费民脂民膏之巨。该府房屋众多，范围广大，结构精巧，画栋雕梁。特别是该府1949年才售出，因而保存非常完整，非一般王府可比。王府西侧为花园——鉴园。园中假山亭榭，池塘花木，风景宜人。

一寺为醇王府附近鸭儿胡同内建于元代的广化寺。建寺时间约为公元1342年前后。距今近700多年，是北京著名佛教十方丛林。过去每到阴历的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会”（俗称“鬼节”），什刹海周围的寺庙都要扎法船、放焰口、奏佛教音乐、诵“大悲咒”、“往生咒”等经文超度无家可归的亡魂。附近的百姓们也学着庙里法船的样子做了许多小河灯，趁着僧人做法事的时候放到湖中寄托对亡者的哀思。后来“盂兰盆会”逐渐成为一种带有娱乐性的活动，放河灯也成为什刹海一年一度不可缺少的景观。

过去的什刹海桥多、庙多。除现存的银锭桥外，一条不长的月牙河上就架了七座桥。最有名的为最北面的李广桥。李广是个太监，因得明孝宗宠爱，建豪宅于此。四面环水，为出行方便特建此桥。今月牙河早已荡然无存，代之的是一个叫羊房胡同的小巷。李广桥也做为街巷名称而保留下来，默默地证明过去的历史。而什刹海周围寺庙更是数不胜数。兴盛时多达二三十座，故流传着什刹海因周围的十座庙宇而得名一说。

积水潭北岸的净业寺，因景色优美成了文人荟萃之所，清代的“词坛巨匠”纳兰性德有一首词描写寺内荷花之盛：“藕风清，莲露冷，断虹收。正红窗，初上帘钩，田田翠盖，趁斜阳，鱼浪香浮……”此寺周围还有太平庵、德胜庵、兴德寺、莲花庵、镇水观音庵等寺庙，而现存的唯有镇水观音庵了。此庵建于明永乐年间，清乾隆二十六年更名为汇通祠。

名人故居多，也是旧什刹海的一大胜景。像梁漱溟、萧军、陈垣、田间等居家都散落其中；像白石老人、老舍、溥心余、张大千、张伯驹、张中行、侯宝林、黄宗江、刘心武等名士才子也曾被这海子的秀丽婀娜之风光所吸引，都筑室于其中长久地呼吸过这片土地潮润的空气……

几十年来，政府多次疏浚三海，近年来，又经过对河底的彻底整治。于今春夏秋三季，什刹海碧波荡漾，垂柳摇曳，皇城子民，外埠游子，纷纷前来游览，后三海又成为老北京一座免费的水上公园。到了冬季，海上结冰如镜，喜爱滑冰运动的八方来客，又一拥而至。一时三海上，冰刀烁目，追逐飞驰。一座天然冰场四周人头攒动，频传朗朗笑声。待到岁回律转，冰融雪化。一条条游艇游弋海上，方才尚在冰场上驰骋的勇士，如今又登上小舟，在烟波浩渺中，充分领略大自然的恩赐。

什刹海的西面，一座东临什刹海南望北海坐西朝东的大宅，原是恭王府用来堆积草料饲养马匹的马厩。清亡后卖给同仁堂老铺成为乐氏子孙的花园。1963年郭沫若迁居到此，直到逝世共居住了15年，现已辟为郭沫若纪念馆并向游人开放。

后海的醇王府，宋庆龄同志1963年到1981年一直在此工作和生活，居住了18年。现已辟为宋庆龄同志故居。和诗人敦沫若故居，南北飘香相映生辉。

那座矗立后海岸边的广化寺，十载文革，也在劫难逃。如今政府以巨款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庙中中院、东院和西院油饰一新，金碧辉煌。古柏苍翠，曲径通幽。每到初一十五，善男信女，前来拜佛祈福。伴

随着晨钟暮鼓,颂经礼佛之声朗朗传出。2001年在广化寺成立了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为精研佛学文化奠定了一绝好的平台。

近些年来,人民政府还在三海及其附近,修桥又修庙。上文提到的可站在桥上“观山”的银锭桥,已非旧物,而是在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重修扩建的。目前这座精美的石桥桥板上“银锭桥”三字是单士元先生题写的。

为京城子民津津乐道是另一座古桥的修复。位于地安门外大街有一座古老的石桥——万宁桥,老北京人称它为后门桥。桥始建于元初,为木制结构,因泡在水中多年而腐烂,在元武宗时换成石桥。桥位于全城的中轴线上,上个世纪50年代修路时,曾在桥下挖出一只石鼠,与后来正阳门桥下挖出的石马形成一条穿过紫禁城的子午线。然而过去因修路,在相当长时间内,万宁桥几乎被埋于地下。2002年政府拨款重修万宁桥,恢复了桥身与桥闸,就连桥下的镇水兽也按原位置安放,现在站在桥上又可以直接看到三海之美丽景色,还能听到桥下潺潺的流水声,古老的万宁桥重新焕发了青春。

再说庙。就在万宁桥西有座正在修复的名播遐迩的火神庙。相传此庙建于唐代,是北京最古老的庙宇之一。明万历帝为表达对火神崇敬之意,特对此庙改增碧琉璃重阁。清乾隆帝又将山门及阁顶上加了黄琉璃瓦。21世纪初,政府搬迁了占用此庙多年的单位和居民,又拨款对该庙依原貌重修,现即将竣工。红墙重阁黄琉璃瓦,重又映入人们的眼帘。多次受过皇恩的火神庙将重现威仪,届时万民随喜这一千年古刹,为京华古都添一佳话。

至于1976年因修建二号地铁而拆掉的镇水观音庵即后来更名的汇通祠,也在1988年重建。现在是郭守敬纪念馆,供人民纪念这位对北京做出巨大贡献的水利专家。

综上所述,可以说什刹海的一砖一瓦都凸显出老北京人的气脉:整齐的四合院、天空中嗡嗡的鸽哨声、“臭豆腐酱豆腐”的吆喝声,“磨剪子抢菜刀”的“惊闹”撞击的铿铿

音,还有见面必讲“您吃了么”这带有独特京腔的问候声,无不讲述着皇城子民不同凡响的生活状态。

然而,事物总不能尽善尽美,欣喜中也夹杂着几许遗憾和无奈。随着近几年房地产的开发,什刹海地区并没有能逃脱拆迁大军的光顾。不少的名人故居已经或正在消失在轰隆隆的推土机下;穿着黄号坎的“真”与“假”胡同游的三轮车夫,拉着碧眼金发的外国人,把脚铃踩得叮咛山响,脸上露出一抹微笑。由于西方文化不断涌入这座古老的城市,昔日可以怀念京华烟云的荷花市场,如今已被吆五喝六人满为患的酒吧一条街所代替。这条街可说是东西文化冲撞、磨合互动的产物,它给许多老北京人心底留下永远的痛。

当又一个盛夏的夜晚到来时,走在什刹海附近,香车、美女、超短裙,薄露透,崭新的纸币上散发着法国巴黎香水的呕鼻味……一片纸醉金迷的景象与这条古老、宁静的街显得那么格格不入,那么不和谐……

本来,宁静幽深的三海地区,是为到处是繁华闹市的京城留下唯一的一片静土。然而今日,三海及附近本不宽敞的小胡同里,到处都是汽车、行人,使原本就不堪重负的道路显得更加狭窄、拥挤;人声、喇叭声相互响应,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这一切对于那些习惯了安静生活的老住户们简直就是一场噩梦。什刹海酒吧街确实拉动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但笔者认为这里的文化价值远要比经济价值更为宝贵。因为这里的人文景观是经过多少辈才俊艰苦卓绝的培植才流传下来的,而这也是和政府倡导的人文奥运、绿色奥运完全吻合的。我们不能为了那么小小的一点钱财就放弃了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如果任这种所谓的酒吧文化再恶性膨胀,想必用不了多久,什刹海和这里存之不多的京味民俗文化将一起沉没在这漂浮着酒腥钱臭的“海子”中了。

(作者为《新剧本》杂志社一级编剧、首都图书馆工作人员)

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

古籍修复阶段成果

宋 婷

2004年度,北京市文物局拨专项古籍抢救性经费,对图书资料中心所藏的珍贵古籍进行抢救性修复。至今,这项工作进展顺利,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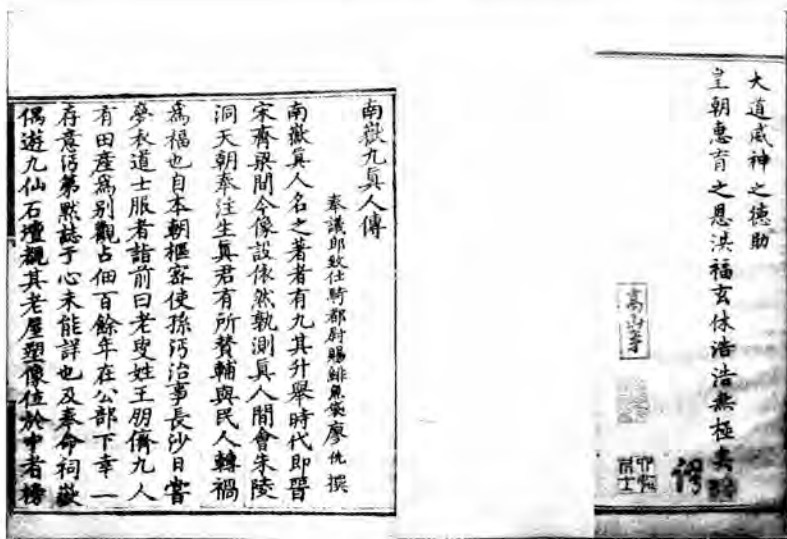
资料中心藏有图书26万册,其中古籍15万册,年代涉及宋、元、明、清。这些线装古籍,由于年代久远,大部分纸张糟朽风化,一触即碎,无法翻阅。有些书磨损撕裂、纸张被虫蛀得千疮百孔。还有些书阴雨天受

潮发霉、粘连板结。针对这些情况,我们本着抢救为主的原则,从这些古籍中精心挑选历史价值、学术资料价值和艺术价值高的版本修复。此次修复古籍的标准确定为:以一、二级文物古籍为主,年代上以康熙以前善本为主。

在修复残破古籍前,我们认真做好古籍的现状记录档案,在此基础上,针对每一种古籍根据不同的纸张老化状况、破损程度制



修复前珍贵古籍



修复后《南岳九真人传》

定出不同的修复方案。然后委托中国书店、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辽宁图书馆等几家修复水平高的单位进行修复工作。

先后送出修复的古籍 143 种, 共计 1033 册。古籍修复技术要求很高, 一部书的修补需要很多道工序, 如揭页、去污、去霉、洗净、整补虫蛀鼠噬痕迹、补齐缺损书页、溜口、逐页托裱、装帧成册等。一个修复项目做下来, 少则二月, 多则数月。到目前为止, 修复回来的古籍有 95 种、715 册。

其中送到天津图书馆的《南岳九真人传一卷》是书藏经折装, 前后分两部分: 前《序》为朱墨套印本, 杜光庭撰, 半页 5 行 16 字, 开卷右下钤“高山寺”朱文长方印, 卷端题名后钤“唐伯虎”朱文长方印及“项墨林鉴赏章”白文方印。《序》文末亦钤“高山寺”、“六如居士”、“项子京家珍藏”等印章, 共 16 页。卷后正文部分为后配刻本。高山寺为日本名刹, 以收藏大量中国善本古籍而闻名。《南岳九真人传一卷》2003 年经北京市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为二级品, 是明代刻本, 但在印章上有疑议。此书由天津图书馆修复, 在此次修复过程中, 曾请日本著名学者石冢晴教授到天津鉴定, 确定是真本无疑, 当为日本国家级善本。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收

获。

明万历四十一年刻本《外夷》仅存第十六卷, 专家鉴定为二级品, 该书在揭裱内衬时意外分离出非常稀少的明版“四书三说”, 版心上镌刻书名和卷次, 仅存二卷, 书口下镌刻工, 每篇内容分“存疑、蒙引、浅说”。我们为修出了书中书而感到惊喜。另一明刻本《书断列传、试笔、历代帝王法帖释文不分卷》经专家鉴定为二级品, 修复中揭出书中内衬纸, 经查找、核对为清同治七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实政录》残页, 虽然称不上珍本, 但为我们今后做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佐证。

目前修复归来的古籍, 请中国书店最有权威的老专家王志鹏先生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专家朱赛虹先生一一评判。经专家审定, 715 册古籍均达到预期的修复效果。为了更妥善保管古籍, 我们还为珍贵古籍量身定做了书套。

今后的古籍修复和保护任务还十分艰巨, 我们愿意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 锐意进取, 在今后工作中取得更大的进步, 不辜负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助理馆员)

北京市文物局 2005 年一季度文博事业

大事记

1月11日-15日 翰海迎春拍卖会在京广中心举办,本次拍卖会参拍作品 1099件,现场成交 734 件,成交率 66.79%,总成交额 5334 万元。

1月14日 北京市文物系统领导干部会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2004年全市文物工作,并对今后一段时期内的文物工作做了全面部署。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市委宣传部部长蔡赴朝、北京市副市长张茅出席会议并讲话。梅宁华局长做了题为《关于当前的文物工作》的报告。

1月20日 《首都博物馆近年文物征集工作情况宣传展》对内展出,共展出近160件文物,主要有:新征集的历史文物、近现代文物以及替奥申委、奥组委代管的奥运物品等等,此展览旨在文物征集工作的汇报。展览期间,有20余家新闻媒体对展览及首博文物征集的办法、范围等作了报道。

1月24日 2005年北京市文物局局属各单位目标责任书签定大会召开。

1月26日 北京市文物局举行局长述职大会。局长梅宁华、副局长孔繁峙、舒小峰、于平分别在会上作了述职报告。局属单位党政一把手、机关正副处长参加了述职大

会。述职结束后,与会人员对四位局长进行了民主测评。

1月份 完成市政府法制办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长城保护管理条例》(送审稿)的征求意见。

1月份 为加强和改进古建筑消防安全工作,提高居民的防火安全意识,增强安全硬件设施建设,市文物局向四城区居住在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内的居民发放了消防器材。此次发放活动共涉及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120 处,涉及居民约 9600 户,将给每户发放可用于古建筑的灭火器一只。市委、市政府为了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对这次发放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协调市财政局从“人文奥运”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中列支了 170 万元人民币,确保了 9600 只灭火器及时到位。

2月2日 老舍作品诵读表演活动在北京市文物局大礼堂举行,北京市文物局领导、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领导及著名表演艺术家郑榕先生和李滨女士、老舍先生的子女舒济先生和舒乙先生以及多位社会知名的语言学家、作家、画家等出席了这次活动。

2月23日 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效愚先生向首都博物馆捐献有前国际奥委

会主席萨马兰奇签名的“奥林匹克日”纪念证书和北京申奥纪念茶具两样藏品。

2月25日 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聘请国家鉴委会委员丁瑜先生及北京市鉴定委员会委员李新乾先生对图书资料中心藏善本进行第三次文物级别鉴定。共鉴定明代佛经 62 种,其中一级品 3 种,二级品 28 种,三级品 3 种,善本 28 种。

2月份 由北京市科委、北京市文物局主办,北京文博交流馆承办的《北京科普场馆指南》宣传册设计制作完成。该宣传册囊括了北京地区 124 家科普类场馆,并制作分区地图标明各个场馆的位置。

2月份 完成上报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推荐名单记录档案工作,得到国家文物局好评。

2月份 参与《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名录》和《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的编制和调研工作,并提供了多条线路的预选方案。

3月2日-7日 由北京文博交流馆和中国新闻社巴黎分社联合主办的《北京——巴黎:名门之秀》展览在巴黎塞纳河边的中国文化中心展出。

3月7日 首都博物馆与北京市规划展览馆进行了奥运会会旗、残奥会会旗、奥运会会旗复制品、残奥会会旗复制品的交接工作。首博接收北京市规划展览馆移交的奥运会会旗、残奥会会旗。同时,首博将奥运会会旗、残奥会会旗的复制品 B 号旗交北京市规划展览馆。

3月31日 颐和园佛香阁景区古建筑群大规模保护性修缮工程正式启动。本次修缮是对颐和园自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修缮工程。修缮范围东西方向约 70 米,南北纵深水平距离约 210 米,总建筑面积 6804.17 平方米,总占地面积约 23210 平方米。工程总投资 5000 万元,计划于 2006 年底完工。

3月份 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崖

居遗址抢险加固工程启动。该工程为北京市“人文奥运”计划 2005 年项目,将实施封堵岩体裂缝、改造顶部山体等保护措施。工程预计 7 月份竣工。市政府投入专项资金 50 余万元。该工程将使古崖居遗址险情得到初步缓解,待将来化学保护实验成功后,还将采取大规模的遗址保护措施。

1季度 完成了古观象台、八达岭等 25 家国保单位的巡视检查和 12 家重点市保单位的抽查工作;对部分文物市场及文物商店进行了抽查;对 3 处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了抽查;对 10 余家博物馆进行了检查。

1季度 查处北京奇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非法购买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案件一起,没收石刻文物 32 件。

1季度 组织对公检法部门涉案文物鉴定 19 次,接待前来鉴定的人员 40 余人次,共计鉴定涉案文物及复仿制品 60 余件,起草、打印鉴定意见 19 份。

2005 年第一季度局属博物馆
参观人数统计表

名称	入馆 总人数	购票 人数	免票 人数	学生	老人
首都博物馆	39572	36441	3131	1313	1818
大觉寺	21109	17590	6134	131	1188
正阳门	8829	8320	509	3207	110
徐悲鸿纪念馆	9487	2305	7182	2107	3468
智化寺	8003	5990	2046	407	1250
辽金馆	2480	2161	319	1801	319
西周馆	1097	313	298	200	286
艺术博物馆	17272	11062	6210	144	6210
团城演武厅	2104	260	1844	331	588
大葆台	7106	760	6447	211	6384
大钟寺	15598	12163	1829	1693	950
古建馆	10613	7102	3511	648	2863
白塔寺	15104	7186	5135	670	4329
老舍纪念馆	1960	854	1106	601	218
德胜门	2972	940	1922	160	
石刻馆	7746	6834	912	256	9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文博.2005.2/张展主编.—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6

ISBN 7-5402-1715-4

I.北… II.张… III.文物工作—北京市—丛刊

IV.G269.27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8641 号

北京文博(2005 * 2)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6.25 印张 140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2000 册 定价:10.00 元

北京市第七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介绍

(续二)

纪晓岚故居

●年代：清

●说明：纪晓岚，清乾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是清代著名学者。他领衔编纂《四库全书》，并写了二百卷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著有《阅微草堂笔记》等著作。民国时期此宅曾是北京国剧学会和京剧科班社址，1958年晋阳饭庄落户于此。故居坐北朝南，共二进院落。第一进有广亮大门、正房、倒座房，正房五间，七檩勾连搭加前廊一步，南立面为民国初年修缮时建的中西合璧形式装修。屋顶为镂空女儿墙，门窗为拱券形，上雕精美图案。阅微草堂为二进院正房，五间，前接勾连搭抱厦三间，硬山合瓦屋面。故居内有古老的紫藤萝和海棠树，传为纪晓岚亲植。

●地址：宣武区珠市口西大街241号

●管理使用单位：晋阳饭庄



纪晓岚故居



纪晓岚故居拱券形门

花市火神庙

●年代：清

●说明：明隆庆二年（1568年）始建，清乾隆四十一年重修。为神木厂悟元观下院，供奉火德真君。现存前院主殿和东、西配殿。主殿是勾连搭硬山顶式建筑，大脊有黄琉璃双龙戏珠的装饰。建筑保存完整。

●地址：崇文区西花市大街

●管理使用单位：崇文区文委



花市火神庙一进殿



花市火神庙二进殿

(图文：市文物局文保处等提供)

(封三)



ISBN 7-5402-1715-4



9 787540 217150 >

定价: 10元

